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经济趋势	3
1957—1958年的回顾——公司利潤的起落——又一个冷战預算——联邦賦稅——州和地方的賦稅	
第二章 劳工情况和社会情况	18
收入的分配——实际工資和工資差額——工会合同关于增加工資的規定——家庭預算标准——福利待遇——工作時間——社会保障的发展——失业和失业津貼——经济衰退的若干影响——居住情况——卫生需要和医疗照顾——因工伤亡——黑人工人——老年工人——女工——青年工人——学校和教师不足	
第三章 农业和农民	67
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农产品价格和平价——农产品零售价格上涨——产量增加，耕地面积减少——农民的债务增加——人口的趋势——纵的合并——剩余食物的分配——农业劳工	
第四章 工会	78
工会会员——劳联——产联第二次大会——对外政策的不同意見——劳工中的敲詐行为——貨車司机兄弟会：腐化和糾紛——劳动力中的白領工人——熟练工人問題——工会的妇女会员——工会的黑人会员——工人报纸停刊——反工会活动——塔夫脫——哈特萊法的运用記錄——“工作权利”法——1957—58年的罢工	
第五章 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	116
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宣誓书——蔑視罪的判決——伊斯特兰委员会的迫害——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的新活动——麦卡倫法的	

发展——根据史密斯法提出的控訴——各州的“顛覆”案件——
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攻击——黑人白人合校問題——旅行权——
解雇教师——外國出生者的权利——鲍威尔—舒曼“煽动”案
——案貝尔上訴案——反黑人和反犹太人的轰炸事件——由于
爭取和平的行动而被逮捕的人

第六章 政治事务.....156

美国第八十五届国会——1957年的选举——1958年的选举——
在竞选运动中的劳工——公司的政治活动——当选担任公职的
黑人——南方黑人的选举权——国会委员会的权力——議員中
的律师、企业家和妇女——統一独立社会党在紐約州所得选票
——紐約市的人民权利党——罗伯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
——阻碍小政党参加竞选

第七章 加拿大劳工运动的发展.....185

工会会员——工会統一問題——劳工的主要政策——政治行
动——集体談判的进展——1958年的罢工和合同——反工会运
动——和美国的關係

前 言

本书是两年出版一卷的《劳工实况》的第十四卷；它和以前各卷一样，包括关于许许多多问题的崭新的资料。它主要包括 1957—1958 年这段时期的发展情况的事实和数字。在某些问题上，为了说明较长时期的趋势，对于早些年代的情况也加以叙述。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也加入了直到本书出版时为止的 1959 年的较近时期的资料。

问题的安排方法和以前各卷大致相同。但是本卷中第一次用整个一章来叙述加拿大劳工运动的发展情况。加拿大工会运动的发展情况在许多方面是和美国的情况相类似的。

尽管在前一卷即第十三卷中，单独用一章叙述黑人的情况，但在本卷里，关于黑人的情况则是分散在许多章中来叙述的，特别是分散在关于政治事务、劳工情况和社会情况以及工会的各章中。

同以前各卷一样，由于篇幅的限制，本卷许多资料没有注明来源。大部分资料取自政府和其他标准出版物，因此我们随时都乐于把任何资料的来源提供给有兴趣的读者。

由于书后附有详细索引^①，因此，在正文中尽量少指出前后参照的地方。和以前各卷一样，工会的名称通常是用简称。

① 中文译本从略。——译者

和以前一样，我們对工会和許多进步运动的組織和机构致以謝意，感謝它們允許我們利用它們的資料或者為我們核對已編就的資料。从事研究工作的顧問們和專家們也給予我們非常可貴的幫助，他們慷慨地用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來編制关于某些專題的資料。

我們感謝农业研究会和它的月刊《农民实况》所提供的关于美国农民情况的有价值的报告。我們感謝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尚伯格收藏室的工作人員，他們審查了若干有关黑人的部分。

本卷以及以前各卷的《劳工实况》所叙述的許多問題，在本会現在出版的期刊《经济札記》和《铁路札記》中也曾經討論过。我們請求美国和外国的工会和有关組織的工作人員把他們的报告和出版物寄給我們，以便上述月刊和以后的《劳工实况》可以利用。通訊地址如下：

劳工研究协会

紐約州紐約市(3区)东11街80号

1959年5月

第一章 经济趋势

1957—1958年的回顾

从1957年到1958年，美国经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次衰退是从1957年夏季生产过剩的危机开始的，生产持续下降约八个月。接着到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回升，这次回升使商业重新接近衰退以前的水平。

国家的经济活动下降 经济进展讨论会在研究累昂·H·凯塞林所提出的题为《衰退》的报告时指出，以1957年第一季度和1958年同一季度相比，“全国经济活动，从实际讲来下降了约4.5%。由于我们应增长4—5%，因而‘衰退幅度’事实上是9%左右。由于下降的幅度是这样，所以失业人数约增加了90%，或者说将近增加了一倍。”

这些关于经济活动的估计所指的是所谓国民生产总值，即对政府和私人所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的价值的估计。根据商务部的估计，以当时的美元价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1957年第三季度年率将近4,460亿美元下降到1958年第一季度年率约4,270亿美元；在这以后，国民生产总值在1958年第四季度恢复到年率4,530亿美元。

不过，如果估计到物价上涨了2—3%，国民生产总值的总物量在1958年底仍然低于1957年的最高峰。如果我们以1958年全年和1957年全年相比，把物价上涨部分除外，实

际国民生产总值是下降了3%左右，这比战后时期的以前两次衰退下降都多。

如果以人口计算，考虑到美国人口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事实上是在1956年第四季度以后开始下降的，此后各季继续下降直到1958年第二季度，甚至这时仍然低于1953年或1954年。（参阅本会出版的《经济札记》，1959年2月号。）

每人可动用的收入 纳税后人民个人的收入称为“个人可动用的收入”。这种收入，以当时的物价计算，尚差强人意，仅在1957年第四季度和1958年第一季度有所下降。但是，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并且考虑到美国人口的增长情况，个人可动用的收入便表现从1957年第三季度起继续下降了一年；在1957年第三季度，个人可动用的收入已经比1956年低了很多。

在1957年第二季度，以1958年美元的不变价值计算，个人可动用的收入是1,846美元；到了1958年第四季度，个人可动用的收入是1,798美元。事实上，就实际购买力而言，根据这些关于可动用的收入的估计，美国人民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活水平在1958年第四季度比一年前、两年前、甚至三年前都要低。

工业生产下降 联邦储备局以物量计算而不以美元计算的工业生产指数（以1947—49年为100），在1956年12月达到了147的最高峰。以后，工业生产有一个时期缓慢下降，1957年8月以后就急剧下降。在回升开始以前，1958年4月工业生产下降至低点，当时的指数下降到126，从最高峰下降了14%，这是从1954年10月以来所达到的最低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两次周期下降中工业指数从最高峰下降

到最低点都是相距10%左右)。1958年4月,经济中受打击最严重的部门即制造业的雇工人数比一年前减少了170万人;单是耐用品工业就减少了将近140万人。

到了1958年年底,工业生产指数上升到142,到1959年2月,工业生产指数又上升了2点。但是,1958年全年的平均数只有134,比三年前即1955年的平均数仍旧低5点,比1956年和1957年的平均数143则低9点。实际上,1958年美国工业生产平均指数比五年以前即1953年的134的水平毫无增加。

耐用品生产下降 在衰退时期,生产下降最多的是各种耐用品工业。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下降了27%,钢生产下降了40%,机器生产下降了21%。

汽车生产在1957年达到最高峰,在以后九个月中下降了47%。汽车工业在1958年生产了420万辆汽车(这是10年来最低的水平),而在1957年则生产了610万辆,在1956年生产了580万辆,1955年是最高纪录达790万辆。实际上,1958年的汽车生产比1929年还要少20万辆;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1958年的汽车生产比战前的12年(即1923—1929年、1933—1937年和1940—1941年)都低。

1956年下半年,钢铁工业的开工率开始下降,到了1958年4月,已经下降到设备能力的47%,此后又上升,在1958年年底上升到设备能力的75%。就1958年全年来说,开工率是60%左右,也就是近20年来平均年率最低的一年。1958年钢锭和铸钢的实际生产量是8,500万吨左右,这个数字比1957年低25%,是1949年以来年产吨数最低的一年。

建筑和住宅 在1958年建筑费用总额上升到约490亿美元,比1957年约多2%,这主要是因为住宅和公路建筑增

加的结果。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新建筑的实际数量仍然停留在1956—57年的水平上。

政府在公路、水坝、公共建筑和其他工程方面的开支以及政府对抵押市场的支持，标志着1958年的进展。另一方面，商业和工业建筑却并没有起色。这是同企业界用在厂房和装备方面的支出继续萎缩有关的。

私人住宅建筑在1958年春季下降到四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以后，私人住宅建筑支出增加，到1958年年底，以美元计算，造成了新纪录。这种情况部分地反映了建筑费用增加，但是也反映出“新开工的”住宅建筑数目的增加，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参看第二章。

基本建设支出下降 引起这次衰退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企业界的厂房和设备支出下降。这项支出从1955年、1956年一直到1957年年中，始终是在迅速上升的。以后，它在1958年全年下降，直到它比最高峰低22%为止。在1957年，这项支出将近370亿美元，而在1958年，则下降到305亿美元左右。1959年初，下降停止，但是用于机器和自动化装备的新基本投资越来越多，其目的在于减少工人的数目，因而使美国的长期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参阅第二章关于失业的实况。）

由于过去盛极一时地把钱花费在基本建设上，美国工业中没有利用的设备能力估计约为20—25%左右。这种设备能力“过剩”限制了1959年的复苏动向，因而不大可能早日出现像1955—1956年那样的扩充新设备能力的发展。

存货变化 1955—57年的投资繁荣表现在存货的迅速积累。在衰退开始的时候，存货达到913亿美元以上（这里面包括美国商务部所估计的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所掌

握的存貨总量)。当銷售开始活跃的时候,这些大量存貨就迅速脫手,特别是在1958年的头五个月。到10月底,存貨已經减少到849亿美元左右。

在1959年初,由于預料在1959年年中会发生罢工事件而囤积钢铁,存貨又开始堆积起来。銅、橡胶、鋁以及其他工业也表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对于生产的回升起了暫时的刺激作用。

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的增加是1958年经济复苏的一个主要原因。从1957年后期开始,在詳細审查了軍事支出計劃和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联邦政府“国防”訂貨急剧地增加了。“国防”費用占195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联邦政府对农业和住宅計劃的支出增加了,这多少是由于制訂了制止衰退的特別法律的緣故。同时,国会通过增加武装部队和文职官員的薪金,因而增加了約7亿美元的购买力。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大大增加了,特别是对公路(有联邦政府拨款的帮助)和教育的支出。

联邦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的数量(減去政府出售的数量)在1957年是相当稳定的,总数是495亿美元左右,1958年第三季度增加到年率522亿美元,1958年第四季度增加到年率542亿美元。1957年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总数是363亿美元,1958年增加到396亿美元,1958年第四季度达到年率410亿美元。

內在的稳定因素 虽然所謂“內在的稳定因素”在制止衰退方面起了一些作用,但是作用并不像人們所相信的那么大。刘易斯·巴錫教授在《当代经济評論》(1959年2月号)中写道,“的确,政府对1958年的复苏作了一些相当大的貢獻。采购商品和劳务的年率增加了几十亿美元,轉移支

付也增加了相同的數額。但是，政府採購的增加，絕大部分是和衰退沒有關係的：軍費支出是在人造衛星上天以後增加的；剩餘農產品是因為農業空前豐收而收購的；工資是在遲遲地承認私人經濟價格和收入上漲之後增加的；而各州和地方的計劃則是按照戰後繁榮時期的方式繼續推進的。”

巴錫教授估計，轉移支付的增加約有半數（主要是失業津貼）和衰退有關。他最後說，一切“真正屬於自動穩定因素性質的”辦法所產生的影響僅僅抵銷了1958年衰退的四分之一。衰退的另外四分之一，是被和衰退無直接關係的政府計劃所抵銷的，例如增加養老金支出，增加文職官員的薪金等等。

勞動生產率的急劇上升 1958年下半年利潤上升（見下文）主要是因為勞動生產率急劇提高。早在1959年，據《幸福》雜誌估計，自從1958年年中以來，美國經濟中的勞動生產率、即每一工作時的生產量（政府部門和農業除外），已經增加了6.5%以上。這種增長比戰後任何同樣長的時期都更猛烈。

聯邦儲備局有一位經濟學家說，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即在1947年到1957年之間，製造業生產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每年平均增長率是3.7%。

甚至《華爾街日報》（1958年10月13日）也承認，製造業生產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從1957年年中到1958年年中提高了5%或6%，這個時期包括衰退時期在內。戰後的前兩次衰退每一次過去之後，製造業勞動生產率都提高了7%左右。據預計，勞動生產率在1959年將繼續提高，可能比1958年的數字高5%。

壟斷價格的動向 儘管在1957—58年生產下降而失業

增长,可是在这两年几乎每一个月中,消費者物价的趨勢都是上漲,只有1958年下半年是例外,当时由于食物价格的季节性下降,消費者物价暂时保持稳定。劳工統計局的消費者物价指数从1957年1月到1959年1月提高了将近5%。在1959年1月,消費者物价指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1939年高108%。而且,甚至自从战后的1947—1949年这一时期以来,消費者每1美元的购买力,已经减少了将近0.2美元。

在回升时期,物价昂贵有助于公司增加利潤,而吸干工人的购买力。尤其是在1958年,物价昂贵起了限制消費者对諸如汽車之类的耐用品的需求的作用,从而妨碍了复苏的进程。

軍事支出的負担增加,即使是在生产下降和就业减少的情况下,也是促使物价上漲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垄断資本的力量增加,它能够不顾市場的需求而任意“支配”物价,从而加重了物价上漲的压力。

在国会的委员会中,专家的证詞表明,在最集中的工业中(在只有几家公司的工业中,或者受极少数公司控制的工业中),物价是最硬朗的,即使在衰退时期,物价还是趋向于上漲。

在钢铁和汽車工业中,尽管在这一时期需求已经极度低落,价格却仍在上漲。联邦儲备局的经济顧問們指出,价格上涨势必妨碍需求,因为价格在1957年已提得过高,而在衰退时期也沒有向下調整以刺激购买。参議員約瑟夫·奧馬洪尼表达了劳工和进步人士的意見,他說,“通貨膨脹問題的症結在于美国经济力量的集中。”

許多工业品的价格不再是竞争性的了,而是由主要公司的高級經理人員以使投資得到最大的利潤为唯一目的而

决定的。因此，工业品批发价格即使在萧条时期也有促使一般物价和生活费用上涨的趋势。

公司利潤的起落

政府对所有公司在納稅前和納稅后的利潤總額所作的估計表明，利潤總額在1957年和1958年中都下降了。但是，对股东所付給的紅利却仍然不少，实际上在1957年还比1956年多4亿美元，1958年只减少了1亿美元。

下列商务部的修正后的估計，补充了以前各卷《劳工实况》所列举的关于这方面的估計。这些估計包括战前的1939年、战争时期的1945年以及从1949年起的最近10年。

在1958年上半年出現衰退时期利潤最低点，当时納稅前的利潤(按季节調整的年率)下降到略少于320亿美元。到了1958年第四季度，納稅前的利潤又上升到440亿美元左右。在同一时期，納稅后的利潤从年率156亿美元左右上升到224亿美元。但是，就1958年全年来說，納稅前的利潤總額只有367亿美元，稍低于1952年；而納稅后的利潤估計为180亿美元，接近1953年的水平。

年份	納稅前的 公司利潤	納稅后的 公司利潤	紅利支付	未分配的 利潤
(单位：亿美元)				
1939	64	50	38	12
1945	190	83	47	36
1949	264	160	75	85
1950	406	228	92	136
1951	422	197	90	107
1952	367	172	90	83

1953	383	181	92	89
1954	341	168	98	70
1955	449	230	112	118
1956	455	231	120	110
1957	434	218	124	94
1958	367	180	123	57

就最大的公司而言，利潤下降率小于所有公司的平均下降率。紐約花旗銀行對大公司的利潤總額的調查表明，整個名單上的3,574家公司的利潤，從1957年到1958年下降了約10%。但是，有幾類大公司在1958年所得的利潤却高於1957年，金融業814家公司的利潤則上升了14%。在所提到的利潤超過1957年的公司中，具體包括下列各業：食品、飲料、木器、航空運輸、電話和電報、水泥、農具、醫藥、食品連鎖商店、煙草、電力和煤氣、房地產公司、商業銀行、飯館和旅店以及投資托拉斯。

製造業公司的報告表明，利潤在1958年第四季度已從衰退時期最低點回升，比前一個季度提高了33%，比1957年最後季度增加了13%。1958年後期這種迅速回升，是1958年早春以後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所造成的。這種情況繼續維持到1959年，《紐約先驅論壇報》國內經濟問題專欄作者斯萊文在1959年2月27日指出這種情況，他寫道，“當失業的工廠工人難於找到工作的时候，公司的利潤却迅速上升。……表面上的解釋就是，勞動生產率正在迅速提高。”結果公司“正在撈回他們投在新廠房和設備方面的幾十億的美元”。

又一个冷战預算

在和平时期，美国政府的軍事費用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年这样多。自从干涉朝鮮以来，联邦預算中用于軍事費用的百分比还没有很大的减少。冷战是靠軍事部門、原子能发展(原子弹和氢弹)、儲存战略物資、对外軍事援助、国际事务和民防等等方面的开支来維持的。同时，战时債務的利息也在增加。

到1959年6月30日为止的財政年度的联邦預算，規定在809亿美元預算总額中，以626亿美元用于战争(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这是和平时期的最高纪录。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9年1月提出的从1959年7月1日开始的財政年度的接近“平衡”的預算，被国会认为是“不合现实的”，因而正在予以修改增加。这个預算規定开支总数是770亿美元，其中包括611亿美元的战争(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开支，即占預算的79.3%。

劳工和住宅建筑的支出仍然很少，1959年为住宅建筑增加的费用，在1960年却被取消了。从1951年以来，农业在預算中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1960年农业的开支却从68亿美元减少到60亿美元。

尽管民用支出已经削減，全国制造商协会却还要求再减少福利、教育、住宅、农业和公共工程支出30亿美元。

下表表明1951年(朝鮮战争达到最高峰以前)、1954年和1955年(朝鮮战争后)的实际支出数字，以及1959年和1960年的估計数字。括弧内是1960年各项支出所占的百分比。

到6月30日为止的财政年度

(单位: 亿美元)

	1951	1954	1955	1959 ^①	1960 ^②
战争费用——军事 及经济准备费用	262	486	428	498	479 (62.2)
退伍军人费用	53	43	45	52	51 (6.6)
战时债务利息	57	65	64	76	81 (10.5)
军费总额	372	594	537	626	611 (79.3)
劳工	3	3	3	8	4 (0.5)
住宅建筑	6	-5 ^①	2	11	2 (0.3)
农业	7	26	44	68	60 (7.8)
其他各种用途	53	60	60	96	93 (12.1)
支出总额	441	678	646	809	770 (100.0)

① 表示所收回的数字超过所支出的数字。

② 根据1959年1月19日总统预算咨文所作的估计。

政府当局大力宣传,在1959年赤字为129亿美元,而在1960年则有1亿美元的盈余。但是许多人都说,这只是一种纸面上的盈余。国会中的赋税专家们在1959年3月估计,收入将比总统在1月间提出的数字少13亿美元。同时,国会计划把导弹生产费用从33亿美元增加到38亿美元,对军事和民用开支也将有许多增加。民主党咨询委员会说,总统的“预算近乎对美国人民的欺騙”,这就是暗示说,政府并不打算按照它提出的估计来过日子。民主党领袖们要求增加五角大楼的开支,而不顾对近年来“国防”费用有很大铺张浪费的种种揭发。《商业周刊》在1959年3月14日作出结论说:“如果国会采纳了‘国防’专家们的意见,开支将增加约50亿美元。”

由于开支增加而收入减少,预计1960财政年度的预算

总额至少将发生20亿美元的赤字，而不会获得总统在预算咨文中所估计的1亿美元的盈余。

联 邦 赋 税

个人所得税仍然是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它已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增加了10倍(1941年为18亿美元，1950年为181亿美元)。下表表明，1951年此项收入为216亿美元，1960年估计为407亿美元(各年均为财政年度，例如，1960财政年度到1960年6月30日为止)。

在1959年度和1960年度联邦预算中，个人所得税第一次占全部岁入的一半以上，即1959年占54%，1960年占53%。与此相反，公司所得税的比重显著下降了。公司所得税在1954年为211亿美元，占总收入的33%，但1960年为214亿美元，将仅占28%。

到6月30日为止的各财政年度的各类税收比较表

(单位：亿美元)

税收的种类	1951	1954	1955	1959 ^①	1960 ^①
个人所得稅	216.43	295.42	287.47	369.00	407.00
公司所得稅	141.06	211.01	178.61	170.00	214.48
消 費 稅	86.48	99.45	91.31	84.67	89.45
就 业 稅	2.34	2.83	5.79	3.28	3.40
不动产和贈与稅	7.08	9.34	9.24	13.65	14.15
关 稅	6.09	5.42	5.85	8.40	9.00
杂 稅	16.20	23.09	25.62	31.00	33.52
总 計	475.68	646.55	603.90	680.00	771.00

① 根据1959年1月19日总统预算咨文所作的估计。

1958年，稅法有了一些修改，对所謂小企業公司給予了某些減稅優待。例如，股東在10人以下的公司可以選擇不交納公司所得稅，而由股東交納所得稅，这样就避免了所謂双重納稅。这种優待对于非公司的很小的企業显然沒有影响，但是它却适用于許多不小的公司。

兩党都沒有建議全面修改稅法，以減輕收入少的各類人的稅。民主黨人斷然反對總統提出的增加汽油稅和郵費的建議。政府指望用減稅的辦法來“幫助企業和巨額納稅人”。（1959年2月7日《商業周刊》。）

在最近的將來沒有堵塞勞工屢次指出的聯邦稅法中許多漏洞的希望。對於財政部由於這些使富裕的個人和公司得到好處的漏洞而損失的稅收數額，人們有不同的估計，估計為從每年75億到165億不等。（參閱勞工研究協會出版的小冊子《賦稅負擔》。）主要的漏洞之一就是，給予石油業、煤氣業、採礦業及其有關工業的最多達27.5%的資源枯竭津貼。國會中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聯盟反對改變公司的這種生財之道。

州和地方的賦稅

雖然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目前的沉重賦稅負擔是聯邦政府所加給的，但是州和地方政府所徵收的稅却越來越重要了。隨着美國政府的冷戰費用再次增加，民用公共事業的負擔日益落到州和地方政府的身上。反動勢力一直企圖使更多的賦稅轉移給州去徵收，因為各州的徵稅辦法比聯邦一級的賦稅更不公平和更具有收入愈多納稅愈少的遞減性質。

在1958年6月30日截止的財政年度中，各州的岁入总額將近150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將近3%。下一年度提高稅率在更多的州內征收新稅的計劃正在草擬中。地方稅收數額(大部分来源于財產稅)在最近几年中差不多已同各州的稅收數額相等——1957年約為145億美元。

1957—1958年的經濟衰退使各州收入的增长放慢，同时使各州增加了支出。消費者購貨緩滯使銷售稅和消費稅收入數額減少，而經濟衰退又增加了各州在福利計劃、建築和其他旨在緩和大量失業現象的影响的計劃上的支出。

勞聯—產聯出版的手冊《州和地方的賦稅》談到，這些稅的收入“不僅數額龐大，而且不斷增加，它們負擔着專用于非軍事目的的全部公共支出(教育和社会福利，管理和警務，經濟發展和資源開發以及政府所擔負的其他一切公共事業)的三分之二左右。”

銷售稅的負擔 銷售稅是所有賦稅中最不公平的，因為這些稅對最沒有負擔能力的家庭打擊最重。但是，1958年的州的銷售稅却征收到將近90億美元之多，即占全部稅收的58%以上。在17個州中，銷售稅占全部稅收的70%。

各州的“一般”銷售稅是對所有出售的商品征收的，有時也對像飯店的飲食、旅館的房間和娛樂等勞務征收。1958年有33個州征收一般銷售稅，其中有24個州的一般銷售稅還包括食物和藥品。

對於煙草和汽油這些特殊商品則征收“特種”銷售稅(有時稱為消費稅)。各州都征收這種稅。在1958年這種稅共占各州岁入總額的將近35%。稅收的其余部分就是一般銷售稅，在某些州中，還有总收入稅。

其他賦稅 關於1957年各種州賦稅的統計表明，在12

个主要的州中，一般銷售稅(包括征收总收入稅的几个州)占全部稅收的23.2%；汽車燃料銷售稅占19.5%，汽車牌照稅占8.9%；所得稅(个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占17.6%。有一小部分(2—3%)是来自对烟草、酒和公用事业等征收的特別銷售稅。

到1958年，約有三分之二的州都征收某种所得稅。但是有17个州沒有个人所得稅，13个州既沒有个人所得稅，也沒有公司所得稅。

在像宾夕法尼亚这些州里，市政当局可以对工資征收所得稅，但是它們不能对从投資和公司利潤得到的收入徵稅，也不能对所得稅使用累進稅率。在許多州中，对于家屬的免稅点和減稅点規定得很低，以致收入少的家庭遭到不利，而且起征点既低，稅率相若，或差別很小，这使富裕家庭所納的稅保持最低限度。1959年，洛克菲勒州长統治的紐約州把免稅点降低到600美元，使收入最少的人也要繳納所得稅。

劳工方面认为，大多数州和地方的賦稅都违反了量力納稅的原則。銷售稅和工資稅等遞減稅以及很容易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的營業稅等，都使納稅能力最小的家庭負擔最重。

劳联—产联的賦稅方案要求改革州和地方 的賦稅制度。在地方上，这个方案将改进地方的財產稅，反对地方的銷售稅和工資稅，并且規定增加由州征收而地方分成的各种稅。在州一級，它将改进現行的所得稅，减少銷售稅的影响和增加商业利潤的賦稅負擔。

第二章 劳工情况和社会情况

收入的分配

根据联邦储备局在1958年9月《联邦储备公报》发表的《1958年消费者经济概况》报告说，将近1,200万消费者“开支单位”，即美国全部“开支单位”的五分之一左右（21%），在1957年纳税前的总收入不到2,000美元。但是2,000美元仍然被认为是最低的生活标准，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这个标准，它的健康和福利就要受到损害。

根据联邦储备局同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编出的这些年度调查报告所下的定义，一个“开支单位”包括把收入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所有有关的人。丈夫、妻子和住在家里的不满18岁的子女，向来被认为是同一个开支单位的成员。

大约有2,850万个单位，即全部消费者开支单位的一半，货币收入不到4,350美元（1957年的中等收入）。表明1957年5,690万个消费者开支单位纳税前货币收入的分布情况的百分数可以累进地分列如下：

4,550,000 个开支单位（即8%）

每个单位货币收入不到1,000美元

11,950,000个开支单位（即21%）

每个单位货币收入不到2,000美元

18,208,000个开支单位 (即32%)	每个单位货币收入不到3,000美元
25,605,000个开支单位 (即45%)	每个单位货币收入不到4,000美元
32,433,000个开支单位 (即57%)	每个单位货币收入不到5,000美元
46,658,000个开支单位 (即82%)	每个单位货币收入不到7,500美元
10,242,000个开支单位 (即18%)	每个单位货币收入在 7,500 美元以上
4,552,000个开支单位 (即 8 %)	每个单位货币收入在10,000 美元以上
1,138,000个开支单位 (即 2 %)	每个单位货币收入在15,000美元以上 ^①

① 1957年沒有报告。这是根据以前的調查所作的估計。

这些数字表明,在全部家庭(开支单位)中,約有三分之一在1957年的收入不到3,000美元。根据联邦儲备局的这项調查,估計約有三分之二(66%),即在全部消費者开支单位中約有3,700万个单位在1957年不能达到海勒委员会关于家庭預算的不大高的生活标准。这个1957年的工資收入者的家庭預算要求全年收入至少为5,830美元。(見下文。)

这些消費者开支单位中,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得到納稅前貨幣总收入的29%,而最低的十分之一只得到总額的1%。消費者开支单位的上面一半得到貨幣总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78%),而下面一半只得到总收入的22%。

少数人有儲蓄 联邦儲备局的調查同时还表明了每年各类收入的人所掌握的流动资产形式的儲蓄的數額。1959

年初，四分之一以上(26%)的开支单位沒有任何种类的流动资产——沒有美国儲蓄券、儲蓄帳戶或活期存款。

在全部开支单位中，拥有500美元以上流动资产的还不到半数，而只有大約十分之一的开支单位拥有5,000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在最上面的是仅占全部开支单位4%的一小部分单位，每一单位拥有10,000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

联邦儲备局的調查报告指出，“由于流动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收入中积累起来的，因此流动资产通常是握在收入較多的各阶层手中便不足为奇了。拥有庞大流动资产的，大多属那收入最多的五分之一的单位。”

国情普查局对家庭收入的調查 据国情普查局报道(1958年12月《消費者的收入》)，在全国4,370万个家庭(和上述“开支单位”不同)中，約有650万个家庭即15%左右的家庭(每七家中有一家)，在1957年的收入不足2,000美元。約有2,270万个人包括在这些低收入的家庭之内。至少有1,070万个家庭一年的收入不到3,000美元。这些家庭的人数总計約为3,750万。在最底层的是大約280万个家庭，即1957年全部家庭数的6%以上，收入不到1,000美元，而3%，即約130万个家庭在这年的收入不到500美元。在这个等級表的另一端，約有812,000个家庭，即将近全部家庭数的2%，每一家庭在1957年的收入为15,000美元以上。据国情普查局报告，約有400万个家庭，即全国家庭数的十分之一，收入为10,000美元以上，还有1,800万个家庭(五分之二)的收入在5,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間。各类收入阶层的最上层是占百分比很小(0.5%)的約218,600个家庭，其中每个家庭的收入，为25,000美元以上。

1957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4,971美元，这說明在这一

年中約有2,180万家庭的收入不到此数。1957年家庭平均收入約比1956年多4%，但是国情普查局指出：“货币收入中增加的200美元大概并不代表一般家庭的购买力有重大的改变，因为在这个时期里物价也上涨了很多人。”消费者物价指数在这一年里上涨了将近4%。

黑人的收入較低 据国情普查局报告，就全国而言，1957年在全部黑人家庭中有一半家庭的收入不到2,764美元。黑人家庭收入的这个中位数(2,764美元)比白人家庭的中位数5,166美元的一半稍多一点(約为53%)。

在农村，这个差别要大得多。全部黑人农民家庭中有一半收入不到919美元(中位数)，不到白人农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2,833美元的三分之一。

在南方，全部黑人家庭中有一半在1957年的收入不到2,022美元。这个中位数不到南方白人家庭的中位数4,373美元的一半(約为46%)。

实际工資和工資差額

美国劳工統計局每月报告制造业生产工人的每周平均收入。它首先列举按当时美元計算的这些工人每周平均总收入，然后列举按1947—49年的美元計算的收入。这样把消费者物价的变动計算在內，因此就反映了“实际收入”。这种“实际工資”数字的計算，也为了表明两类工人在从他們工資袋里扣除联邦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稅以后实际上拿回家去多少。它所举出的两类工人的例子是一个沒有家属的工人和一个有三个家属的工人。賦稅負担数額当然因工人贍养的家屬人数而异。

关于每周可以动用的平均净收入的最近数字，反映出自从1957年初起生活费用一直在上升。这些数字表明工厂工人的每周可以动用的平均净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很多。按当时美元计算的每周平均总收入从1957年1月的平均数82.41美元增加到1958年10月的85.17美元。但是以1947—49年不变美元计算，则工厂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周减少了将近1美元。下表表明，这些工人在工资扣除赋税以后，实际拿回家的工资也减少了。全部平均数字都是用1947—49年的美元计算的。

时 期	每周平均 总收入	每周可以动用的平均净收入	
		没有家属的工人	有三个家属的工人
1957年1月	69.72美元	57.17美元	63.44美元
1957年全年	68.64美元	56.21美元	62.37美元
1958年10月	68.85美元	56.43美元	62.45美元
1958年全年	67.78美元	55.57美元	61.58美元

尽管1957—58年有些工会取得了每小时工资增加几分钱的結果，正如下面所指出的，工厂工人每周平均总收入按1947—49年的美元计算，从1957年1月的69.72美元减少到1958年10月的68.85美元。就没有家属的工人而言，按每周可以动用的平均净收入计算的拿回家的工资，从1957年1月的57.17美元减少到1958年10月的56.43美元。就有三个家属的工人而言，平均拿回家的工资从1957年1月的63.44美元减少到1958年10月的62.45美元。就1958年全年而言，工厂工人每周的实际工资平均比1957年减少将近1美元，比1956年减少将近1.5美元。

标准以下的工资 在许多地区，纺织工人受到失业和部分时间工作的严重影响（见本章《经济衰退的若干影响》

一节),以致他們的平均收入大大低于制造业的全国平均收入。在1958年7月参議院研究紡織工业的小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紡織工人工会研究部主任所罗門·巴尔金說明,整个制造业每小时平均工資和紡織业平均工資之間的差額正在不断扩大。

据劳工統計局报道,在1958年10月,紡織工人的平均工資为每小时1.52美元,而整个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資为2.14美元,相差0.62美元,即将近30%。工会指出,在1947年,工厂工人和紡織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資的差額仅为16%。

在一些紡織工业的城市中,工厂外迁和经济衰退結合起来使紡織工人的工資大大地低于其他工业的平均工資。例如,在馬薩諸塞州的福尔河,1958年10月的每周平均工資仅为58.72美元;在新貝德弗德,只有60.59美元;在另一个紡織工业中心即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則仅为60.26美元。在全国所有制造业中,当时每周平均工資为84.96美元,因此差額为29%到30%。

1957年和1958年对工資比較低的各种工业进行的調查,表明了根据公平劳动标准法把生产州际貿易商品的工人的最低工資从0.75美元提高到1美元的效果。据1958年9月劳工部报道,在1956年3月1日,即在新的最低工資标准生效之前,八种工业中的生产工人,即并非担任監督工作的工人,每小时工資不到1美元的占41%到82%。約有200万工人由于这次最低工資的改变得到了好处。

在实施每小时最低工資为1美元的办法以后,这些工业仍然是平均工資最低的。1958年10月,美国整个制造业的每小时平均工資为2.14美元,但是,在上述八个工业中每小时平均工資比全国平均数低17%到45%;工作服制造业

为1.16美元；南方的锯木业为1.24美元；男子和男童衬衫制造业为1.29美元；南方的无缝袜类制造业为1.36美元；木制容器制造业为1.46美元；废品加工业为1.51美元；鞋袜制造业为1.53美元；肥料制造业为1.77美元。

在一般不适用公平劳动标准法的零售商业和服务业等非制造业中，每小时平均工资比制造业全国平均工资要低很多。例如，在1958年10月，工厂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为2.14美元，而零售商业生产工人，即并非担任监督工作的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只有1.71美元。一般杂货店工人的工资平均只有1.35美元，洗衣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1.14美元。1958年纽约市有些医院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只有0.85到0.95美元。有些工人全部时间工作的工资少到每星期30美元。

要求提高最低工资 在1957年和1958年，工会一直继续努力要求把公平劳动标准法所规定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1美元提高到1.25美元。甚至有一个企业主也主张用这种提高工资的办法来使他自己的公司得到好处。伯林顿工业公司总经理席斯潘塞·洛夫，在1958年12月2日要求把联邦最低工资从每小时1美元提高到1.25美元，作为他那工业的工资普遍提高的“唯一公平而积极的”手段。他说，由于当前的竞争情况，任何一个公司都不能单独提高工资，但是联邦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对整个工业发生作用。

劳联—产联在它第八十六届国会提出的立法纲领中，要求“扩大公平劳动标准法的适用范围和把最低工资至少提高到每小时1.25美元”。（着重点是原有的。）它力图扩大公平劳动标准法的适用范围，使该法适用于目前还不适用的大约1,000万人，包括零售业、服务业和农业中的工人。

采用“工作权利”法的各州 劳联—产联在它1958年的小册子《工会保障》中指出，“全国每周工资最低的是密士失必、阿肯色和南卡罗来纳这些实行‘工作权利’法的各州。”1957年，在18个（1958年增加为19个，见第四章）订有这种反工会法的州中，有16个州的每周平均工资比美国的平均工资84.2美元低7%到30%。但是，在沒有实行“工作权利”法的西部三个州中，每周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工资高：加利福尼亚州是93.39美元；俄勒冈州是84.47美元；华盛顿州是86.98美元。在西部这三个州中有两个，即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在1947—1957年的10年中，每周工资的增长比全国平均工资的增长数还要大。

1958年10月，全国制造业生产工人的每周工资平均为85.17美元。但是大多数采用“工作权利”法的州的平均工资要低得多。在黑人白人合校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的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工厂工人的每周工资是在全国最低之列，平均只有61.69美元。只有北卡罗来纳州（58.87美元）和南卡罗来纳州（58.44美元）的每周平均工资比它更低。

工会合同关于增加工资的规定

1957年初期，在经济衰退开始以前，各工会取得的工资的增加，一般地说比1956年为大。大多数是每小时增加0.1美元以上，而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会的情况是提高工资0.13美元以上。大约15%的解决办法是每小时增加0.05或0.06美元。但是，所取得的工资增加中有许多只不过是部分地弥补劳工统计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表明的物价的上涨。这一年期间，物价的上涨使得工资处在“自动”调整情况下的

四百多万工人的工資增加了。在这“自动”調整的情况下，工資是按劳工統計局的指数所測出的生活費用的具体变化而自动增减的。

总共有五百多万工人由于生活費用的調整，以及（或者）由于前几年談判后所取得的迟迟共来的工資增加，而增加了工資。这个官方估計包括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公用事业、貿易和建筑业。

在1957年后期，大多数工資增加規定是每小时增加0.1美元以上。在增加工資方面的主要发展之一是10月底和11月美国通訊工人工会所簽訂的合同，該合同适用于15万以上貝尔电话系統的工人。它規定每周工資增加2美元到5美元。

1958年 在1958年中，大多数进行集体談判的工会都获得了工資的增加。在这些进行集体談判的工会中，有7%左右不得不接受不增加工資的新合同。

据劳工統計局报告，在主要集体談判合同所适用的职工中，有85%的工資率，在1958年中已经談判决定增加或者已经实行增加。这些談判一共影响到約680万个工人。在这个总数中，有350万工人根据这一年內簽訂的解决办法增加了工資。有許多合同則在提高工資率之外还补充了根据生活費用的变化而調整的規定。約有330万工人根据以前几年談妥而在1958年生效的迟迟共来的工資增加和生活費用的調整的規定而增加了工資。

大多数工資的提高平均为每小时0.12美元，在十个工人中有六个至少得到了这个数目。就实际工資率的增长而言，1958年談判取得的最普通的平均增长数是每小时0.08美元。

劳工統計局这些关于工資增长的报告，涉及到所有工业中影响到1,000以上工人的集体談判的情势，但建筑业、服务业、金融业和政府机关除外。因此，这些报告不包括这四个行业中的工資的增长，也不包括受影响的工人不到1,000人的一些小組織的工資的增长。

汽車工人的解决办法 三大汽車公司所雇用的大約75万属于汽車工人工会的工人，根据同福特汽車公司、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簽訂的合同而增加了工資（同这三家公司簽訂合同的日期为：福特汽車公司，1958年9月17日；克萊斯勒汽車公司，10月1日；通用汽車公司，10月2日）。在为期三年的合同中，汽車工人工会取得了每年每小时平均增加0.07美元的結果，并分別在1958年7月1日、1959年8月1日和1960年9月1日开始履行，其規定是每小时增加0.06美元或每小时基本工資增加2.5%，以增加較多的办法为計算根据。該工会还根据消費者物价指数的提高而得到了每小时0.03美元的生活費用津貼。

工具和铸模、維修、建筑、电力厂等方面的各种技术工人，要求每小时工資提高0.35美元，但是結果只增加了0.08美元。路德主席力图取得“汽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工資的增长”和一个为期两年的合同，但是結果他接受了較长期的合同和同旧合同所規定的那样每年增加工資2.5%的条件。这种工資增长被称为是以工厂中劳动生产率的正常提高或工作效率的改进为基础的“改进因素”。（至于其他的工資的增长，可參閱关于1957—58年罢工情况的一节。）

工資增长的经济影响 劳联—产联在《经济趋势》（1958年11月）中估計，在1957年8月至1958年4月经济衰退期間，工人通过集体談判而取得的这些工資和薪金的增

长“大体上抵銷了可能由于失业和縮短工作周而造成的工資和薪金总数下降数字的一半左右”。这一劳工期刊引用了《商业和金融紀事报》(1958年7月31日)所报道的哈佛大学教授薩姆納·斯利克特的談話：“个人收入稳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掙工資和薪金的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提高……如果在1957年8月至1958年6月之間掙工資和薪金的工人的每小时工資沒有变动，那么工資和薪金支付年率就会下降156亿美元，而不是55亿美元。因此，从8月到6月期間，每小时工資的增长数额，到6月的时候，便給工資和薪金收入增加了年率101亿美元。”

家庭預算标准

近年来提出了几种不同的家庭預算，目的在于回答这样一个問題：一个工人为了按照所謂美国标准来維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必須掙多少錢。这些預算数字往往可以作为工会进行談判的根据。

城市工人家庭的預算 1951年10月美国劳工部曾經計算34个主要城市四口之家(丈夫、妻子和两个学龄儿童)的“朴实而充足”的生活标准所需要的費用。劳联—产联(在它的1958年6月的《集体談判报告》中)考虑到七年內物价和联邦賦稅的增长，把1951年的数字加以調整，調整为1958年4月20个城市的数字和一个所有城市的数字。所有城市的平均数为一年4,656美元，即每周約90美元。各城市的数字从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頓的4,288美元起，到旧金山的4,998美元止。紐約市的数字是4,543美元。

这个預算指出了朴实的美国生活标准的所謂最低限度

的需要。它受到广泛的批评，被认为远不是充足的。劳工方面评论这个数额“的确朴实”。食品费用很少，四口之家每天只能得到不足两夸脱的牛奶，每人每天还得不到一个鸡蛋。没有规定电话费用，只规定每星期平均打三次电话。在三、四年内，一个家庭只能离家度假或离开城市探望亲友一次。这个预算规定了一份人寿保险，每年所付保险费为85美元。在这个最低限度的预算中，没有规定任何其他储蓄。

这个预算虽然已如此朴实，但它仍然是数百万个家庭所不能达到的标准，这些家庭的户主的工资低于预算所要求的每周90美元的平均工资。在1958年4月制定这个预算时，全部制造业的工厂工人的每周平均工资为81美元，比这个预算标准低9美元。

在提出最近的估计数字时，劳联—产联指出，“同普遍的印象相反，南方城市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城市的生活费用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在南方城市中过与其他城市相似的生活，需要同样多的钱。”

海勒预算 许多年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海勒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每年都估计这个委员会的预算所需要的费用，以便提出一个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工资收入者的四口之家（包括丈夫、妻子、13岁的男孩和8岁的女孩）的生活标准。虽然这个预算只是为旧金山湾地区估计的，但是一般人都把它看成是全国的标准预算。工会在进行集体谈判时常常援用这个预算，它所规定的物品和劳务比“城市工人家庭预算”多15%。

到了1958年9月，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海勒为房客家庭作的预算增加到每年6,087美元，即每周平均约为117美元。

这仍然是“維持健康和合理的舒适生活所必需的”朴实的标准。

对于住宅为自己所有的工资收入者，1958年的預算要求6,435美元，即大約每周123美元。自有住宅者的費用所以較高，是由于有不动产稅、房屋維修費、水电費和其他开支。

对于房客家庭，1957年預算只允許每月用63美元来租一所有四、五間房子的住宅。它所允許的仅有的儲蓄是人身保險，包括人寿保險費每年119美元（即每周2美元多一点），社会保障費每年94.5美元（每周1.82美元），以及加利福尼亚残废保險費每年30美元。

当海勒的这个預算在1958年9月編制时，制造业工人的收入每周平均約为85美元，即每年約为4,420美元。因此，每周平均收入比海勒預算低38美元，也就是說每年約低1,970美元。

对于領薪金的低級自由职业人員或行政人員，海勒委员会編制了另一个生活标准高得多的家庭預算。这个領薪金人員的預算每年費用达到9,202美元（根据1958年9月編制的預算），即每周約为177美元。

紐約居民委员会編制的預算 大紐約居民委员会主办的預算标准服务处，在1957年10月为四口之家編制了另一个預算。它采用了“城市工人家庭預算”所提出的生活标准，并且在这个預算中加入了有关家庭生活需要的新情况。

这个預算包括“在一年中典型的购物单，它足以維持当前費用很低的适当的消費标准”。按照在1958年編制的甚至不充足的生活标准預算，在紐約每周也需要有86美元，即每年約4,470美元。

福利待遇

在最近两年的集体谈判中，工会得到了更多的福利待遇，包括改善保健计划和人寿保险计划、提高养老金、增加工资照付的假日、离职津贴和改进关于假期的规定。1958年，约有三分之一(33%)的解决办法在保险计划方面有了改善：养老津贴增加14%，离职津贴增加3%，失业补充津贴增加将近1%。

美国劳工统计局对通过集体谈判制订的保健和福利计划进行了特别研究。它分析了300个计划，每一个计划都涉及1,000人以上，总共涉及4,981,000个工人。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计划都规定所有这六种基本的保健和福利措施：人寿保险、意外死亡和四肢伤残保险、每周疾病津贴、住院津贴、手术津贴和医疗津贴。

劳工统计局在1958年对主要工业中的100个这类保健计划和保险计划进行了另一项研究。它发现，在一半以上的计划中，人寿保险在过去四年中有了增加。最普通的增加数目是从500美元到1,500美元。在它所研究的计划中，将近一半的人寿保险费达到4,000美元以上，而在大约三分之一的计划中，人寿保险费规定为从2,000美元到4,000美元。有八个计划把关于人寿保险的规定推广适用于退休的工人。

差不多所有的计划都为在业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规定了可以住双人病房或病床的住院津贴。津贴一般是每天10美元，但是有许多计划规定每天12美元，将近三分之一的计划规定每天14美元以上。在19个计划中，住院津贴推广适用

于退休的工人。約有90%的計劃为女工和作为家属的妻子規定了生育津貼。

籌款的方法 通过集体談判規定的保健和福利計劃大部分現在都是由僱主負擔全部費用。有58个計劃（即一半以上的計劃）适用于在业工人；有47个适用于在业工人的家属的計劃所需款項完全由僱主負擔。有34个（即三分之一以上）适用于在业工人和他們家属的計劃所需款項是由僱主和工人共同負擔。

把保健和福利保險扩大适用于退休工人的家属是最近几年中工会所取得的重要成績之一。34个規定对退休工人付給保健和保險津貼的計劃和21个包括他們的家属的这种計劃，規定所需款項由僱主单独負擔。約有三分之一包括对退休工人及其家属付給津貼的計劃所需款項，是由僱主和退休工人共同負擔的。

工 作 时 間

1957—58年的經濟衰退使1957年和1958年每周平均工作時數減少了。

在整个制造业中，每周平均工作時數从1956年每周40.4小时減少到1957年的39.8小时和1958年的39小时。每周平均工作時數从1958年4月的最低点（当时制造业每周平均工作時數仅为38.3小时）增加到年底的40.2小时。采矿业每周平均工作時數从1956年的41小时減少到1957年的40.4小时和1958年的39小时。（4月的最低數仅为37.4小时。）

美国劳工統計局在对1957—58年冬季17个劳动市場的

工作周、加班和輪班工資進行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職員和工厂工人都按照預定的40小时工作周进行工作。勞工統計局报道，只是在它所研究的南方四个地区(亚特兰大、巴尔的摩、孟菲斯和新奥尔良)和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有10%以上的工人每周劳动40小时以上”。

工会的政策和計劃 在1958年，特别是在有些公司企图要求在业工人做加班工作的时候，工作時間問題在工会中成为一个更为明确的問題。底特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在1958年11月命令它所雇用的几千名汽車工人加班工作，而以前雇用过的許多工人却仍然沒有职业。在道奇工厂，在曾經为最新型汽車工作的22,000名工人中只有8,000名工人被重新雇用。11月初，联合汽車工人工会的在业的和失业的會員在道奇和克萊斯勒一第所托工厂中布置了糾察线，对一部分人加班工作而許多人失业的現象表示抗議。

在那一次，联合汽車工人工会宣布，只要有半数以上的會員沒有工作，就不能允許加班。据报道，人們越来越要求縮短工作周而不减少淨得工資，以便使更多的失业工人能够得到职业。

1957年4月，汽車工人工会全国會議一致投票決定，要把縮短工作周而不减少工資作为集体談判的第一項要求。但是在1958年同三大汽車公司簽訂为期三年的合同的談判时，該工会主席华尔特·路德放弃了縮短工作時間的要求，理由是一般经济气候“不利于勞工”。

在1957年和1958年，許多工会主张在不减少每周工資的情况下把工作周縮短到40小时以下，以此作为維持就业和避免因技术改进而造成失业的可取的办法。劳联—产联在它的1957年的大会上要求“不要把先进的技术变成使失

业增加的力量，而要使它成为通过缩短工时、不减净得工资而增加闲暇时间的力量”。

经济衰退使更多的工人更看到有缩短工作时间的必要，现在缩短工作周已经成为劳工计划的主要部分。在1958年重新表示打算要求缩短工时而不减工资的工会有钢铁工人工会、橡胶工人工会、屠宰工人工会、电气工人工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和西海岸码头工人工会。在纽约地区，约有18,000名码头工人在1958年11月18日举行示威，反对他们所称的码头上的“自动化”，对每天工作六小时的要求表示欢呼。1958年10月15日《华尔街日报》评论道，“1959年可能成为很大一部分工会坚持要求大大地减少工作时间的年。”

屠宰工人于1958年4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屠宰工人工会的地区会议上，投票赞成以每周工作30小时来代替目前的每周工作40小时的制度。橡胶工人工会在迈阿密海滨举行的1958年年会上，要求整个橡胶工业实行每周工作30小时的制度，而每小时的工资要增加到足以维持1958年的每周收入水平。许多年以来这个工会在俄亥俄州阿克伦（主要的橡胶工业中心）的工厂中都已实行每周工作36小时的制度，即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6小时。

电气工人工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在1958年8月31日开始同通用电气公司谈判时，建议将每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减为35小时（分两次减少，第一年减为37.5小时，第二年减为35小时），工资不减。参加工会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人甚至建议公司在负担工作周缩短的费用以外，还应该实行根据合同应当对他们实行的增加工资办法，以补偿由于缩短工作周而引起的损失。但是，《联合电气工人新闻》（1959年

1月19日报道說，通用电气公司“沒有认真注意”这个建議。

建議公平劳动标准法規定35小时工作周 統一服装工人工会于1958年5月在阿特兰提克举行两年一次的大会时，要求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把各工业的基本工作周由目前最高限額40小时减少为35小时，作为应付经济衰退的一种长期保障办法。同时，該工会要求将每小时1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資增加0.25美元。

劳联—产联的产业工会部在1957年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要求逐步减少公平劳动标准法所規定的每周工作时数最高限額。

在第八十五届国会上，参議員帕特·麦克納馬拉(密执安州民主党人)在参議院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規定35小时工作周，超过此限額者一律給予加班費，但是，該法案在委员会中就被扼杀了。在第八十六届国会上，参議員麦克納馬拉再次提出規定在一年內实行35小时工作周的法案。众議員詹姆斯·罗斯福(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公平劳动标准法規定在四年之后将工作周减至35小时。其他一些国会議員也提出了类似的方案。

社会保障的发展

1958年8月29日第八十五届国会通过一項法律，对社会保障法作了一些重要修正。這項法律不仅增加了社会保障津貼，而且也增加了在各州及地方机关所支配的福利經費中联邦政府所分担的份額。

這項新法律規定從1959年2月3日起增加1,200萬領取老年和遺族保險金的人的每月津貼7%，在這1,200萬人中，有960萬是退休工人，其餘240萬是寡婦、妻子、其他家屬或完全殘廢的人。

這次增加使個人最低津貼從30美元增加到33美元（增加了10%），個人最高津貼從108.5美元增加到116美元，家庭津貼也有相應的增加。對於在65歲退休的一對夫婦，每月最低津貼從45美元增加到49.5美元（增加了10%），最高津貼從過去的162.8美元增加到174美元。

在1958年年中，還沒有增加津貼之前，退休工人養老金每月平均僅為65.71美元，即每周15美元多一點。從1959年2月起增加7%，這就使每月養老金平均大約增加到70美元，即每周16美元多一點。退休女工得到的養老金比男工少，因為她們在工作期間的工資平均比男工低。這種差別在1956年社會保障管理局的報告（關於這個問題的最近的一個報告）中表示得很明顯；當時男工退休津貼每月平均為75.76美元，但是，女工退休津貼每月僅為54.33美元，每月相差21美元以上。

7,500萬工資收入者和僱主所繳納的供社會保障之用的工資稅，從1959年1月1日起，每人增加0.25%，而達到2.5%。不受僱用的獨立工作者繳納的稅增加到3.75%。目前，這種稅適用於工資中的第一個4,800美元，而不是4,200美元。最後，在三年內每一個僱主和被僱用的人所繳納的社會保障工資稅將增加到4.5%，不受僱用的獨立工作者所繳納的將增加到6.75%。

社會保障法適用範圍擴大 由於社會保障法的範圍逐漸擴大，現在美國10個從事有報酬工作的人中有9個都包

括在內。不在社会保障法适用范围内的人当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受到联邦、州及地方的其他退休计划的保障。总劳动力大約有6%不受任何政府退休计划的保障，这些人是收入低微的不受雇用的独立工作者，每季从雇主所得不到50美元的农业工人和家庭佣人，以及医生。医生仍然沒有包括在社会保障法之內，因为反动的美国医师协会反对社会保障。

1958年的修正使一些从前不包括在內的季节工人和更多的宗教、慈善与其他非营利社团的职员可以享受社会保障。

目前退休工人每月可以去掙取不超过100美元的收入（每年以1,200美元为限），而不致丧失領取任何津貼的权利。任何一个月只要退休工人所掙的錢不超过100美元，都不会失去該月領取津貼的权利。如果工人年滿72岁，不管他一个月掙了多少，他都可以領取全部津貼。

受救济的人数 1958年年中，根据五个联邦公共救济计划，得到救济的人有670万，比一年前約多80万。1958年4月受救济的人数达到了680万的高峰。

在受救济的总人数中，有273万是賴人贍养的儿童。領取老年救济（不是老年和遺族保险金）的人数是246万，其他三种救济计划包括108,000个盲人、313,000个終身完全残废的人和1,164,000个（共418,000起）領取“一般救济”的人。

1958年年中領取“一般救济”的起数比1957年年中多42%，領取救济的总人数比1957年年中多71%。增加最多的是在1957年冬季和1958年初春，当时经济衰退达到了最低水平。在“一般救济”的名册中，增加的人包括許多領取

失业保险津贴期限已滿沒有再領取这种津贴的权利的失业者。

1958年修正的社会保障法規定一种新的办法，扩大联邦政府在公共救济計劃中的負担份額。在付給 246 万个領取老年救济金的人的款項中，联邦政府所負担的份額从 55.7% 增加到 58.5%。1958年 2 月总統提出了恰好相反的建議，主张逐漸把联邦負担的份額减少到 50%，而逐漸增加州和地方所負担的份額。1958年的修正案把三种关于儿童的計劃的最高限額增加約 500 万美元。这三种計劃是：产妇和儿童保健事业的計劃，残废儿童福利事业的計劃和儿童福利事业的計劃。

款項得到联邦政府的分担而由地方机关来分配，但是，却沒有一个关于“一般救济”——对其他各种貧困人民的救济——的全联邦的計劃。領取“一般救济”的起数在 1958 年 4 月总計为 454,000 起，到 1959 年 1 月增加到 466,000 起，計 1,362,000 人。

提高最低津贴的建議 由于社会保障法所規定的最低津贴每日仍然只有 33 美元，許多退休工人仍然必須依靠某种公共救济或公共福利来勉强維持最低生活。1959 年 2 月 2 日紐約州共和党众議員保罗·菲諾在国会提出了一項法案，把社会保障最低津贴数额提高到每月 50 美元。他說：“我們要我国的某些人依靠每月少到 33 美元的津贴来生存——而不是生活。”

失业和失业津贴

美国国情普查局估計，1958 年 6 月失业总人数达到了

540万的最高峰——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41年夏季以来全失业者的最高数字。根据官方估计，失业人数从1956年12月的2,479,000人增加到1957年12月的330万人，在以后的三个月中仍然继续增加，在4月和5月稍稍下降，但是到了6月又增加到540万人。到12月中旬仍有410万人失业，在1959年1月失业人数增加到470万人。

普查局报告说，全失业者在民用劳动力中所占百分比从1956年12月的3.8%（按季节调整）增加到1958年8月的7.6%，1958年11月下降到5.9%，1958年12月又重新增加到6%。

其他估计 但是，普查局并没有把许多实际上失业的人和仅能找到部分时间工作的人计算在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独立的工会）在其研究部进行的一项新研究中，调整了普查局的数字，把这样一些人包括在内，即“如果1956年充分就业情况继续存在的话，他们是会正在工作的，然而普查局却把他们排除于劳动力之外”。它也把那些因经济原因不得不从事部分时间工作而被普查局当作全就业计算的人也包括在内。

在作了这些调整之后，它发现官方估计1958年6月的540万的最高峰，应该增加110万“没有列入劳动力”的隐藏的失业者和170万被当做全就业而实际是被迫从事部分时间工作的人。因此，调整后的失业总人数在1958年6月是820万人，比普查局官方关于全失业人数的估计将近多280万人，而占民用劳动力的11.6%。

劳工研究协会经常估计所谓“后备劳动队”或“没有利用的劳动力”。这个估计包括全失业人数（普查估计）、武装部队的人数和从事“防务”或“国家安全”工作的人数。劳工

研究协会最近对沒有利用的劳动力的估計表明，在1958年第三季度大約有1,200万人即将近总劳动力的18%都属于这三类。(見劳工研究协会《经济札記》1959年1月号。)最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除非創造新的工作机会，有些目前失业的人是不会再被雇用的。1958年11月，美国劳工統計局长伊万·克累格估計，如果要使失业人数减少到以前“繁荣”时期的水平，必須采取下述措施：第一，要創造工作机会来代替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取消的工作机会；第二，增加工作机会来容納現有的失业者；第三，增加工作机会以吸收每年增加的大約70万或80万的劳动力。

铁路工人受到严重打击 在过去两年，失业是铁路工人所面临的主要問題。1958年一級铁路平均只雇用840,880人，比1957年平均数984,780人将近少15%。

1946年铁路公司雇用工人1,359,000人，从1946年到1958年12月的13年中，它們雇用的人数减少了五十余万人。从1954年以来的四年中，有二十余万铁路工人失业。1958年铁路运输量与1954年相同，但是，雇用的工人却减少了22万人，即减了20.8%。这些数字說明79个铁路工人目前正在做1954年100个工人所做的工作。

有許多机械改进是和自动化的发展有关的。这些改进是使“效率”特別提高的主要原因。这种效率提高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目前人們預計，铁路业的劳动生产率将继续提高，每年大約可以提高2.75%，这些改进中包括內燃机車、中央交通控制、道路保养工作机械化、电鈕装置貨場以及类似的設施。(參閱本会《铁路札記》月刊。)

到1958年年中，有将近15万铁路工人(許多人都有二三十年的工齡)領取他們有权領取的失业保險津貼的期限已

滿。虽然有些人可以在别的工业中找到工作，但这种幸运的人比較少，因为在整个美国失业仍然很普遍。

失业津貼不够 1959年1月5日，劳工部长詹姆斯·密契尔报告說，在1958年这一年有800万人領取失业津貼。1958年年底，即在1957年—58年经济衰退开始后一年多，各州的失业津貼制度很少改变。甚至根据联邦紧急救济計划发給的“紧急津貼”，也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領完，不能再領了。

在1958年，只有六个州增加了失业津貼，在这六个州中，只有紐約州是工业州。在1958年10月，每周津貼比1957年同时期平均增加約三美元，但是，这主要不是由于各州的津貼增加。劳工部解释說：津貼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熟练的和高工資的工人失业增加。他們在业时的工資高，因此，他們的失业津貼也高。这是因为在各州失业津貼是按工人的工資的百分比計算的。

1958年全失业者每周所得津貼在全美国平均为30.57美元。但是，各州的平均数(在1958年8月)有很大的不同。南方各州的平均数低，北卡罗来納州为20.9美元，密士失必州为21.5美元。平均数最高的是內华达州的37.14美元(在內华达州，开采冶炼工人工会势力很大)；密执安州为36.65美元(在这个州，汽車工会发动改进立法的运动)；康涅狄格州为34.61美元；紐約州为34.55美元；特拉华州为34.78美元。1958年紐約州提高失业津貼，从36美元提高到45美元。

如果把家属津貼也包括在內，有几个州的最高津貼要高一些，康涅狄格州达60美元，內华达州达57.5美元，密执安州达55美元，怀俄明州达49美元，伊利諾州达45美元。

大多数州发給的失业津貼不到工人从前工資的三分之

一。只有俄亥俄州发給失业工人的津貼为从前工資的一半。还没有一个州发給的失业津貼为平均工資的三分之二——这是失业保險办法最初提出时所主张的标准。

紧急計劃 目前仍有18个州的失业工人甚至不能領到为时26个星期的失业津貼。这些州大部分是南方各农业州。在所有有保險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以上(約22%)住在这18个州。1958年6月中旬，有許多失业工人已经領完了他們依法有权領取的全部失业津貼。因此，国会通过了一项紧急联邦救济法案，根据該法案，美国国庫借款給各州，共数额达66,570万美元。这是为了提供款項来給已经領完通常津貼的工人延长領取失业津貼的期限。通常的失业津貼是用各州向雇主征收的工資稅来支付的。新計劃規定，各州是否接受联邦貸款，由各州自行决定。不过，任何一种联邦貸款都必須在四年之內偿还。共計有17个州接受了貸款，有五个州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发給了临时补充津貼。到1958年年底，大約有150万失业工人根据联邦一州的临时津貼計劃得到了額外津貼。在1958年，共計有260万工人領完了他們根据各州通常計劃有权領取的全部失业津貼。

1959年3月31日，当救济失业工人的联邦紧急計劃期滿时，只是把它延长了三个月。1959年1月，汽車工人要求密执安州把失业津貼延长到整个失业期間。《紐約时报》(1959年1月25日)說，“汽車工业地区工人失业時間非常长，以致目前仅有三分之一的失业工人有資格申請发給失业保險金。”

失业救济計劃适用于武装部队 第八十五届国会对失业保險所作的唯一长期的改进是制定了适用于平时在武装部队服役的退伍軍人的新的津貼計劃。据估計，在美国陆

軍、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備隊中有280萬人受到失業保險的保護。由於包括了280萬軍人，聯邦一州的失業津貼計劃所救濟的總人數增加到4,500萬人以上。

許多人還未包括在內 1958年年中約有200萬失業工人沒有包括在州的基本失業津貼計劃之內，因而就只好依靠公共救濟或依靠某些形式的“施舍”來生活。這200萬人是在不超過四個工人的小企業內工作的人、靠捐款維持的社團的某些雇員、許多移民、農業工人和家庭傭人。

勞工和進步團體長期以來就要求擴大失業保險的範圍，把所有還未包括在內的人都包括進去。聯邦政府建議各州採用的標準仍然只包括在有四個以上受雇人員的社團中工作的人。美國勞工部要求把這個雇用四人以上的規定改為雇用一人以上。大約有一半以上的州的計劃已經把雇用不到四個工人的小企業包括進去。在17個州中雇用一個以上工人的企業目前已包括在失業保險法之內。紐約州把在任何時候都雇用兩個人以上的任何企業包括在內。不過，紐約州及其他30個州仍然沒有把在只雇用一個工人的小企業中工作的人包括在內。

各州法律的其他限制，實際上把許多工人排除在外。以紐約州為例，一個申請失業保險金的工人必須在最近52個星期中至少工作20個星期，或者在最近52個星期中工作15個星期並在最近104個星期中工作40個星期。這種限制使許多季節性工業的工人不能領取失業保險金。

參議員約翰·肯尼迪（馬薩諸塞州民主黨人）和眾議員尤金·麥卡錫（明尼蘇達州民主黨人）在第八十五屆國會中提出一個提高失業津貼標準的法案，但國會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就休會了。這個法案規定，各州發給的最高津貼應相

当于工人从前工资的50%，至多为該州每周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津貼期限一律为39个星期。在第八十六届国会中也有人提出了規定这些联邦最低标准的方案。

劳联—产联建議全面检查和修改現有的不充分的各州失业津貼制度，使它适合目前情况。它宣称，如果失业津貼制度要能应付像1957—58年那种衰退的挑战的話，必須进行更彻底的改革。

经济衰退的若干影响

到了1958年年中，长达一年之久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已经很普遍了。密执安大学三位教授对1957年10月至1958年10月期間失业現象所作的調查报告表明，美国大約有38%的家庭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把失业、工作時間不足或遭到其他经济上的挫折的人計算在內，每十个家庭中有四个家庭在某些方面受到衰退的影响，在領取失业津貼的人中，津貼平均仅为每周工资的37%。

政府关于全失业人数的报告沒有包括那些未被解雇，但是工资或加班費减少的几百万工人。許多原来每周工作五天而且还有加班工作的工人，現在每周只工作三天或四天。这些部分時間工作的工人比实际失业工人多一倍以上。

关于劳动力的官方普查数字表明，在1957年7月，有一千一百多万工人即全部从事工作的工人的19.2%，只作部分時間的工作，每周工作時間不到34小时。在这些工作部分時間的工人中，有300万人每周工作時間不到14小时。

特別蕭条的地区和特別蕭条的工业 1959年1月11日

《紐約時報》記者霍默·比加特报道說，肯塔基州东南部和弗吉尼亚州西南端的煤矿区处于“大恐慌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肯塔基州哈兰县的官員說，有13,056人“无衣无食”。在1948年，哈兰县的煤矿雇用12,500人。但是，由于实行机械化和市場縮小，雇用的劳动力减少到只有5,087人。在有些煤矿中，100个矿工用机器采掘的煤比500个矿工用鑿子和鎬头采掘的煤还要多。

弗吉尼亚州福利委员会已经宣布有几个县是“紧急地区”。将近9,000个家庭，共有38,000人依靠救济生活。“許多家庭仍然挨餓，穿得破破烂烂。儿童由于沒有鞋子而不能上学。在天气还没有变得特別寒冷的时候，許多儿童赤足上学”。在俄亥俄州东部煤矿区，在5,000矿工中，有50%失业达一年以上。

密执安州的汽車工业在1958年显著下降。1958年年底，大約仍有332,000失业工人，占劳动人口的11.4%。1958年年底在底特律約有197,000工人仍然失业，占民用劳动力的12.8%，超过全国所报道的失业人数百分比的一倍以上。人們并不认为这个工业的情况同紡织业和煤炭业一样是长期性的。但是，当汽車工业恢复“正常”状态的时候，人們預計成万的高度熟练的汽車工人难望会被重新雇用。《华尔街日报》1959年2月2日报道說，一些有16年工龄的工人，当时已領完了他們的失业津貼，而且“沒有找到工作的机会”。

1958年11月美国劳工部在它有关“劳动力过剩”的149个主要地区的每月調查报告中說，有83个地区仍有“比較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在这些地区中，有11个地区（包括底特律）失业人数超过劳动力的12%，有17个地区失业人数在9%到12%之間。在紡织工业方面，馬薩諸塞州有四个

地区(福尔河、劳伦斯、洛維耳和新貝德弗德)和緬因州有一个地区(比德福德—圣福德)被认为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地区。

1958年7月，在参議院紡織工业研究小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紡織工人工会主席威廉·波洛克說，紡織工人真正是50年代被遺忘的男女。1947年有1,146,000美国人被雇从事紡織品的生产。在1958年3月总数减少到82万人——工作机会减少将近35万个。工作机会还在继续减少……。因为紡織工厂经常是設在只有一种工业的城鎮，当紡織工厂倒閉的时候，工人就无法寻找其他工作。当紡織工厂倒閉的时候，这些地方就往往变成了幽灵城鎮。

居住情况

最近两年来，一般住宅情况的特点是有两种有連帶关系的趋势，“开工兴建”的住宅数目减少和貧民窟增加。1957年私人出資“开工兴建”的住宅减少到992,800个单位，这是自1949年以来最低的数目。1958年开工兴建的住宅的数目增加到113万个单位，但仍然比1950年到1956年平均数1,198,000个单位低6%，而且大大低于200万到250万个单位，而这个数目是住宅专家认为用来代替不合格的住宅和容納不断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最低的数字。

造成住宅建造减少的原因之一，是住宅的价格一直在上涨。編制建筑业統計数字的道奇公司估計，1958年建筑費用又上涨了2%。联邦儲备局的“銀根紧縮”政策助长了建筑費用的上涨，因为这个政策提高了利率。此外，在1958年，国会又提高了联邦住宅事务局和退伍軍人管理局的抵

押貸款的利率。結果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實際上就沒有購買住宅的可能。全國住宅會議在1958年《房屋年鑑》中估計，美國家庭有按照目前價格購買和維持新住宅的能力的不到30%。美國一所最便宜的有三間臥房的住宅的中等價格在當時將近11,000美元。

由於沒有建築充分數量的住宅，貧民窟的數目迅速增加了。《幸福》雜誌(1957年4月號)有一篇文章說，由於舊房屋的破壞速度比新房屋的建築更快，美國住宅標準同美國人的收入比起來大大低於1929年的水平。住宅和家庭金融署前任署長艾伯特·柯爾在一次演講中透露貧民窟問題嚴重的程度。他對房地產委員會全國協會的會員說：“聯邦國庫不會而且也決不可能有足夠的錢來消滅美國的貧民窟。”(《紐約時報》，1958年11月16日。)

在許多城市中，不動產集團曾經提出“清除貧民窟”的計劃。這些計劃表面上是要阻止貧民窟擴大，實際上是被用來把工人階級的家庭，主要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驅逐出城市的中心地區。這一政策在紐約市進行得最為成功，紐約清除貧民窟委員會自1954年以來，已迫使兩萬多個家庭離開了他們的住宅，以便修建豪華的公寓，這種公寓每間每月房租平均為60美元。

清除貧民窟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摩西在康奈爾大學的演說，表明了這個政策肯定含有種族歧視的意圖。他說，“這項計劃需要用75,000萬美元左右，需要為約25萬人搬家，並且最少需要25年才能把紐約市現有的糟糕的貧民窟全部清除完畢，而且，如果不大量減少來自波多黎各和南方的移民，即使這樣也沒有用。……”(《紐約時報雜誌》，1959年1月18日。)

这种强迫城市居民迁移的结果是把贫民窟从中心地区推广到城市的边缘地区。这种办法引誘投机者购买房屋，以高价租給因“清除贫民窟”计划而被赶走的家庭。

虽然对于費用低廉的住宅的需求有了增加，在过去两年中政府的公建住宅计划实际上陷于停顿。已经建筑的公建住宅大部分是供軍人用的。国会在1958年根本没有为建筑公建住宅拨款。1959年初国会正在审議規定在今后几年中每年建筑35,000个单位的公建住宅的法案。

卫生需要和医疗照顾

美国卫生、教育及福利部报告，1957年美国人民用于医药和口腔治疗的費用估計为151亿美元。这个数字包括付給医生、牙医、私立医院的費用以及医疗保险費和住院保險費。这个数字不包括地方机构、州一級的机构以及联邦机构所支出的費用，也不包括私人慈善事业用于医药方面的开支。上述151亿美元中，只有23.1%是由健康保險支付的。

劳联—产联有一篇特別研究报告，題目是《医疗費用昂貴》。这篇报告引证了一个私人的調查报告說，在美国所有家庭中，有11%每年各支出的医疗費为500美元以上，占美国所有家庭医药費支出的43%。約有100万个家庭每年各支出1,000美元以上的家庭医疗費，而有8%的家庭沒有任何医疗費的开支。（《产业工会部文摘》，1957年秋季号。）

近年来医疗费用不断上升。从1946年到1956年，全部住院費用增加了132%。态度保守的《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周刊（1958年1月31日）透露，在过去八年中付給医院、医生

的費用和藥費几乎提高了三分之一。在1957年一年，有代表性的藍十字會家庭住院保險費在密執安州底特律提高了12%；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提高了26%；在紐約州阿爾巴尼提高了34%。

私營健康保險 美國目前總共約有12,100萬人至少有某種形式的健康保險，或者是藍十字計劃所保的，或者是其他機構——包括保險公司、醫藥社團、團體診療所和工業聯合會——所保的。但有7,000萬左右的人沒有外科保險，有5,000萬人以上即美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沒有住院保險。

就大多數有保險的人來說，保險的範圍是遠遠不夠的。藍十字的住院保險、外科和醫療計劃最多也不過是提供一些有限的津貼，根本無法包括大多數病人的全部費用。在美國17,500萬人中，有力量參加重要的醫療保護保險的——這種保險是為了應付特別沉重的醫療費用——還不到5%。健康保險委員會估計，已付出的靠捐款維持的健康保險津貼，可以解決五分之一的醫藥費用。

許多健康保險計劃在危險最大和人生最不幸的階段——老年時期——不能滿足需要。需要續保的終身保險費用太昂貴，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負擔不起的。在美國，65歲以上的老人約有半數根本沒有任何健康保險。健康保險研究所在1958年9月報告稱，紐約州65歲以上的老人，有65%沒有健康保險——一部分是由于保險期滿或保險失效。紐約州團體健康保險單所包括的雇員中，有55%在雇用終止後其保險單即失效。只有23%的保險能夠改為個人保險。

為了幫助退休工人，工會曾試圖為退休工人爭取繼續享受津貼計劃所規定的保障。1958年有人在紐約州議會提

出法案，要求規定在每一团体保險单中須有關於改為个人保險的條款，并且規定終身保險的辦法。但是這些法案未獲通過。

眾議員埃姆·福蘭德(羅得島州民主黨人)曾提出一個法案，要求規定65歲以上的社會保障受益人可以享受住院和醫療津貼。但是國會沒有通過這個法案。美國醫師協會指責這個法案是企圖為老年人提供“社會化的醫療”。福蘭德法案在第八十六屆國會中再次提出。勞聯—產聯在它的國會立法綱領中支持這個法案，并要求規定為接受社會保障津貼的人提供住院、療養和外科醫療的照顧。

對醫生和醫學研究的需要 美國人口的增殖率為每年300萬人左右，而最近調查表明，醫生人數落后於不斷增長的人口。醫生和人口之間的比例目前是不恰當的，這個比例是每1,100人有一個醫生，而且醫生在城市和農村間的分布也很不平均。以各州而論，紐約州的比例最大——每485個居民有醫生一人；密士失必州的比例最小，每1,305個居民有醫生一人。

據報道，精神病方面的醫生尤其缺乏。各州的精神病院醫務人員的不足是眾所周知的，這些精神病院目前需要補充醫生3,700人以上。公共衛生事業方面醫生缺乏的情況據報道也差不多。

對於醫學院和醫藥實驗室迫切需要補充大量設備的問題，聯邦政府所提供的經費和它的軍備開支比起來是很少的。根據衛生研究設備法制訂的關於擴大和改進公立和私立醫藥實驗室的三年計劃(截至1961年)，美國政府每年撥出3,000萬美元，恰好為美國空軍在1954—56年為購買佩刀式噴氣戰鬥機所不需要的部件而支出的6,000萬美元的一

半，这些部件一直閑置，从来没有使用。还可以指出，美国公私机构用于癌病研究的经费，只等于美国政府军备开支的1%强。

在1959财政年度，国会总共通过拨款21,100万美元以供美国公共卫生处所属各国立卫生研究所及其他医药研究工作之用。这是医药研究拨款的最高纪录，但是同该年数达458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开支比起来，则成为鲜明的对照。主要的军事开支比医药研究开支约大217倍。目前所有各种医药研究的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4,460亿美元的千分之一。

医院建设 根据保守的估计，美国全国缺少医院床位20万个，但实际上可能接近缺少80万个。医院建设及调查法(希尔—伯顿法)应于1958年期满，但国会又把这个法律延长了五年。在1959财政年度，国会总共拨出了医院建设费用18,620万美元，比1958财政年度的拨款增加了约6,500万美元。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9财政年度预算咨文中曾建议削减用于医院建设的联邦开支——“只满足迫切的和特殊的需要”。

全国健康保险 参议员詹姆斯·墨莱(蒙大拿州民主党人)和众议员约翰·丁格尔(密执安州民主党人)曾向第八十五届国会提出一项新法案，主张制订全国健康保险计划，但这项法案未能通过。第一个这种全国健康保险法案系于1943年由已故参议员华格纳、参议员墨莱和众议员丁格尔的父亲提出的。

新的墨莱—丁格尔法案规定建立一个分担费用的保险制度来支付各种主要医疗费用。个人有选择和改换医生或牙医的自由，而医生或牙医也有接受或拒绝接受病人的自

由。筹款的办法同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类似。被雇用的人员将付出收入的1.5%，但全年不超过90美元。雇主付出与此相等的数目。不受雇用的独立工作者，领取养老金、遗族津贴、残废津贴及公务人员退休津贴的人都将包括在内。它所提供的住院费每人每年最多为60天。

因工伤亡

据报告，在1957年美国工人因工作事故死亡的有14,200人，受伤的有1,875,000人次。因此，美国工人1957年发生工伤事故的总数将近189万人次，而1956年修订后的工伤事故估计数字则为195万人次。

劳工统计局报告称，在这一总数中，“有83,800人成为某种终身残废，从丧失或部分丧失一个手指或一个脚趾，一直到在今后完全不能从事任何有报酬的劳动”。

这些工伤事故使1957年损失了4,000万个工作日。但是“如果把死亡和终身残废对今后的影响估计在内，并且和目前的损失加在一起的话，那末1957年工伤事故造成的损失约相当于17,400万个工作日——约等于56万个工人全年完全就业的工作量”。（美国劳工统计局，《1957年工伤事故估计》。）

1958年工伤事故数字降低 在1958年因工死亡的工人 为13,300人——比1957年约少900人。工伤事故的百分比也从1957年的每1,000工人有31人降低到1958年的29.4人。

除死亡者外，在工业事故中受伤的工人约为1,796,000人次，所以工伤事故总数下降到181万人次，即比前一年低4%左右。同前几年比较，1958年工伤事故显著降低，一部分

是由于就业人数减少和工作周缩短；一部分也是由于如上所述事故的发生率降低。

在受伤的工人中约有75,700个工人成为终身残废，其中有些人完全残废，今后已不能从事任何有报酬的劳动。全部工伤事故造成3,800万工作日的损失。但是劳工统计局估计，如果把死亡和终身残废对今后的影响也包括在内的话，“1958年的工伤事故总共造成约16,000万个工作日的损失，等于515,000个工人全年完全就业的工作量”。

初步报告指出，在整个制造业中，工伤事故的发生率从1957年的每100万工作小时发生11.4次（全年平均数），降低到1958年头九个月的10.7次，当时经济衰退曾迫使许多工业削减生产。

煤矿中的工伤事故 美国矿务局报告，1958年美国煤矿中的事故造成356个工人的死亡。这个数字比1957年减少了121人，1957年的死亡人数为477人。1958年的死亡率为每生产100万吨煤死亡0.84人，1957年为0.92人。按工作小时计算的死亡率，1958年为每100万工作小时死亡1.12人，1957年为1.18人。

因此，同1958年^①相比，每生产100万吨煤的死亡率只降低了9%，每100万工作小时的死亡率只降低了5%。但1958年煤的产量比1957年降低了19%，可以发生事故的时间减少了22%。因此，虽然生产量和劳动时间降低了这么多，工伤事故的死亡率仍然很高。

1958年因煤气或煤灰引起的重大爆炸事件而死亡的工人为36人；1957年为59人。1958年仅在西弗吉尼亚一州的

① 原文如此，疑系1957年之误。——译者

煤矿就有149人死亡,受伤者4,000人以上。

黑 人 工 人

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统计,1958年7月在美国17,400万非军人人口中,有1,930万人即11%左右是“非白人”。由于这些“非白人”中绝大多数是黑人,所以在实际上可以把这个数字当作黑人的入数。1958年12月在总数为6,810万人的全部民用劳动力中,黑人约为720万人,约占10.5%。

在工业中,黑人工人仍然受到只能从事非技术性或非技术性工作的歧视。他们很少有受到可以使他们提升担任较好的工作的训练机会。《劳动力》(1958年11月号)所刊载的普查资料中清楚地说明了黑人职业和白人职业之间的差别。

在1958年10月,仅有4.7%的白人工人列为杂工(农场和矿山除外),但有15%的黑人工人列为杂工;白人工人中只有7.6%是服务工人,而黑人工人中有16.2%是服务工人(私人家庭中的佣人除外);只有约4%的白人工人是农场工人和工头,但有13%的黑人工人是农场工人和工头。最显著的不同是在从事家庭劳务的妇女方面,白人女工中只有6%从事这种劳动,而黑人女工中有33.5%,即三分之一以上是私人家庭的佣人。

在技术性比较高的职业中,11.9%的白人工人列为专业工人、技术工人及类似的工人,而黑人工人中只有3.8%列为此种工人;列为经理、高级职员和店主(农场除外)的白人工人为11.6%,但黑人工人则只有2.4%;白人工人从事职员之类工作的有15%,从事这类工作的黑人工人不到

6%；白人工人約有14%是手工艺工人、监工等等，黑人工人只有6%列为这种工人。

黑人工人的平均工資比較低 由于他們因职业而处的经济地位，黑人工人全年得到的工資或薪金比白人工人低得多。1957年全年完全就业的黑人男工平均收入为3,137美元，比白人男工低36.6%，白人男工平均收入为4,950美元。1957年全年完全就业的黑人女工平均收入为1,866美元，比白人女工低40%，白人女工平均收入为3,107美元。（关于黑人家庭收入和白人家庭收入之間的差別，見前面关于收入的分配一节。）

黑人的失业情况 根据国情普查局的估計，虽然1958年4月間在经济衰退最严重时，黑人占民用劳动力的11%，但是当时失业的黑人工人数目达1,024,000人，占美国全失业的工人的五分之一（20%）。

当时黑人工人失业的百分数为民用劳动力的13.9%——比白人工人失业的百分数6.8%高一倍多一点。从1958年2月到4月的三个月間，黑人工人失业的平均比率为14.5%，白人工人則为6.8%。

国情普查报告（《劳动力》，1958年11月号）表明，到1958年10月当政府关于失业工人总数的官方数字降低到3,805,000人时，黑人工人失业的仍有758,000人，即仍占总失业人数的20%。当时黑人工人失业的比率占民用劳动力的9.8%，比白人工人失业比率5%仍将近高一倍。即使在相对繁荣的1957年，黑人工人失业的平均比率也占民用劳动力的9.6%，比白人工人失业平均比率3.8%高一倍以上。

部分失业的現象在黑人工人中比白人工人中普遍得多。在1958年4月約有30%的黑人工人每周工作不滿35小

时，而白人工人每周工作不满35小时的只有19%。国情普查局把在它所报告的一周中做过任何一点工作的人都列为“在业”工人，所以这些官方估计毫无疑问低估了失业和就业时间不足对黑人工人的真正影响。

到1958年10月，从经济衰退低落时期部分恢复过来以后，将近四分之一(24.7%)的黑人工人仍处于就业时间不足的情况，每周工作不满35小时，而就业时间不足的白人工人只占17.3%。黑人妇女受到就业时间不足的打击特别严重。在1958年10月，三分之一以上(35%)的黑人女工每周工作不满35小时。

由于许多黑人的工作时断时续，在有工作的时候收入也较低，因此黑人所得到的失业津贴比白人工人少，津贴期间也短。许多黑人工人在经济衰退开始前已失业了一个时期，并且把他们所能领到的失业津贴也都领完了。《幸福》杂志(1958年7月号)在对许多城市进行了调查以后，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形的失业者”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几乎在每一个城市，经济衰退的最沉重的负担都落在黑人身上……其原因是在不熟练工人中黑人工人所占比例较大，而且工龄也较短。”在印第安纳州的钢铁城市加里，失业工人的半数为有色工人。

老年工人

老年工人的问题现在比起早几年来已经更为人所注意。甚至强迫在65岁退休的办法也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疑问。老年工人的特殊困难被认为主要是就业机会、收入少、健康和医疗照顾问题。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估计，整个劳动力将从1958年3月的7,020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7,900万人，在增加的工人中有半数将是45岁以上的工人。

劳工部对男用靴鞋工业和家俱工业的在业老年工人和年轻工人进行了研究，发现两类工人的出勤率是相同的。在劳动生产率方面，45岁以上的工人的效率稍有降低，但是“很大部分的年纪比较大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超过年轻工人中的一般工人。甚至在从55岁到64岁的工人中也有三分之一左右超过35岁至44岁的一般工人，而35岁至44岁一般被认为是壮年时代。”

美国就业保障局在1956年对费拉特尔费亚及其他六个主要中心地区的求职工人进行了研究，发现“45岁以上的工人在技术和经验及工作可靠性方面具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一旦失业，“这些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失业的时间要长，寻找工作的困难也更大”。年纪较大的工人占求职工人的40%，但只获得该年就业机会的22%。《华尔街日报》(1958年5月22日)报道说，“对于40岁以上的男女工人，就业的机会一般说来是不大好的。”

由于寻找好职业或者任何职业遭遇到这种困难，年纪较大的工人的一年收入急剧下降。甚至在55岁到64岁这一期间，收入就已大为降低。年纪再大一些的工人，收入下降的情况就更为显著。65岁以上的工人有三分之一依靠社会保障或其他退休津贴维持生活，有五分之一依靠救济。

养老金计划 私人养老金计划目前适用于1,640万人，将近占美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1953年这种私人养老金计划总共包括1,200万人。在目前的总人数中，约有1,000万工人包括在根据集体谈判制订的计划之内。

美国劳工统计局在对1957年后期和1958年初期根据集体谈判而制订的100个养老金计划进行的特别研究中,发现这100个计划总共包括330万工人。其中86个计划——包括将近290万工人——完全是由雇主出钱,其他14个计划是分摊性质的计划,由雇主和受雇者共同出钱。

这些计划提供的养老金的数额有很大的不同,养老金的数额取决于工人工龄的长短和工资的多寡。劳联—产联根据劳工统计局研究报告计算了这些计划所支付的款项的平均数字,并把这些资料摘要载入了它的《集体谈判报告》(1958年8月)。这些计划表明,工龄为25年每年平均工资为3,600美元的退休工人,每月平均养老金为57.5美元;每年平均工资为4,200美元的工人每月平均养老金为65.5美元;有30年工龄而每年平均收入为3,600美元的工人每月平均养老金为69.5美元;平均工资为4,200美元的工人每月平均养老金为75.5美元。

女 工

据国情普查局估计,1958年4月在民用劳动力中,有妇女2,220万人。在这个总数中,约有2,060万人就业,160万人失业。1958年春季女工总数和1957年10月中旬估计的最高数字2,270万人大致相同。

女工目前占美国民用劳动力中全部工人的三分之一(33%)左右。在6,200万达到工作年龄的妇女(14岁以上)中有三分之一以上(36%)是在劳动队伍之中。美国妇女局在1958年《女工手册》中指出,劳工部计划使1965年的女工比1955年多500万以上。

1958年春季,女工的失业人数显著增加。据估计,在

1958年4月有160万人，即全部女工的7.5%失业，而在1957年春季失业的女工只有882,000人。国情普查局并不把那些在调查周恰好处于“淡”季的季节工人以及一周中只工作几小时的工人认为是失业的工人，因此对失业工人的总数显然是低估了。

在1958年4月，在非农业的产业中工作的妇女将近三分之一即29.7%每周工作的时间不到35小时，而部分时间工作的男子是14.9%。国情普查局《劳动力》1958年5月号指出，约有7%的部分时间工作的妇女报告说，她们“目前所做的工作通常都是全部时间的工作”。经济衰退显然是她们的工作时间和每周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

参加工作的妻子和母亲 近年来，夫妇两人都参加工作的比例一直在增加，这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高涨，需要两个人挣工资才能使家庭的“收支相抵”。美国商务部在关于个人收入的研究报告中（《现代商业概况》，1958年4月号）指出，“很大一部分家庭（大大超过五分之二）都有一人以上参加工作。”

参加工作的母亲人数在1957年达到了新的高峰。有700万个家有不满18岁的孩子的母亲参加工作。在这个总数中有2,587,000人是有极年幼的小孩（不满六岁）的母亲。她们约占全部有年幼小孩的母亲人数的六分之一（18%）。

工资仍然很低 美国的妇女一般是不享受同工同酬的。她们所占的工作职位通常比男子所占的工作职位的待遇要低。目前的情况更是：做同样的工作，妇女的工资也往往比男子少。《商业周刊》（1958年5月17日）评论道：“有许多公司付给妇女的工资仍然比付给男子的少。”这种差别的结果是女工的每年收入比较少。

据国情普查局报道，1957年美国妇女有一半的收入不到1,199美元(女工工资的中位数)。同年，男子的工资为3,684美元(中位数)，比女工工资多两倍以上。国情普查局关于消费者收入的数字表明，在近几年中，男工的工资有了显著的增加，而女工工资的变动则较小。1957年三分之二的妇女(65.6%)的收入不到2,000美元。只有约3%的妇女的收入在5,000美元以上，而有这种收入的男子则占30%。

纽约州是分别提出男女工人工资的报告的少数几个州中的一个。《劳动市场评论》月刊在它表明男工和女工每周平均工资的资料中清楚地指出了这种差别。1958年6月纽约州生产耐用品工厂的男工平均每周工资是95.08美元，而在同类工业的女工的工资平均只有56.58美元。在非耐用品工业中，男工的收入平均每周为93.01美元；女工为53.76美元。非耐用品工业雇用的妇女比重工业多，但是在每一种工业中都存在着差别。

最低工资法 各州关于最低工资的法律主要适用于地方性工业和服务业工人。近两年来，在若干行政区域中，这种法律有了一些改进。1957年，佛蒙特州第一次制订了这种法律，使实行这种法律的行政区域的总数增加到30个州和四个其他地区，即哥伦比亚特区、阿拉斯加、夏威夷^①和波多黎各。在这些行政区域中有12个区域的法律现在也适用于男工。(1958年《女工手册》)

但是，正如《劳联—产联新闻》(1958年3月9日)所说的，各州的最低工资法是“非常不够的”。这个刊物要求把约950万个工人(其中有数以千计的妇女)置于“联邦法律保

^① 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已先后于1958年和1959年改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和第五十州(参阅本书第六章“政治事务”)。——译者

护之下”。在近400万个零售业工人总数中，州法律只适用于约150万个工人，而且他們的最低工資低到每小时只有0.16美元。

1957年劳联—产联的一个調查小組揭露了北卡罗来納州阿希維爾城付給許多妇女的工資很少。一个連鎖药房的女店員每小时工資为0.39美元，每周工作58小时。洗衣店的工人每月工資为98美元，每周工作48小时，每小时工資为0.45美元。旅館的电梯司机每两周的工資为36美元，每周工作48小时，每小时的工資不到0.38美元。

要求同工同酬 各州在制訂同工同酬法律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国会还没有制訂期待已久的联邦同工同酬的立法。艾森豪威尔总統在1957年重申他支持制訂这项法律，其理由是“应用不因性别而有所歧視的同工同酬原則来制定法律，純然是一种合乎公道的行为”。

現在一共有17个行政区域，包括16个州(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諾州、緬因州、馬薩諸塞州、密执安州、蒙大拿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澤西州、紐約州、俄勒岡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得島州、华盛頓州)和阿拉斯加的法典上都有了同工同酬的法律。

在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法律規定男女教师應該得到同样的报酬。在許多其他的学校体系中，由于教育局的規定而实行了同等报酬的办法。在联邦政府中，公务人員分級法为每一等每一級都規定了划一的薪金标准。

青年工人

1958年12月(学校开課的月份),在民用劳动力中,有250

万个从14岁到17岁的青年工人。国情普查局在《劳动力》(1959年1月号)中报告说，在这个总数中，约有150万人是男童。男童中约有441,000人和女童中约有305,000人，即总共746,000人只有14岁和15岁。美国劳动标准局在它关于《18岁以下青年工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我国14岁到17岁的中学年龄的人中，将近一半在一年的一段时间内参加工作，通常是部分时间的工作。”

在过去两年中，许多州曾经考虑改进或修改童工法的办法。在康涅狄格州、衣阿华州、密执安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可能降低现行就业标准的法案都被否决。新罕布什尔州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14岁以上的儿童当球童^①和报童。新泽西州改进了它的法律，禁止雇用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充当有工资的信差。

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一项法案，把任何时候就业年龄从10岁提高到12岁，把学校开课期间就业的年龄从14岁提高到16岁。犹他州否决了一项关于降低就业最低年龄限制的法案。内华达州通过了一项法案，把离校年龄从18岁降低到16岁。新墨西哥州否决了一项把离校年龄从16岁提高到19岁的法案。

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18岁是从事危险工作的最低年龄，16岁是从事一般工作的最低年龄，14岁是从事某些课余工作的最低年龄。美国劳工部在一篇关于1957财政年度违反童工法事件的调查报告中，发现14岁以下的儿童从事滑运木材、砍伐、装载和拖运纸浆木材，驾驶拖拉机把木材运到锯木厂，开运货升降机，开废纸吸除机和充当送货卡车的

^① 球童(Caddies)，一般指背高尔夫球棒和拾高尔夫球的孩子。

——译者

助手等危險工作。

其他从事危險工作的包括：十四五岁的人开采煤矿和錳矿，开电动压榨机和切紙机，在屠宰厂的屠宰車間从事去骨和宰杀工作。对于某些这种少年說来，从事这些工作的結果往往是受到致命的或造成終身殘废的伤害。許多非法雇用的儿童都是工資很低的，他們沒有得到法定的最低工資。

在美国至少有900万个儿童生活在每周貨幣总收入不到40美元的家庭中，也就是說每年的收入不到2,000美元。1958年1月《双亲杂志》評論道：“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許多儿童离开学校去参加工作，以便帮助家庭买到一些食品雜貨。”

1958年4月，美国劳工部引用全国停学儿童調查报告中的話說：“全国青年有一半缺乏几乎一切技术性行业所需要的中学教育，六分之五的青年缺乏大多数專門职业訓練所需要的大学教育。”

青年的失业情况 由于青年工人通常是最后被雇用的，在经济衰退和失业时期（如1958年的情况），他們也往往是最先被解雇的。較年轻的工人通常沒有資格从事技术性比較高的工作，他們也不能取得健全的工会所保护的工齡权利。据国情普查局报告，年齡在14岁到24岁之間計算在劳动力之內的青年工人，在1958年7月中旬約有200万人失业，将近占当时全部失业者的40%，而1957年7月中旬失业的青年工人只有120万人左右。

关于十几岁的少年，全国童工委員会指出：“他們的失业率是所有各种年齡的人中最高的——比全国平均数高一倍。”（參閱1958年11月《美国儿童》杂志所載《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和劳动世界》一文。）《紐約时报》（1958年4月5日）对

紐約州失業保險記錄的調查報告指出：“在目前的經濟衰退期間，年輕人比年長者更容易失業。”不滿20歲的男童在1958年1月占全部申請失業保險津貼的男工的4%左右，而一年以前只占2.4%。不滿20歲的女童在1958年占申請失業保險津貼的婦女的3%左右，而1957年只占2.5%。25歲以下申請津貼的人增加情況也大致相同。

學校和教師不足

在1958—59學年度中，美國公立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加到3,390萬人，比前一學年度增加3.5%。現在估計，中小學學生人數在1965年可達到1,000萬人。

但是容納學生的校舍的建築趕不上學齡男女兒童數目的增加。在1958年，公立學校就已經有230萬個兒童沒有足夠的校舍。據美國教育局的保守的估計指出，在1958—59學年度之初，美國中小學需要增加14萬間教室。

在1957—58學年度中，全國教室總數增加了約71,000間，但是增加的教室在很大程度上被學生數目的增加所抵銷了。興建的教室總數只使教室缺少的數目減少了1,800間。據估計，大約有68,400間新教室將在1959年完成，但是那時至少還要缺少72,000間急需的教室。

1958年8月12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勉強地”簽署了一項繼續執行建築校舍計劃的法案，根據這個計劃，聯邦對於有重要聯邦政府設施的地區（即駐有軍事人員和其他聯邦政府職員的地方），每年給予約二億美元的援助，以供建築校舍和辦學校之用。這是聯邦政府三項不充分的援助教育的計劃之一。其他兩項是規定退伍軍人教育和貸款給高等學校

建筑宿舍的计划。

在第八十六届国会中，政府提出了一项联邦政府援助建筑校舍的计划，这项计划规定在25年中的任何一年可以提供至多8,500万美元的援助。但是款项将在地方上筹集，联邦政府只帮助付给利息，在必要时负担一部分本金。参议员詹姆斯·墨莱(蒙大拿州民主党人)和众议员李·梅特卡夫(蒙大拿州民主党人)提出了一项比较适当的法案，该法案规定了一个为期四年的计划，在第一年拨款11亿美元供教师薪金或校舍建筑之用。在第四年，费用将达44亿美元。

建筑教室的费用视各地情况而定。教育局说，在1957—58学年度，建筑一间教室的平均费用略微超过4万美元。因此，墨莱—梅特卡夫法案所要求的款项，根据这种数目计算，每年约可建造27,500间教室，而从全国教室的缺乏情况看来，这个数目的确是很少的。

需要增加教师 据报告，美国各地教师缺乏情形很严重。全国教育协会估计，1958年秋季至少需要22万名新教师，但是只能得到约85,000名新教师。就是在情况比其他地方较好的纽约州，教育厅长詹姆斯·艾伦在1958年年中报告说，公立学校需要13,300名新教师。当时只可以得到7,800名左右的教师填补空额。小学的情况最严重。

教师缺乏的一个原因是教师的薪金不足以应付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的需要。劳联—产联曾经建议，对所有教师适用的工资表应该从5,000美元起，可以增加至1万美元，级数不超过八级。它还指出，教师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非教学任务负担沉重，他们必然不是忽视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做长时间的加班工作而无报酬。这种办法“应该迅速制止”。

工会方面关于教育的计划，包括了联邦政府对公立学

校校舍建筑、公立学校教师的薪金、奖学金、各级扫除文盲工作和所有儿童的保健和福利事业予以援助。

解决少年犯罪问题 劳联—产联在1957年的年会上也通过决议规定它的会员应当“主动地采取行动，说服各地市政机关充分负责制止少年犯罪行为，方法是使用政府款项清除贫民窟，为青年人提供合适的和足够的学校，保证享受文化生活、适当的健康标准、娱乐设施和就业机会”。

它还要求会员促使各地市政机关，“负责协调所有公私机构”，使它们互相合作地而不是互相竞争地“执行一项健全而互相配合的消灭少年犯罪的计划”。

纽约州少年犯罪问题会议在1958年6月提出了一项解决少年犯罪问题的建设性的教育计划。它建议帮助青年人获得较好的职业训练和职业，较好的娱乐活动，给予在学校中精神不安定的学生以更多的精神帮助，并且同可能犯罪的家庭(约占全部家庭的5—10%)进行联系，这些措施可以由各地代表教育、宗教、社会等团体的地方委员会执行。

1958年6月24日《纽约时报》报道，大纽约居民委员会主席卡尔·洛勃要求制定一个计划来消灭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和“消灭家庭关系破裂、贫民窟生活、文化方面的矛盾和经济不稳定等因素”。

第三章 农业和农民

自从1947年以来，由于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而农业总收入却一直落后，因而美国的农业一直不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1年中，农业的净收入(所谓“净收入”就是从农业总收入中减去生产成本后的余额)不断降低。在这11年中，只有三年，农业净收入高于前一年，而且每一次高峰都比前一次高峰低。

最近一次的增长使农业净收入在1958年达到131亿美元，比1957年多23亿美元，但是仍然比前一次(1951年)的高峰低20亿美元，比1947年的空前纪录低42亿美元。1958年的高涨是暂时的，该年下半年农业收入下降情况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农业部预计，1959年农业收入将比1958年低5%到10%。

通货膨胀也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按1947年的购买力计算，1958年每1美元的农业收入只值0.8美元，因而1958年农民得到的131亿美元的净收入，按1947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仅等于103亿美元。同样，1957年的108亿美元的总收入，也只等于87亿美元。以不变美元价值计算，1947年农业收入达到战后时期的高峰173亿美元(实际数额)，1957年减少了50%，1958年减少了39%。

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額

在战后时期，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額急剧下降。下降的原因，一部分是工业产量的增加更多，但是主要的因素却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不同趋势。1947年美国个人总收入为1,916亿美元，其中农业收入占155亿美元，即8.1%，但是在1958年3,544亿美元的总收入中，农业所占份額仅为131亿美元，即3.7%。

以农业为生的人平均收入现在只有非农业人口的收入的一半多一点。1958年，以农业为生的人每人平均收入为1,068美元（包括非农业收入在内），但美国其他的人每人平均收入却为2,034美元。就黑人和被国情普查局称为“非白人”的其他人而言，差别甚至更大。我们所得到的最近数字表明，1957年从事农业的非白人男人的收入的中位数为508美元，非白人妇女的收入的中位数为308美元。

农产品价格和平价

农民卖出农产品所获得的价格，一般而言在1957年和1958年较高，但是价格增加的大部分被成本提高所抵销了。农民所获得的全部农产品价格的指数从近几年来最低点，即1956年的235（1910—1914年为100）上升到1957年的242和1958年的250。即使如此，这个指数仍然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峰，即1951年的302要低得多。（在1958年年底，美国农业部修正了农民获得和付出的价格的指数。此项修正影响1952年后各年的指数，使1958年农民所获得的价

格,表现为比以前的指数提高了3%。除另有说明外,本书所用数字都是修正后的指数。)

在战后整个时期,农民的各种开支价格的指数,包括利息、赋税和工资(以1910—1914年为100),差不多无间断地一直上升。它从1947年的240上升到1956年的278,1957年的286和1958年的293。到1959年3月中旬,上升到298,这是最高纪录。因此,农民所受到的成本和价格两面夹攻越来越严重。

自从“新政”的初期以来,平价比率就一直是农业政策中热烈争辩的问题。农业集团支持各种目的在于置农产品价格和非农产品价格于平等基础上的立法草案。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计算,平价(100)就是在1910—14年期间从事农业的人获得的平均价格和他們必须付出的平均价格之间的比率。因此,像最近几年的情形,当平价比率降到100以下而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价格的趋向是不利于农民的。

1946年10月平价比率达到123的高峰,以后就开始了长期下降,一直下降到1949年的100。虽然平价比率在1951年恢复到107,但是后来再没有超过100。1956年下降到83;1957年下降到82;1958年为85(未修正的指数为83)。甚至最近的指数修正也没有能够阻止下降。1959年3月中旬指数又下降到82。

农产品零售价格上涨

由于垄断组织的发展和农民所受到的价格与成本两面夹攻更加剧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农产品零售价格显著上涨。付给农民的价格降低,并没有为消费者降低价格,

相反地却使原价与銷售之間的差价扩大,使中間人、加工商人、分配商人和食品連鎖公司的利潤增加。

美国农业部估計(初步),在1958年,一个城市工資劳动者或職員的家庭每年平均购买农产食品所付零售价格为1,065美元,其中只有427美元为农民所得,而638美元則是銷售和加工費用。因此,消費者用于购买食品的每1美元中,农民得到的份額在1958年减少到0.4美元,比战后1945年的高峰0.54美元少0.14美元。1958年12月,农民所得的份額降至0.38美元。

产量增加,耕地面积减少

尽管政府公开宣布要用减少耕地面积的办法来减少农产品的产量,但是农产品产量却不断增加,1958年达到空前高峰,比前一年增加8.8%。自从1950年以来,农产品产量(农作物和牲畜)增加約23%,而美国的人口只增加16%。

美国农业部的农产品产量指数(1947—49年为100)在1956年和1957年都是113,但1958年却上升到123。1958年的急剧上升主要是因为谷类增加48%和油类作物增加22%,虽然飼料也增加10%,棉花增加5%和肉用牲畜增加5%。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前的1952年,有收获的耕地总面积为34,900万英亩。1957年,有收获的耕地总面积只有32,600万英亩,减少了2,300万英亩,达到多年来总面积的最低数字。这种减少大部分是由于联邦政府管制耕地面积和在1956年实行“土地銀行”計劃的結果。根据这个計劃,如果从事农业的人增加不耕种的土地或停止整个农場生产,政府将給他錢。

但是，耕地总面积的减少使收入較少的农民所受影响最严重，而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銷了减少耕地面积的作用而有余。产量和生产率的提高最有利于大农場。在1952—1958年期间，所有农作物每英亩产量增加22%，每个工时的生产量增加37%。机械化的大农場的增长率更大得多，可以抵銷縮小耕地面积的作用而有余。

过剩的农产品存貨 在1958年12月31日，政府的商品信贷公司所握有的剩余农产品总計为87亿美元。这比1957年年底多15亿美元，比1952年年底多52亿美元。1959年总统经济报告指出，商品信贷公司的存貨“到1959年年中将达到空前的纪录”。1958年年底，政府所有的存貨中最多的几种是：小麦13亿蒲式耳；玉米14亿蒲式耳；棉花660万包；烟草10亿磅；奶粉15,600万磅；黄油5,600万磅。

农民的債務增加

自1945年以来，农民負債总额（抵押債務和非不动产債務），每年都在增加，只是在1954年有一个很短时期沒有增加。1945年农民負債总额为76亿美元，1959年1月增加到203亿美元。尽管在1945—1954年期间非不动产債務增加更快，不动产抵押債務的增加仍将近占1954年以来农民債務增加总额的三分之二。1959年，农民所欠抵押債務为112亿美元，非不动产債務为91亿美元。

人口的趨勢

农业的长期危机大大地加速了人口脱离农业的运动。

1947年，以农业为生的人数为2,71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8.9%。到1958年，这个数字减少到2,080万，即仅占总人口的12%。由于城市失业人数较多，在1957年下半年脱离农业的动向至少暂时受到遏止。以农业为生的人数从1957年4月的2,040万增加到1958年4月的2,080万。但是，从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来说，在最近这一时期，农业人口的情况保持不变。

美国农业部估计，从1947年以来，有一百多万农场停止生产或被其他农场所吞并。那时的590万个农场，到1958年已减少为480万个。正如1959年1月总统经济报告所指出的，上述减少的数目几乎完全是每年出售产品不到2,500美元的农场。

非农业工作的收入 农民家庭为了补充它们微薄的农业收入而从事非农业工作的越来越多。以1947年为例，每人平均农业净收入为644美元，非农业收入为181美元，而在1958年每人的农业净收入为770美元，非农业补充收入为298美元。

美国农业部报告说，在1958年，将近35%的以农业为生的男人的收入，大部分是来自非农业工作，而全部农业妇女的60%，都从事某些非农业工作。农业部估计，“农民妻子四分之一以上”现在都参加劳动队伍。（《农业展望图表》，1959年，第26页。）

纵的合并

在最近五年中，合同农业或“纵的合并”（vertical integration）的发展特别迅速。虽然在甜菜、甘蔗、烟草、玉米和

制造罐頭或冷藏用的蔬菜方面，根据合同进行种植，早就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把这种制度推广适用于蛋品、牛奶、猪和牛的方面却是比較近的事。正是大的飼料分配商、鸡蛋商和加工商在扩大烧烤用的小鸡的生产方面，以及对这一行业的90%以上的合并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功，鼓励了屠宰公司、食品連鎖公司和其他利益集团試行类似的办法。

虽然合同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所有的合同都要求农民牺牲他們的某些传统独立地位，作为取得貸款或取得他的产品市場的保证的交換条件。有时把农民降低到合同工人的地位，实行計件工資，但是得不到关于工資工时或其他劳动立法的保护。

馬薩諸塞州农村联合会执行秘书卡勒頓·E·皮克特宣称：“‘纵的合并’必然要造成垄断組織，無論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垄断的趋势……对成千上万的飼养家禽的人來說，現在留下来的只是经济上的农奴制……家禽和蛋品的农場正在为合并起来的企业所分割。”得克薩斯州烧烤小鸡生产者协会主席杰·B·麦克米伦告訴国会說：“如果要想讓飼养家禽的家庭小农生存下去的話，必須限制罪恶的纵的合并制。”

剩余食物的分配

当商品信貸公司的食物商品存貨无法銷售的时候，美国农业部有权“把这些食物贈送給学校午殮計划、貧困的印第安人和供应慈善机关所收容的貧民以及美国的貧困家庭”。超过国内需要的各种食物可以在国外分配。

根据各种在美国国内直接分配的計划（包括学校午殮

在內), 农业部在1957財政年度贈送了106,100万磅的食品, 价值23,600万美元。在1958財政年度, 这种贈送减少为87,200万磅, 价值18,500万美元, 但在1959財政年度的上半年增加到55,800万磅, 价值11,400万美元。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分类統計, 这些国内分配計劃的受益人, 在学校午餐方面有1,410万儿童, 在慈善机关里有140万人, 家庭单位方面有520万人。此外, 在1959財政年度上半年, 在国外另外分配了90,500万磅的剩余食品給貧苦人民, 价值11,000万美元。当时所动用的主要食品有: 面粉、麦片、奶粉、干酪、黄油、豆类、牛肉、猪肉、家禽、烹飪油和食用油, 以及新鮮的和制成罐头的蔬菜与水果。

在蕭条地区, 如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区, 联邦政府的食品分配計劃具有特別重要性。例如, 西弗吉尼亚州在1959年初有15%的工人失业。《华尔街日报》(1959年3月4日) 报道說, 在該州的200万人中, “有30万人至少部分地依靠联邦供給的剩余食品維持生活”。

农业劳工

据农业部报告, 1958年美国农业雇佣工人的数目为1,955,000人。这个数目比1957年多10万人; 但是比1948年少342,000人。在目前农业雇佣工人的总数中, 約有90万人是流动工人, 其中約有一半是来到美国从事季节性农业工作的外国人, 主要是从墨西哥来的, 但是也有些是从英屬西印度群島、菲律宾和日本来的。有为数很多的流动工人是从波多黎各来的。

全国农业劳工問題諮詢委员会报告說: “在1957年, 农

业雇佣工人的每年平均工資为892美元，包括从非农业工作得到的工資在內。”在这个数目中，有738美元是农业工作的收入，154美元是非农业工作的收入，二者合計比1956年少197美元。1957年，他們每日平均农业工作的收入为4.91美元。他們的工資率不仅是美国经济中最低者之一，而且他們得到的保障也不如任何其他种类的工人。1947年农場的工作日为156天，1957年平均工作日减少为126天，在同一时期他們的非农业劳动日从27天减少到19天。

大多数农业工人都受不到最低工資、最高工时和失业保险等劳工立法的保障。最近有些人可以領取养老金，但是实际上可以領到的人为数很少。

劳工部长詹姆斯·密契尔于1959年2月24日在洛杉磯全国农业劳工工作會議上发表演說时，把农业工人的困难情况說成是“最丑恶的人力浪費”。他說：“我确信，必須給予农业工人以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时的立法所規定的保障。”在他发表演說之前，有大約200个工会糾察員在他发表演說的旅館外面示威，他們的标語牌上要求保证最低工資以及对农业工人予以其他保障。

流动工人工資很低 上述立法的需要是很明显的。1957年夏季，在俄亥俄州，流动农业工人每小时的工資低到只有0.25美元，他們每年的平均工資为700美元。大致在同时，紐約州长島挖馬鈴薯工人的最高工資每天为8.75美元，但每周往往只有一两天的工作。1958年9月全国分成佃农基金会报告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場上，从事灌溉工作的墨西哥籍流动工人每小时工資只有0.5美元。在佐治亚州朗得斯县，收获棉花的工人每小时工資只有0.5美元，烟草工人只有0.37到0.62美元。在路易斯安那州克林頓县，收获

棉花的工人每小时工資为0.25美元，在密士失必州科荷馬县为0.37美元。在得克薩斯州格蘭得河下游，有些雇主付給来自墨西哥的工人的工資少到每小时0.16美元，每周工作60小时。

紐約州工业厅长魯宾把来到紐約州的許多流动工人的居住情况說成是“差不多是不能容忍的”。1958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报告說，违反各州关于流动农业工人的法律的情况很普遍。以后，該协会批評州长洛克菲勒拒絕支持关于流动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資的立法。1959年3月5日在阿尔巴尼举行會議之后，該协会說，洛克菲勒州长“在他受到的第一次立法考验中就拒絕支持采用现实的措施”来保护移民，并且拒絕制止在私人住宅方面和公立学校中所存在的种族歧視。

大紐黑文人类关系委员会1959年3月的报告指責說，在康涅狄格州，波多黎各的农业工人受到残酷的剝削，約有80%的波多黎各人每小时的工資不到0.65美元，有些人則低到0.51美元，工人每周工作時間很少在75小时以下。

沒有組織 农业工人已經組織起来的为数很少。全国农业工人工会(劳联—产联)主席H·L·密契尔說，经过了25年的努力之后，他的工会的會員人数还不到5,000人，只有在主要工会援助下的协同努力才能够打破这种局面。劳联—产联秘书兼司庫威廉·F·施尼茨勒1959年2月6日在華盛頓举行的一次會議上声称，农业工人的待遇是“当代最使人吃惊的事情”。他又說：“美国的許多公司农場对人类劳动的剝削，同本世紀初在美国大多数工厂所盛行的血汗工資，是同样可怕和可耻的。”

施尼茨勒报告說，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正在研究在

美国农业工人中进行大规模组织运动的计划。但是，他说，那将是“一种极端困难的工作”。因为我們在这方面遇到了迪吉奥格奥斯和伯德之流以及其他农业大亨。在这些人中有些是极端仇视工会和与美国进步事业为敌的人。（他所指的是弗吉尼亚州参議員哈里·伯德，他是美国最大的苹果生产者。即使在弗吉尼亚州有很多人失业的时候，他在該州弗雷德里克县的水果生产者协会，还从巴哈馬群島运入黑人来采摘水果。他使这些沒有选举权的工人住在猪栏和茅舍里，付給他們的工資每小时大大低于一美元。）

劳联—产联的产业工会部曾经保证“支持大规模的組織运动”。它說：“农业工人和斯維夫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或通用汽車公司的工人是完全一样的——他們期望已組織起来的劳工运动中的弟兄們帮助他們。”

第四章 工 会

工会会员

据最近官方估计，1957年美国已公布的工会会员人数总计约为1,850万人。这个数目约为美国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如果把农业工人除外，那就是在每三个工人中约有一个是工会会员。

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大约在同一时间所作的关于工会会员的研究发现，191个全国性和国际性（“国际”一词的意义是，有些工会是在加拿大和其他几个地区，如波多黎各）工会的已申报的会员人数约为1,840万人，其中约有100万人在加拿大。两年前，在1955年，基本上相同的一些工会已申报的会员人数为1,750万人。当时美国劳工部在它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工会的发展显然已经在高峰上停止了，即从1953年以来实际上并无变化。事实上，当时比四年前即1951年仅仅增加了会员100万人。

在1957年估计的所有工会的1,850万个会员中，将近1,700万工人是劳联—产联的会员，其中有100万在加拿大；但是该年年底开除货车司机兄弟会和其他工会的结果，使劳联—产联的会员总数降到1,550万人左右。其余的工人分属最近被开除的工会、在1949—1950年被开除的进步人士领导的独立工会、其他独立工会（如联合矿工工会和码头工

人工会〔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某些铁路兄弟会以及其他几个工会。在1957年的工会开除事件以前不久，劳工部认为，有47个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可以称为独立的工会，即不隶属劳联—产联的工会。（美国劳工部第1222号公报。）

也是在货车司机兄弟会被开除之前，这份政府调查报告发现，会员集中在少数大工会之中，是“劳工运动的一个特征。在每三个工会会员中，就有一个是六个各有会员50万以上的最大工会的会员，而会员不到10万人的146个工会，在会员总人数中只占五分之一”。1957年，货车司机兄弟会宣称有140万会员；汽车工人工会占第二位，有130万会员，而钢铁工人工会宣称有110万会员。木匠工会和机器工人工会各有约80万会员。

那时，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合起来共有77,000多个附属地方工会，和两年前所公布的数目大致相同。地方工会一半以上是由18个工会发给执照的，这18个工会每个都已公布有一千多个地方工会。当时，147个工会公布有十一万多件有效的集体谈判合同；有效的合同总数（包括没有公布的工会合同在内）共计约为125,000件。据估计，这些合同适用于1,800万个工人。

过去的劳联和产联所设立的州和地方组织的合并工作，在1957年12月完成。自从1955年12月劳联—产联成立以来的时期中，几个具有类似管辖权的工会的合并也在实施中。在1958年年底，合并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劳联—产联第二次大会

劳联—产联第二次的两年一度的大会于1957年12月5

日到12日在新澤西州阿特兰提克城举行。出席會議的有129个全国性工会、34个州工会以及許多地方中心工会和地方工会的908名代表。

美国劳工部《每月劳工評論》(1958年2月号)說,“在1957年^①合并大会上所表現的乐观和巨大的希望已经不大明显了。在合并大会上所表現的組織热忱似乎由于后来的两年缺乏显著成就以及由于預料造成这种缺乏成就的情况将继续下去而大大地降低了。”

开除附属工会 大会以差不多五比一的多数票决定开除貨車司机兄弟会,因为它沒有滿足劳联—产联会章和規則所規定的道德准則。人們发现,这个工会实质上为腐化分子所控制和支配。

出席會議的代表以大約七比一的多数票决定开除点心和糖果工人工会。大会结束后,該工会的一个反叛集团被发給了新的執照,这个集团自称得到約六万个會員的支持。

大会以几乎全体一致地表决开除了洗衣工人工会和恢复了以前停止会籍的联合紡织工人工会的会籍。該工会保证說,它将完全遵守劳联—产联的肃清命令。蒸餾和酿酒工人工会則受到察看处分,直至它在劳联—产联監察員的指导下肃清組織之时为止。

道德实践 在四項決議中总结了对几个工会所采取的紀律措施以及在这方面的行动的重大意义。一項決議列举了这种行动所根据的会章原則;另一項決議規定了六种道德实践的规范并且授权执行委员会制訂其他必要的规范;第三項決議澄清和重申执行委员会在工会職員引用美国宪

① 原文如此,疑系1955年之誤。——譯者

法第五修正案时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立场；第四项决议保证“对于一切根据客观和公正态度对劳工和资方的犯罪和腐化影响所进行的正当的调查”给予充分的合作。但是，同一决议又表示担心，麦克累伦委员会（美国参议院关于劳工或资方的不正当行为的特别委员会）“可能使它自己被利用来进行政治报复，和成为进行反工会宣传的讲坛”。

大会记录表明，在面临希望在国会中通过惩罚措施的人所提出的立法（这些立法和解决腐化与敲詐问题毫无关系）的情况下，它赞成1958年^①通过的关于调整保健和福利计划的道格拉斯法案。它还說，它将支持“其他可能需要的立法以保护工会和它们的会员免遭……那些力图应付被揭露的具体舞弊行为的人的损害，这些行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是不能适当地加以处理的”。

它又說，它将反对一切这样的建议，即：“在设法使工人免遭腐化行为或不正当活动的损害的借口下，企图削弱工会履行它们的责任的能力，或者企图阻碍美国工会运动实现它的正当的和合法的目标。”

大会的决议攻击麦克累伦委员会用“少得太不相称的”时间来揭露雇主的腐化行为。它也指出，在劳工队伍中的腐化行为，“仅仅是过份强调物质财富的整个美国社会的全部腐化问题的很小一部分”。

政治行动 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重申工会“致力于无党派的政治教育的原则，以期保护和实现美国劳动男女的合法的经济愿望和政治愿望”。它保证劳联—产联“支持国会、州议会和地方政府中两党的自由主义人士”。

^① 原文如此，疑有誤。——譯者

它声明它有权对会员提供关于公务人员投票记录的資料……。它声称：“为了使选举可以不受公司财富和既得利益的控制，美国劳工运动要在经济上支持由于维护社会公道的意见和活动而不能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捐款的候选人，是极关重要的。”

工資冻结和工时 大会强烈反对任何关于自动冻结工資或延长工作周的建議。劳联—产联建筑与建設行业部主席理查德·J·格雷曾经建議“緩期增加工資”。和他的建議相反，大会決議說，“並沒有任何证据，足以說明有冻结工資或在全国范围内延长法定工作周的任何必要。”在即将举行的集体談判中，需要增加工資，“这不仅是为了造福全国千百万工人和他們的家庭，而且因为我們清楚地知道，集体談判是工会对经济起有益作用的最直接的手段”。

賦稅計劃 关于国民经济的決議說，“联邦的賦稅制度应加以修正，以便为增加国家岁入提供一种更公平的基础，并且滿足在经济下降时期加强消費者购买力的需要。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的个人所得稅應該予以降低。應該用取消公司和富有家庭享受的特殊稅則的特权而不提高稅率的办法，来增加5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岁入。”

大会在它关于賦稅的決議中，建議把个人所得稅的免征点提高到700美元；消灭稅法中的許多漏洞；取消不公平的联邦消費稅或銷售稅；以及减轻小企业的賦稅負擔。

技术改变和自动化 劳联—产联要求国会“新技术的社会影响与经济影响”进行不断的研究，并且撥出款項用以报道和研究发展中的事实。它“要求所有的附属工会继续努力，加紧推动有效的集体談判和立法計劃，以使个人和团体（他們的福利由于技术激剧改变的結果而遭到的威胁）

遭受困难的危险减到最低限度，并且保证新的技术将用于提高生活标准并为所有的人提供更多的空闲时间。

外交政策 和以前各次大会一样，外交政策的决议所采取的立场同美国国务院的立场本质上是一样的。和往常一样，它提到“自由国家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并且把苏联的人造卫星叫做“对外讹诈的武器”和“不流血的珍珠港事件”。它煽动冷战，指责美国政府本身在军事防务方面的工作做得“太迟缓并且太少”。

但是，它说：“氢弹、洲际弹道导弹、宇宙火箭和人造卫星已把外交政策问题带到每个家庭里。外交政策同我们的生存以及自由生活方式的存在和进一步繁荣有重大关系。”

它又说，美国劳工“今天和往常一样，支持所有殖民地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类自由的愿望”。但是，它认为，“新的和无限地更加危险的苏联殖民主义”的出现，对世界是一种威胁。

公民自由和国内安全 大会对于联邦最高法院最近释放史密斯法的受害者和不赞成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方法的裁决，没有发表具体意见。但是，它欢迎最高法院“最近”“关于忠诚和安全”的“裁决”。它指出，在过去两年中，“在反工会的雇主的压力下，好几个地方通过了地方条例，限制结社的自由，并且要求在当地进行工会组织活动的任何人，缴纳过重的登记费和执照费。我们有些附属工会否定上述恶毒立法的合宪性，成功地对它进行了斥责。我们决心保持警惕，防备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人权是构成我国民主制度的基础。”

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 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指出，尽管反劳工的雇主们受到塔夫脱—哈特莱法中限制性

的規定的鼓勵，勞工在全國勞工關係局所主持的選舉中的成就，表明了工人支持工會運動的願望。該局的記錄表明，在最近兩年內，勞聯—產聯的所屬工會曾經參加7,000次代表權選舉，並在60%的選舉中得到勝利。這些勝利體現為代表約40萬工人進行談判的權利。該決議再度指出了在南方——尤其是在白領工人中——進行組織工作的困難；但是決議說，不管這一工作如何困難，“統一的勞工運動的堅決努力將最後得到勝利”。

該大會通過的其他重要決議，贊成擴充供低收入家庭用的住宅，改善社會保障規定，擴大保健計劃，放寬移民法，糾正青少年犯罪行為的辦法，制訂聯邦工人補償法，通過剩餘糧食法案以幫助貧困人民，增加對教育事業的補助，以及救濟困難地區和受到工廠遷移打擊的工人。

階級協調 勞聯—產聯主席喬治·米尼在他的開幕詞中說：“我們早就拋棄了工人是一個單獨階級的想法。”在閉幕詞中，他又說：“你們組織起來，以便工人能夠集體地使雇主認識這個事實：工人有權得到我國制度所生產的財富的公平的份額。……我們對這個制度並無異議。我們只是要求獲得我們的份額，因為我們知道，除非我們得到我們的份額，否則這個制度就不能繼續發揮作用。”

大會的決議反映了米尼的這種態度。大會的決議說明了以前的產聯教育和研究部全國主任柯米特·伊比的結論。伊比在《美國社會主義者》雜誌(1958年1月)上發表文章說：“美國勞工運動並沒有說它要反對統治美國的经济勢力，它實際上也不反對我國繁榮所系的戰爭制度……美國勞工運動並不是反資本主義的；事實上它是公開表示贊成自由企業的。它主要的經濟主張是：‘讓我們得到增長了的

生产力的果实的更大份額’。”

对外政策的不同意見

尽管乔治·米尼和他在工会高級領導中的顧問們采取冷战政策，在最近两年中，有些比較爱好和平的情緒已经开始表現出来。这种情緒表明，并非所有美国劳工領袖都同意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的好战意見。

对劳工运动起相当影响的美国人爭取民主行动协会全国委员会（机械工人工会主席A·J·海斯和汽車工人工会主席华尔特·路德都参加了該委员会）在1958年1月26日发表声明，要求对外交政策作重大的改变，声明宣称：“我們的目的是要在和平的世界中实行竞争性的共处，而不是一场不能取胜的战争中争取胜利。”声明又說：“我們应謀求达成一項禁止核試驗的協議”，并且也謀求“禁止生产裂变物质供制造武器之用。——但不坚持以此为禁止試驗的先决条件”。

劳联—产联的国际电气工人工会在1958年9月22日到26日的大会上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更为直率的批評。它說美国的远东政策“在虛声恫吓和黷武好战方面，已达到可怕的程度”。它說：“我們必須毫不迟延地使我們自己摆脱直接卷入金門和馬祖的斗争的情况。”在討論中东形势时，它宣称：“我国在黎巴嫩的冒险——对我国不知所措的人民完全是意料不到而突然发生的——以及我国随后依靠联合国来庇护的行为，只是证明我国政策既危險而又沒有成效的一个最新实例。”

联合制浆和造纸工人工会（劳联—产联）的机关报《联

合造紙》在1958年7月31日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类似的譴責，“美国国际政策的着重点是錯誤的，中东就是最好的例证。……英美在近东的行动显然是出于西欧对中东石油的需要。……我們竭力支持反民主的暴君的搖搖欲墜的政权。……痛苦地重新估計我国外交政策……已经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了。”

在早些时候，当苏联重提召开高級會議来討論世界問題的时候，劳联—产联的切肉和屠宰工人工会机关报《屠宰工人》在1957年12月的一篇社論中說：“有人会說，俄国人不是怀有善意的人，但是至少他們要求我們坐下来談談和平。举行这种會議的要求是可貴的，不應該加以漠視。”1959年2月，爭取清醒的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为支持日內瓦會議向世界各国領袖发出呼吁书，要求管制核武器。切肉和屠宰工人工会秘书兼司庫帕特里克·E·戈尔曼在呼吁书上签了名。

1958年9月4日到6日，美国通訊工人联合会（独立的工会）在它两年一次的大会上通过了和平決議。該決議指出：“从我們工会的经验中，我們知道，代替談判的是冲突。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冲突就是人类毀灭的道路。”

联合电气、无线电与机器工人工会（独立的工会）在它的1958年9月1日到5日的大会上宣称，它支持“任何将导致完全禁止原子爆炸的建設性的发展或建議……。这当然是符合大多数美国人民的願望的，美国人民和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一样是拥护和平的。”

混合成衣工人工会（劳联—产联）在它的1958年5月的大会上发表的外交政策声明中說，它反对一切殖民主义，并且說，“我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應該是爭取实现一个一切

国家和一切人民能够和平和自由地生活的世界。”1958年10月，該工会秘书兼司庫弗兰克·罗森布魯姆在以克拉伦斯·E·皮克特为首的美国著名公民的呼吁书上签了名，該呼吁书要求美国爭取新的外交政策和結束两党的冷战外交。該工会主席雅各布·波托夫斯基曾在早些时候在要求停止核試驗的公民呼吁书上签了名。

在1959年2月初，有22个著名科学家、牧师和企业家发出呼吁书，要求美国、英国和苏联締結关于禁止继续試驗核武器的协定。劳联—产联的通訊工人工会主席約瑟夫·E·貝尔尼和电气工人工会主席詹姆斯·B·凱雷都在呼吁书上签了名。汽車工人工会和州、县、市雇員工会的代表参加了1959年1月23—24日在華盛頓召开的世界裁軍問題第六次全国會議的小組討論。但是，在发起这个會議的20个团体中沒有工会，参加这次會議的有联邦參議員和众議員以及企业界、社会人士与自由职业界的領袖。

国际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在1957年4月举行的两年一次的大会上通过決議說：“实现和平的道路系于共同裁軍、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試驗，主要国家举行更多的高級会談，全面支持联合国，撤退駐在任何其他国家領土上的外国軍隊，承认爭取独立的民族运动，增加世界貿易和交換新聞。”国际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主席哈里·布里奇斯也发表了几次强有力的反映該工会的和平政策的声明。

劳工中的敲詐行为

戴維·薩頗斯在《社会研究》杂志(1958年秋季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在美国帮会党徒和敲詐行騙的恶棍大規

模滲入工會的情況，仅限于很少數的工會。只有“某些工業、商業和行業似乎易于發生大規模的和普遍的敲詐現象，而且這種情況主要地發生在不僅勞工敲詐盛行，而且一般的敲詐行為（其中包括僱主、中間人和其他的人）也盛行的部門。因此，敲詐不是一個勞工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他還指出，在公眾關心工會活動的情況下，“有人用了很大的力量來詆毀過去的社會主義者和擁護福利國家的人，但事實恰巧是，大多數被揭發為敲詐分子和舞弊分子，並且和幫會黨徒互相勾結，或者在自己的工會中包庇這些黨徒的那些重要工會領袖，都是共和黨的顯要政治人物”。

他並沒有指出姓名，但是大家都知道，貨車司機兄弟會的戴夫·貝克（見下文）是1956年強烈支持艾森豪威爾出任總統的人，而且他個人在白宮受到招待並且被邀參加艾森豪威爾的單請男客的宴會。詹姆斯·R·霍法雖然自稱為無黨派人士，也在1956年的密執安州選舉中支持共和黨候選人。木匠工會主席哈奇遜一向是共和黨員，在競選期間他的名字曾被用來裝飾共和黨的“勞工委員會”的門面。

薩頗斯也討論了僱主對有敲詐情形的工會的態度。他說，大多數僱主是漠不關心的。“他們雖然對於發生敲詐感到遺憾，他們卻不願意卷進去。他們在私下里可能強烈譴責這種罪惡，但是他們都避免公開參與解決這個問題。有些和腐化的工會打交道的僱主，只要這個問題不嚴重地影響他們，他們就很滿足而不加過問。其他人對於敲詐行為似乎感到滿意，因為他們恰好可以從中漁利。……叫囂得最厲害的僱主們則利用某些工會的這種丑聞以便污蔑和尽可能地破壞所有的工會。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冷嘲熱諷說，所有工會都是腐化的和反社會的。這些僱主們對於幫助清

理少数腐化和敲詐盛行的工会是沒有兴趣的。”

双重标准 在得克薩斯大学任教的弗雷德里克·麦耶斯在《民族》周刊（1958年3月1日）发表了“腐化的双重标准”一文。他在該文中对于劳工腐化的社会基础采取了类似的态度。麦克累伦委员会曾揭发有些劳工領袖如何濫用他們有勢力的地位牺牲他們的选民利益来为自己謀利的情況。麦耶斯在評論該委员会所揭发的事情时說：“沒有人否认應該設法制止这种不可饒恕的行为。但是，残酷的事实是，虽然这些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社会与劳工运动對他們的期望，但是，一般來說，他們的行为同企业界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劳工运动的基本困难是，企业界的道德准則已經渗入劳工运动。”

他举出許多例子，說明公司和它們的職員所做的事，恰恰同人們指責工会人員所做的一样，但是，却沒有引起报纸用大字标题来刊登。他最后說，“对于劳工运动來說，这是一件很可庆幸的事，因为在它的队伍里，这种行为是这样少，所以当它被揭露的时候，就引起了普遍憤怒。”

在內部民主方面，他說：“在这方面对于劳工运动所要求的标准也比对其他組織要求的标准高。……工会職員沒有一个是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经理那样进行寡头統治的。事实上，股票所有权广泛分散的‘人民資本主义’保证了经理有权而无責任。”（參閱本会小册子，J·M·布迪希著《人民資本主义》。）麦耶斯在举出公司和政治生活中的独裁事例之后說：“現在有人提議制訂联邦立法以保证工人選擇自己中意的人員来代表他們的权利。但是，我們对政客和企业家所要求的行为标准要低得多，以致沒有人建議制訂同样严格的联邦立法来保证股东甚至政党黨員選擇自己

中意的人員來代表自己。”

麥耶斯強調指出這一事實：“企業界的道德信念……滲透了整個社會結構。”他指出，在國會開始調查工會腐化問題之前，貨車司機兄弟會主席貝克“因為他認真主持貨車司機兄弟會而受到社會上很多人的尊敬。他的錯誤是，他在模仿許多企業家方面做得太過火了”。

貨車司機兄弟會：腐化和糾紛

在1957年貨車司機兄弟會的職員在參議院麥克累倫委員會作出不利於自己的供詞之後，政府已對其中某些人提出各種訴訟。

對當時的副主席詹姆斯·R·霍法以及其他兩個和底特律貨車司機兄弟會職員偷聽電話案有關的被告的審訊，在1957年12月因陪審團意見分歧沒有做出決定而結束。嗣後，在1958年6月23日，因同一罪名受到另一次審訊後，霍法和同他一起的被告為另一個陪審團宣布無罪。以前他曾因企圖賄賂參議院委員會一個助理人員而受審訊并被宣布為無罪。

在貨車司機兄弟會主席百萬富翁戴夫·貝克的案件上，政府較為成功。貝克在1957年5月20日因為“嚴重地濫用公款”和他的“沾污勞工運動的名譽的行為”，而被撤銷勞聯—產聯副主席和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職務。1957年12月14日，他在西雅圖因為侵吞出售工會汽車所得款項1,900美元而被判有罪。在早些時候，貝克的兒子因在出售工會兩輛汽車的問題上犯有重大盜竊罪而被同一法院判罪。他被判2,000美元的罰金和三年的察看。嗣後，貝克本人被判總計

达15年的徒刑。这个案件已经上訴。他还因为逃避24万美元的所得稅而被控两次。1959年2月,对他的审讯結束,他被判处五年徒刑和6万美元罰金。他对这一判决也提出了上訴。

在这期間,在1957年10月貨車司机兄弟会在迈阿密召开的大会上,霍法被选为主席以接替貝克。但是,有普通会员13人在法院命令的帮助下,阻挠霍法,使他到1958年1月底才能就职。他們控訴他勾結其他的人为自己的利益操纵选举,借以阻挠他出任主席。关于这次控訴,他們同意了一項折衷解决办法。折衷办法規定由法院指派三个監察員来监督和清查工会的事务。

在貨車司机兄弟会迈阿密大会(該大会拒絕了劳联—产联道德准則委员会所提出的一切指責)之后,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停止了該工会的劳联—产联会籍。以后在1957年12月举行的劳联—产联大会維持了这个决定。

法院指派的監察員的第一次年度报告,主张对以下各方面实行改革:审查貨車司机兄弟会的賬目的办法、職員取保、保存五十多个在全国性工会“托管”下的地方分会的案卷。監察員建議,工会职务候选人都不能利用工会的款項,除非所有的候选人都能同样地利用这种款項;并建議每一个身份正常的会员都应有投票权,被判犯有重罪的会员,在他在本州的选举权恢复后一年內,不能竞选工会职务。監察員也指責了几个地方分会的不正当行为。

1958年8月,一直在批評法院監察員的霍法,指派了他自己的由三个人組成的“反敲詐委员会”来听取关于腐化的指責。嗣后,在12月中,他报告說,这个山前俄亥俄州联邦参議員乔治·本德尔为首的委员会证明該工会是清白的。

霍法在被判沒有偷听電話罪之后不久，便于1958年7月3日在華盛頓宣布成立運輸團結會議，目的是使所有運輸工會組成聯盟。最初涉及的工會是國際碼頭工人聯合會（獨立的工會，它的範圍主要是美國東海岸的港口）和全國海員工會（屬勞聯—產聯）。宣布召開這次會議這一件事，受到國會和勞聯—產聯領袖的指責。

雖然勞聯—產聯命令它的所屬工會取消和貨車司機兄弟會訂立的一切互助協定，但是它却允許保持和該工會的不成文的工作協定，這就實際上保持了地方分會間的“日常的工作關係”。1958年8月18日，勞聯—產聯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命令不得同貨車司機兄弟會保持重要聯繫。該聲明說，“我們並不認為貨車司機兄弟會……的一般會員是腐化的”，也不認為“該工會所有的地方分會領袖都是腐化的”。但是，“我們的确知道，而且這一點也毫無疑問地得到了證明，即：該工會的高級領導……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腐化的。”霍法拒絕勞聯—產聯的全部指責。他說，腐化的問題是“虛構的和假造的”。

組織運動 貨車司機兄弟會自從被勞聯—產聯開除以後，它自稱它的900個左右的地方分會的會員人數已經增加到160萬人以上。在有些地方，它們對勞聯—產聯工會的組織工作給予了一些援助。例如，它們幫助零售店員保障協會贏得和蒙哥馬利華德公司的合同，它們也幫助過紐約市啤酒工人工會、克萊斯勒公司的職員和費拉特爾費亞的報館工人。另一方面，它們雖然奉行不侵犯其他工會的政策，但是最近宣布在沒有組織的水泥廠工人、木材場雇員、出租汽車司機、股票業職員、汽車房工人、汽車推銷員、旅館看門人、飛機場職員以及州、縣、市政府工人（其中甚至包括救火

員、警察和医院工人) 中进行組織工作。它們也爭取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炼油工人的各个独立工会加入它們的工会。1959年，它們最大的吸收會員运动以西尔斯·娄巴克邮购公司的雇員为目标。

虽然貨車司机兄弟会在組織方面无疑地取得了进展，但是，如果劳工运动团結一致，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这同一時間里，有些劳联—产联的領袖怀疑，他們是否由于把貨車司机兄弟会开除出去而达到了他們的目的。有些人开始认识到法院指派监察員的危險性。他們害怕，政府这种对付較腐化的工会的手段，在将来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会被用来作为对付劳联—产联的各个組織的手段。

劳动力中的白領工人

劳动力組成的变化是近年来的一項重要发展。今天美国貿易和服务业雇用的工人超过商品制造业。长期以来的趋势是，在貿易和服务业中工作的人数，在本世紀初为总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强，1955年增加到总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

对劳动力进行更詳細的研究可以看出，自由职业、杂务人員、銷售人員和管理人員在数目上和在全国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都一直在增加。美国劳工部的《每月劳工評論》(1957年4月号) 在进行了这种研究之后指出，从1947年1月到1957年1月，上述职务雇用的人数“由1,980万增加到2,630万，亦即由全部民用劳动力的36%增加到42%。

制造业工人人数的变化 在几十年里面，生产工人在制造业全部雇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

最近10年間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1947年到1957年这10年期間，单是制造业非生产工人数目的增长率，大致是生产工人增长率的15倍。因此，到1957年，在制造业中，非生产工人或者叫白领工人，将近占了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而且預料这个比例还要增大。美国劳工部的估計表明，1947年非生产工人約占劳动力的16%，但是到1957年他們就占了23%以上。（劳工部在它的分类中把像制图員和工程师等工作人員列为非生产工人，虽然在实际上他們参加了生产过程而應該列为生产工人。）

在有些耐用品工业中（新的复杂的技术发展或实行自动化以及有关的扩充需要增加技术人員的工业），非生产工人所占比例要比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例如，在軍需工业中，非生产工人在全部雇用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在1947年不到15%，1957年則增加到40.9%。在这一方面，某些其他工业相应的增加数字是：机械工业由21%增加到28%；电机工业由23%增加到30%；运输設備工业由18%增加到27%；工具制造业由22%增加到33%；石油和煤产品工业由23%增加到33%。在有些集中力量发展导弹的飞机工厂中，現在非生产职工的数目几乎达到了該企业全部雇員的50%。在化学工业中，最近10年来，生产工人的数目仅仅增加5%，而非生产工人却增加了75%。

自动化和各种技术改进的后果增加了工会組織工作的困难。伯納德·卡希在《民族》周刊(1959年1月31日)上发表“白领工人”一文，他在該文中指出，美国工业現在雇用了差不多1,800万非监督工作的白领工人，其中最大的一类是850万杂务人員，其次是自由职业和技术人員——工程师、會計和审計員等。

白領工人的組織 美国劳工部在它最近的《1957年美国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指南》中估計，参加各个工会的白領工人約为250万人。因此，在該指南所列举的所有工会中，划为这一类的工会會員不到这些工会的全部會員的15%。

在这些白領工人中約有一半多一点属于37个工会，这些工会差不多完全是由杂务人員、售貨人員或自由职业人員所組成。大約四分之三的白領工人加入了白領工人占全部會員50%以上的那些工会。在調查范围之內的全国性工会中，約有半数报告說沒有白領工人會員或相信沒有白領工人會員。

大多数有組織的白領工人参加了零售业、公共服务业、交通運輸业以及娱乐业的工会。但是，有几个主要由普通工人組成的工会报告說，它們有数目相当大的白領工人，虽然白領工人在这些工会的全部會員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

1959年初，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就对钢铁工业和有关工业中10万到125,000个办公室職員和技术人員进行組織工作。在当时，該工会的办公室和技术工人部主任約翰·J·帕斯廷报告說，在钢铁工人的組織中，已经有45,000个这种工人有了自己的地方工会和合同。此外，他估計，約有75,000个計时工資的杂务人員已经加入了該工会的地方生产工会。

在钢铁工业中，办公室職員和技术人員約占有資格加入工会的雇員的18%到20%，据估計，到1970年，他們将占钢铁工业劳动力的33%左右。

熟练工人問題

在金属行业中，尤其在汽車工厂中，熟练工人的前途是不稳定的。底特律汽車工人工会东部工具与铸模第155地方分会主席魯塞尔·利奇，于1958年11月对一个失业熟练工人群众大会說，即使在汽車暢銷的年头，工具与铸模工厂中的8,000个失业的熟练工人，大致有35%也恢复不了工作。

熟练工人就业机会减少的原因很多。各主要汽車公司已经学会了使用同一铸模来連續铸造許多模型和有关制品。它們从它們設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工厂以及从日本或欧洲的包工工厂輸入铸模。它們是一些首先使用最新的金属铸造和金属切削方法的工厂——使用电力切削法、电气化学法、甚至爆炸法。它們也使用金属代用品，如塑料和钢心制品。

大产业工会，如联合汽車工人工会，对于在它們的工会中占大多数的生产工人——在联合汽車工人工会中約为10%^①——当然是远为更感兴趣的。它們也不願意因实施工会章程所規定的熟练工人的权利而得罪地方分会中的这类占多数的会员。

同大多数属于劳联—产联的工会簽訂的不侵犯协定，也使熟练工人难于用退出工会的威胁——無論这种威胁是多么并非出于真心——来贏得他們认为正当的权利。而且，全国劳工关系局根据厂家和联合汽車工人工会领导的要求，在代表权选举中——至少在大汽車公司的代表权

^① 原文如此，疑有誤，因10%不构成大多数。——譯者

选举中，对独立的工会关闭了谈判之门，除非它们准备在全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最后，还有一个无情的经济上的事实，即由于熟练工人工资增加，用价格高昂的机器来代替这种工人，对雇主就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了。

底特律的理事会 底特律的熟练工人曾企图成立由他们的熟练工人行业理事会组织的失业工人委员会，来保护其特殊利益。这些委员会向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总部申述它们的不满情绪，并且也向底特律的市政当局提出抗议。

他们的方案包括要求把所有汽车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减为30小时，工资照40小时发给；把发给失业津贴的时限延长到全部失业时期；增加福利津贴；增加社会保障津贴和降低退休年龄；当汽车工厂仍有停工的工人的时候，应该停止加班的办法；应举办或扩大联邦、州和城市的公共工程计划；应宣布失业工人的债务延期偿还，直至他们再度有工作时为止。

熟练工人行业理事会的活动没有得到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会的赞许。1959年2月，执行委员会把联合汽车工人工会38个熟练工人行业理事会和理事分会全部解散，并且把指挥它们的活动权力集中于国际性工会总部。执行委员会还取消了已发行了一期的底特律理事会的新刊物《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熟练工人》（这是发行18年之久的《工具与铸模机械制造新闻》的继承刊物）。执行委员会派了一个行政管理人来主持理事会的办公室。

工会的妇女会员

劳工统计局的1957年工会指南报告说，1956年约有340

万妇女是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的会员。此数比过去两年约增加了40万，但仍不到全体工会会员人数的五分之一。全部妇女劳动力中参加工会的约占七分之一(14%)。

劳联—产联所属各工会中拥有妇女会员5万以上的工会如下：汽车工人，175,000人；面包工人，53,300人；建筑工人，69,000人；成衣工人，288,000人；通讯工人，155,400人；电气工人(国际联合电气工人工会)，159,000人；电气工人(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202,500人；妇女服装工人，338,100人；旅馆工人，176,400人；洗衣工人，85,500人；机器工人，95,000人；肉业工人，62,000人；零售店员，15万人；零售、批发业工人，58,800人；货车司机，150,500人(西海岸货车司机工会会员中有许多是食品及罐头业工人)；联合纺织业工人，52,000人；纺织工人，81,100人。在不属于劳联—产联的工会中，联合电气工人工会有25,000个妇女会员，电话工人工会(独立的工会)有6万个妇女会员。

其他拥有25,000个以上妇女会员的工会有：书籍装订工人，35,000人；联合服装工人，32,000人；包装工人，27,000人；造纸工人，33,000人；铁路杂务工人，42,900人；橡胶工人，35,600人；制鞋工人，3万人；州、县、市雇员，37,500人；教师，3万人；烟草工人，26,000人。据妇女局说，有两个工会，即钢铁工人工会和机关雇员工会的妇女人数“没有确实数字，但相信是可观的”。

1957年12月，原有的劳联和产联各自的妇女辅助组织合并，成立了劳联—产联的辅助组织，它的5万个会员是劳联—产联所属各工会男会员的家庭中的妇女。

工会的黑人会员

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劳工秘书赫伯特·希尔估计，在1958年底，美国工会会员中黑人工人还不到200万人。

虽然劳联—产联官方表示支持一切都享有充分的和平等的权利的政策，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工会都没有执行这个政策。

某些工会的合同中，有这样一条典型的关于公平就业实施的条款：“公司同意对任何申请工作的人或任何工人，在工资、训练、提级、升迁、调动、暂时歇工、纪律或其他方面，不因为种族、信仰、肤色、民族、政治关系、性别或婚姻情况而实行政视。”但是在1958年，汽车工人工会取消了合同中这一条公平就业实施条款，认为这是应该由工厂委员会去处理的“局部性问题”。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劳工秘书在家具工人工会1958年大会上谈到劳联—产联的政策和实际行动时说：“我们对于没有执行”劳联—产联会章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感到非常惊愕”。在希尔于1959年1月5日提出的报告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指责说：“由于电气工人兄弟会第26地方分会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其他建筑业工会执行了‘纯粹白种人’的排他政策……因此黑人工人就得不到在首都各大公私建筑工程中工作的机会。”

报告说，有些工会虽然在会章中规定取消种族歧视，但是仍然根据“默契”排斥黑人。另外一些工会签订了集体谈判合同，只许黑人担任低贱工作，或者剥夺黑人享受与白人工人相同的年资和提升的权利。在南方，有些劳工领袖“正

让种族主义分子取得对地方分会活动的控制权……在許多情况下，工会的車間干事和駐厂代表公开为白人公民委员会募捐，要求給予支持”。該报告說，在建筑业、铁路和其他部門中，工会的这种偏見是使黑人失业人数比全国失业率高一倍以上的一个原因。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宣布說，如果劳联—产联不采取更多的办法去执行反对种族偏見的纲领，那么它就要把五个具体案件（在伊利諾州、密苏里州和俄克拉何馬州）提到法院。

不过，据說在南方各州和处于南北之間的各州的少数几个地方分会中，黑人和白人統一待遇取得了若干进展。由于沒有組織的工人有一半是在南方，所以这些統一待遇的实例就特別重要。例如在圣路易的通用汽車公司分厂的汽車工人工会，直到1957年年底还接受两个年資名单，一个是黑人工人的名单，另一个是白人工人的名单。黑人只在非生产部門內享有年資，他們在这些部門中充当搬运工、清洁工和管理材料的工人。圣路易的費希尔車身工厂現在已經改变了这种年資政策，允許把卫生部門雇用的黑人工人或黑人清洁工改归生产部門工人这一类。

佐治亚州的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和机械工人工会联合举办的学徒計劃，在1951年到1957年的六年間，一直不收黑人。因此，黑人就不能参加在职訓練，并且得不到按年資提升担任技术性更大和待遇更好的工作的机会。在赫伯特·希尔和机械工人工会商談之后，工会同意支持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工人所作的努力，后来黑人被允許担任約40个不同的工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报告說，机械工人工会正在开始采取步驟以消除不同种族分別居住的情况。

不仅在南方各州，而且在北方各州，黑人工人也必须进行斗争才能获得加入工会的权利。在芝加哥，切肉工人工会在1958年年中第一次同意大西洋与太平洋公司雇用黑人屠宰工人。许多黑人工人都加入了煤斗搬运工人工会(Hod Carriers)，但是还不允许他们担任工会职员或代表。芝加哥地区砖匠工会的黑人，在1957—58年的经济衰退中，不得不接受低于工会工资率的工作，因为工会职员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来保护他们。

在芝加哥国际收割机公司工厂，汽车工人工会的黑人会员伦纳德·卡涅在1958年初被选为第1308地方分会的主席。他是美国各收割机工会分会中第五个被选为主席的黑人。在伊利诺州，包装工人工会的国际代表查尔斯·海斯，被选为劳联—产联合后该州的副主席。在路易斯安那州，E·A·布莱恩特被选为劳联—产联合后该州的副主席。

在臥車侍者兄弟工会主席、劳联—产联副主席A·菲利普·伦道夫的领导下，黑人工会会员发起了青年进军，一万青年于1958年10月25日前往华盛顿，支持黑人白人合校运动。

工人报纸停刊

一般人认为美国的工会现在很富裕并且很有势力。许多工会拥有很多房地产、股票和公债，还有豪华的总部和办事处。但是它们却连一家日报也不能维持。《劳工日报》在困难的情况下出版了五年半之后，于1958年3月停刊了。这家报纸是印刷工人工会于1952年9月16日在西弗吉尼亚州

查里斯敦創刊的，它是当地印刷工人工会會員反对报纸出版商不公正行为而举行罢工的产物。后来这家报纸迁移到了衣阿华州貝頓道夫的一家工厂中去。

但是它的銷路只有約1万份，其中7,000份是由工会自己出資郵寄給全国各地車間工会主席的。該报存在的最后一年，当它努力要求劳联—产联所属工会予以支持时，只有四个小工会願意做股东，另外两个小工会願意集体訂閱該报。最后的努力也沒有能筹足5万美元之數来挽救这家不刊登广告的报纸。

該报的政策是对各工会在管轄权問題和其他要求上采取独立的和中立的态度。它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把沒有組織的工人組織起来，以及报道经常被一般商业报刊所歪曲的关于劳工的真正情况。

《工人日报》的停刊 紐約《工人日报》原是主要的左翼劳工报纸，它在美国的劳工和进步运动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該报在1958年1月13日，即它在芝加哥創刊后34周年那一天停刊了。該报編輯部发表了一个声明，历述該报为战斗性的和純洁的工会主义、为失业和社会保險、为集体保障、为黑人的无条件的平等权利而奋斗的历史，以及为反对麦卡錫主义和爭取权利法案而斗争的历史。《工人》周刊則由該报一部分工作人員继续出版。

大約在一年以前，为西海岸地区工人运动的群众利益服务的西海岸的进步日报《人民世界》，被迫停刊了，因为它缺乏支持。它的最后一期是1957年2月1日出版的，但是它从1957年2月16日起改为周刊继续出版。

反工会活动

許多美国劳工領袖的本錢就是說些关于劳資合作的甜言蜜語，但是在这背后，階級斗争以各种方式继续进行着。大企业对工会权利的进攻，是在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数十个工业协会和貿易协会等团体的指揮之下进行的。这种进攻是通过报刊和其他通訊工具的公开宣传、成立新式反工会組織以及在联邦或州一級制訂立法等方法来进行。

僱主們向工会进行斗争时所采用的策略，虽然近年来一般地比較含蓄和不那么粗暴，这是劳工在集体談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結果，但是还是有許多证据表明，他們仍然在运用对劳工进行偵探、編制工会积极分子的黑名单和破坏罢工等旧手段。

甚至联邦参議院麦克累伦委员会（它的主要兴趣在于对一些工会加以各种“不正当活动”的誣蔑）也不能不去調查一下近年来某些大僱主所使用的反工会手段。

劳工关系社 参議院麦克累伦委员会被迫調查芝加哥的一个叫做劳工关系社的組織，这个組織的領導人是內森·W·謝弗曼。它代表着散处美国各地的 400 家公司。它是全国几十个这类組織之一。委员会发现在1949年到1955年的七年期間，該組織的总收入將近 250 万美元。它所服务的公司包括維克托計算机公司，美国捷运公司，惠尔浦公司，梅嫩公司，斯凱弗啤酒公司，联合包裹递送公司，全州保險公司，S·S·克累斯格公司，以及国内的一些最大的百貨公司，如得克薩斯州豪斯敦的尼厄曼—馬克斯公司，和紐

約市的亚伯拉罕与斯特劳斯公司，勒訥商店，阿耳特曼公司，布卢明德耳公司和梅西公司等。

仅西尔斯—娄巴克公司一家就曾付給該組織将近25万美元，让它进行活动，阻碍劳联—产联的零售店員工会在該公司工人中进行組織工作。事实上，参議院委员会的临时报告說，这个謝弗曼原来就是“靠着西尔斯—娄巴克公司的帮助、策划和財政援助”而建立他的事业的。

参議院委员会报告了謝弗曼的組織所使用的手法，例如在衣阿华州韦伯斯特城的莫頓冷藏食物公司一案中所使用的手法。它帮助这家公司在工会組織运动期間准备反对工会的传单，并且通过它的偵探組織建議哪些工人應該开除或調任較低的工作。这家公司付給該社約12,500美元，作为阻撓在該公司的工厂內成立工会的費用。据参議院委员会估計，这样，这家公司由于不必按照一般有工会的公司实行的工資标准发放工資而节省了17万美元。該公司的另一个工厂在成为紐約大陆面包公司的一部分之后，经过該社从中安排，和面包工人工会簽訂了一个“情侶”合同，其中几乎沒有規定在面包业其他工厂中普遍实行的任何条件。

甚至該委员会主席参議員麦克累伦自己也在1957年11月5日的发言中承认說：“在本委员会面前揭露出来的一些活动，反映了国内有些企业公司大为丢臉。这些公司不能够像在本委员会作证的某些公司所作的那样装模作样地說，所有这一切都是謝弗曼和他的人員所干的。……为內森·謝弗曼的活动出錢的正是資方；直到最近几个月事情敗露以前，还毫不在乎或毫不遺憾地利用謝弗曼替它們服务的正是資方。他們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事情，而且知道他們的錢是怎样使用的。”（見1957年11月7日《紐約时报》。霍

伯曼在1958年7—8月号《每月評論》中引用。)

这些破坏工会的组织常常表面上是以把“赤色分子”撵出工厂为目标而进行活动的,但是,实际上它们的真正目的是阻止任何种类的工会活动。如果它们不能摧毁一个工厂中的工会或不能阻止工会的成立,它们就会让它们的偵探或工作人员打入工会,以便削弱工会在談判中的地位。它们甚至企图在反共的借口下夺取工会的控制权。

美国安全理事会 另一个性质略有不同的迫害工会进步会员的组织是美国安全理事会 (American Security Council), 它的总部設在芝加哥。支持它的有諸如伊利諾制造商协会、芝加哥雇主协会、伊利諾州商会等大社团和反劳工的各个雇主协会。該理事会的成员包括:美国钢铁公司、伊利諾中央铁路公司、貝尔登制造公司、莫托洛拉公司、阿克姆钢铁公司、克拉夫特食品公司、联合百貨公司、馬歇尔·費尔德公司和斯蒂华·維尔納公司等。西尔斯—麥巴克公司的退休董事长罗伯特·E·伍德將軍就是該会的主要创办人和发起人之一。

美国安全理事会已经編制了一个黑名单的档案, 其中有一百多万个“顛覆分子”的名字。它利用这个档案使各成员公司能够对申請工作的人或已经雇用的工人进行“忠誠审查”。这种黑名单是通过一个叫做“費德法克斯”(Fidel-fax) 的輔助组织編来的。“費德法克斯”在主要工业城市設有办事处, 每一个办事处都由一个联邦調查局过去的工作人员主持。

美国安全理事会在写給要求加入該理事会的公司的信中強調一个事实, 即法律要求联邦調查局把它的关于“顛覆活动”的档案保守秘密。“因此工业界就组织了美国安全理

事会来满足它对有关这种活动的实际资料和指导的需要。”（《工人》周刊1958年8月17日所载薩姆·庫希納著：《黑名单和开厂运动的关系》一文引用。）理事会通过联邦調查局过去的工作人员而和該局建立密切关系，这就暗示联邦調查局的“事实资料”可能供給参加美国安全理事会的各公司。

塔夫脫—哈特萊法的运用記錄

全国劳工关系局充滿了艾森豪威尔所指定的偏向雇主的发言人。在該局的影响下，利用塔夫脫—哈特萊法来阻碍工会的成立或破坏已成立的工会的做法，已被变本加厉地使用起来。1957年12月阿貝·默多克的任期屆滿，他的职务由国防部負責工业关系的約翰·H·范宁接替，于是劳工就失去了在該局中最后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辯护人。在过去两年中，答应劳工的对塔夫脫—哈特萊法的修正案一个也沒有通过，而該局反而专橫地致力于最反动和最具有破坏性的由行政机关制訂法律的工作。

艾森豪威尔政府新設的这个局的偏見，可以从它不断改变前例的事实中看出来，改变前例的結果是放寬了适用于雇主的規則，而限制了适用于工会的規則。該局在“言論自由”的原則下，让雇主們享有几乎无限制的自由，对想进行組織工作的工人施加威胁和恫吓。它作出了非常不公平的反工会的裁决，后来这些裁决都被法院一致否决。例如在班塔案件中，它认为密士失必河上拖船工人的組織者犯有“压制”一帮武装暴徒的罪名，而这些暴徒曾經对一个組織者开过枪；又如在密苏里州帕斯卡古拉的 BVD 案件

中，它认为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一些糾察員犯有使用暴力的罪名，因为他們沒有公开声明他們跟不明来历的外来人的某些行为无关；再如在佛蒙特州腊特兰的现代麻紡織厂案件中，它拒絕恢复一个工长的工作，这个工长因为被傳訊到該局时提供了不利于公司的証詞而失去了工作。

雇主的策略 雇主，尤其是南方的雇主，在全国劳工关系局的这种鼓励下，发展了一套反对工会运动的“纵深防御法”。第一步是进行恫吓，包括开除的威胁、侵犯人身的暴力行为、迁移工厂等。第二步是拒絕答应举行代表权选举，在日期、由誰組成談判团体、或者在任何可以造成拖延時間的技术性問題上推托不决。第三步，如果全国劳工关系局下令举行选举，那末就制造大批反工会的信件，主管人事人員在公司办事处或工人家庭里作大声疾呼的演說，不預先警告就借口工作有錯誤或微小的违反公司規則的行为而开除工人，以及往往部分地拆除工厂設備。第四步，如果工会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公司可能提出它明知是不能接受的合同，而不老老实实地进行談判，或者甚至完全拒絕进行談判，一直到联邦法院命令它进行談判时为止，而这往往要拖上好几年。

罢工破坏者的选举权 从已经成立的工会的观点来看，現行法律中威胁最大的一点，就是第九条丙項第三款，該款規定在代表权选举中，“沒有复职权利的罢工工人沒有投票权”。弗吉尼亚州溫彻斯特的奥沙利文橡胶公司的联合橡胶工人工会的工人罢工一年，在罢工期間公司召来了大批罢工破坏者补充到公司的車間——在罢工经过一年之后，公司在1957年4月向全国劳工关系局要求进行新的选举并取消工会的特許证。結果，由于以前的工会會員因职

务被人代替而不能参加选举，而罢工破坏者又被允许投票，因此工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并且被破坏了。

对纠察的限制 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寇蒂斯兄弟家具商店的案件中，全国劳工关系局对纠察工作给予了严重的打击。货车司机兄弟会会员虽然在那里的选举中失败，但仍然继续进行纠察；全国劳工关系局一反过去的决定，第一次裁决说，一个工会如果在公司工人中并不代表多数，它进行纠察来要求承认它是唯一的工会，这是违法的。全国劳工关系局并且认为这次纠察是不合法的，因为它的目的不仅是要“胁迫”雇主，并且还要“胁迫”未参加工会的受雇者，“因为企业遭受损失，他们也免不了摊上一份损失”。默多克表示不同意，他说：该局多数对非法威胁行为的定义是“非常极端的，以致会使一切纠察行动成为不合法”。

重新利用法院禁令 该局把时间往回推了几十年，目前正在准备重新利用禁令作为破坏罢工的武器。法律中有一项很少运用的条款，规定该局有权请求法院对有不公平的劳工行为的人发布禁令。该局已经利用这个条款来破坏矿工工会对韦斯特克洛克斯公司进行的罢工；它也企图对豪斯敦城的蒙哥马利·华德公司进行纠察的零售店员工工会如法炮制。根据该局在寇蒂斯案件中所作的新解释，少数工人进行纠察要求承认，是一种不公平的劳工行为，因此，在雇主所雇用的罢工破坏者占了多数时，该局就有权请求法院禁止纠察行动，击败罢工工人和摧毁工会。

“工作权利”法

所谓“工作权利”法，已在19个州中通过。它不但禁止

“閉厂”制度——即雇主只能雇用訂有合同的工会的會員。它还禁止“工会工厂”制度——即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在就业一个时期之后必須加入工会。全国性的塔夫脫—哈特萊法（見上文）禁止“閉厂”制度，但允許訂立“工会工厂”式的合同，只是在有州法律規定禁止这种合同的各州中是例外。有組織的工人十分重視最近制止各州通过这种州法律的斗争，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种法律同时也禁止“保持会籍”的办法——这种办法規定在合同开始时是工会會員的工人，在合同有效期間必須保持其会籍。

在1957年間，“工作权利”法案已在15个州的州議會提出，有的提案主張通过这种法律，有的提案建議把該法案交付公民投票，有的提案主張撤銷現有的法律。各种主張，勢均力敵。只有印第安納一州通过了一項法律，堪薩斯州決定把法案交付公民投票。在六个州中，取消現行法律的企圖遭到失敗。

在1958年选举中，六个州的选民就“工作权利”法进行投票。五个州沒有通过这些法（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俄亥俄州和华盛顿州），但是堪薩斯州約以四对三的比数通过了这个法律。

在1958年間，另外四个州的州議會討論了“工作权利”法案，它們是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馬里兰州和罗得島州，但都沒有通过。馬薩諸塞州通过了一項決議，向国会表示反对“工作权利”法。

目前制訂了普遍适用的“工作权利”法的19个州如下：亚拉巴馬、亚利桑那、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印第安納、衣阿华、堪薩斯、密士失必、內布拉斯加、內华达、北卡罗来納、北达科他、南卡罗来納、南达科他、田納西、得克薩斯、犹

他和弗吉尼亚。路易斯安那州有这种法律，但只适用于农业和某些加工工业的工人。

铁路工会的机关刊物《劳工》(1958年11月22日)在总结1958年选举中该法案失败的主要原因时说，“实际上每一种分析都表明，大多数投票人都认识到，这个反工会的法律是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其他雇主集团所推动的，而且是它们花了大量钱来推行的。在许多地区，它们还得到农村联合会的反动领袖的帮助。”有许多个别公司，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公开被指为这种法律的支持者。“因此，十分清楚，‘工作权利’的阴谋远不是什么工人争取‘自由’的自发运动，而是老板所发起的建议，目的在于削弱有组织的劳工。”堪萨斯州是雇主们得逞的唯一的州，在那里雇主们的活动进行得格外隐蔽。他们所花的钱按人口比例计算要比其他五个州都多。

“工作权利”一词，正像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研究部的一个备忘录所指出的(1958年6月)，是“狡猾而能迷惑人的。这种立法的创议者希望利用这个名词来欺骗人们支持他们的提案”。它还指出：“为‘工作权利’辩护的雇主，实际上是在争辩说，只有雇主才有权决定工作条件，而不要工人通过工会来参与此项决定。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一向反对工人每一次前进的雇主，现在却企图作为个人的‘工作权利’的捍卫者出现。”

1957—58 年的罢工

劳工部报告，1957年美国发生罢工3,673起，参加的工人约有139万，占全体在业工人的3.1%；1956年为3,825

起，参加的工人约为190万。在战后年代中，只有两年罢工的起数比1957年少，1948年为3,419起，1954年为3,468起。

在战后年代中，1957年由于罢工而赋闲的工人人数也最少，损失的工作日（1,650万）也最少，罢工人数占全部工人的比例也最小。但是按人计算损失的工作日（11.7%）则比1955年（10.7）和1951年（10.3）略多一些。

1957年的新罢工有13起，各有一万人以上。其中包括工人散处广大地区的同一工业或公司的罢工。人数最多的一次罢工是在西方电气公司所属全部工厂中举行的、由美国通讯工人工会领导的全国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125,000人。这次罢工从9月16日开始，历时四天，结果订立了为期两年的合同，工资每小时提高0.06至0.12美元，从1958年1月起生效；安装工人多增加0.02美元；调动津贴和出差费也有所增加。

1957年历时最久的罢工是水泥工业的罢工，从5月15日开始一共持续了94天。21个州约16,000个工人，在水泥、石灰和石膏工人工会领导下，赢得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工资平均每小时增加0.136美元，其中0.1美元由1957年5月1日起算；增加各项工资的差别；星期日工作工资增加十分之一，放宽工作年限长的工人的假期津贴，连续作12小时以上的工作工资加倍计算。

码头工人联合会（独立的工会）从缅因州到弗吉尼亚州的共约35,000个码头工人，于1957年2月12日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于1956年11月开始的纠纷所引起的。2月17日签订了一个“总”合同，工人的工资从1956年10月1日起每小时增加0.18美元，从1957年10月起再增加0.07美元，1958年10月起再增加0.07美元；它还规定了一个根据消费者物价指

数自动调整的条款，雇主对福利津贴负担的款项每一工作时增加0.05美元。

固特里奇公司在八个州所雇用的橡胶工人工会会员约14,000人在4月间罢工15天。他们赢得了为期两年的合同，规定增加夜班工资、放宽关于假期的规定以及其他的利益。华盛顿州西雅图约10,000五金业工人在4月间罢工23天，结果工资每小时增加0.13到0.25美元。

1958年罢工次数较少 据美国劳工部报告，1958年发生罢工共3,400起，比前一年略少。参加人数约为220万，共计2,350万个工作日，这表明1958年的罢工持续时间比1957年略长。1958年罢工的起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少的。

1958年没有经过罢工就签订了許多规定增加工资的集体谈判合同。其中包括下列各业的合同：烟煤、电话、橡胶、飞机制造、海运和西海岸码头工人。

在1958年的罢工中比较重要的有10起，每一起都有一万以上工人参加。在女帽业历史上第一次的全国性罢工中，礼帽、便帽与女帽工人工会中约22,000个工人，从1958年1月9日起至13日投入了罢工。根据合同，他们得到的是：计周工资工人增加工资5美元，每周工作35小时的计件工人增加工资5%；雇主对假期基金和对退休和福利计划所负担的款项增加2%。在普遍实行40小时工作周的地区，工作时间减为37.5小时，而不减少工资。7月间，约8,000个属于同一工会的便帽工人，在六个州中举行罢工，签订了合同，规定计时工人工资增加三至四美元，计件工人增加5%。

纽约州和从缅因到马里兰其他六个州2,280多家商店的妇女服装工人工会会员大约105,000人，在3月间罢工五

天。他們要求普遍增加工資每周10美元，对計件工人給予和計时工人相同的假期和加班的額外工資；并且要求取消这个地区內工資的差別待遇。根据4月中旬簽訂的总合同，工資增加8%——五年来的第一次——对工作超过七小时者給予加班費，給予計件工人假期工資，并設立退职基金。

已持续四年半之久的威斯康星州科勒公司的汽車工人的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美国劳工史上時間最长的罢工。联邦参議院麦克累伦委员会在2月和3月举行的听证会，以这次罢工作为主题。这次罢工是在1954年4月5日开始的，工人要求每小时工資增加0.2美元，和实行“工会工厂”制。公司拒絕这两个要求。在1958年間，工厂門口仍然保持着象征性的糾察线。

新澤西州坎登的坎貝尔羹湯公司約4,500个屠宰工人工会的工人罢工一个月之后，于4月初簽訂合同，規定工資每小时增加0.08美元。克利夫兰地区約3万建筑工人从5月初到6月17日举行罢工，結果工資每小时立即增加0.09美元，1959年1月再增加0.06美元，1959年5月再增加0.1美元，1960年5月再增加0.12美元。

在夏威夷，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于6月6日結束了为时126天的罢工，簽訂了为期三年的合同，規定13,500个工人立即每小时增加工資0.16美元，1960年7月再增加0.07美元，每周超过40小时工作者付給加班工資。

9月間，罢工工人人数增加到約50万人，这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月份数字，其中約三分之一是汽車工人。伊利諾州履帶拖拉机公司工厂的汽車工人工会會員約12,000人，从10月11日到11月30日罢工。結果，他們贏得从1958年起普

遍增加工資，每小時增加0.08到0.17美元；1959年及1960年10月每小時增加0.06到0.07美元；假期津貼和养老金也增加了。

克萊斯勒公司約8,000個領薪水的職員，不滿意10月間簽訂的汽車業總解決的條件，在11月中旬舉行了為時將近一周的罷工。B·J·威迪克在《民族》周刊(1959年1月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稱這次罷工是“1958年意義最重大的罷工”，因為這次罷工卷入了這樣多的非生產工人。

印第安納州南本德的史蒂倍克一派卡德工廠的汽車工人工會約6,200工人，從11月24日起罷工四天，結果工資每小時普遍增加0.07美元，熟練工人每小時另外增加0.08美元。在這普遍增加的0.07美元中，1958年12月起增加0.06美元，0.01美元是生活費用調整費，從1958年9月1日起補發。

在克萊斯勒公司各工廠罷工18天之後，汽車工人工會於1958年12月19日同公司就工作標準的爭議達成了“一般諒解”。工會接受對工作時間進行研究的辦法，而公司則承認工會有權對工作速度的“公平性”提出反對意見。工會接受了400個工人每天休息四次每次五分鐘的要求，因而把工人的工間休息時間減少三分之一。底特律道奇工廠開始的罷工，造成了產品缺乏的情況，使克萊斯勒公司所有的裝配工廠都停工，牽涉到將近44,000工人。

全國五家最大的國內航空公司在1958年10月、11月和12月間發生罷工。經過罷工而達成的為期三年的合同規定地勤人員的標準工資是每小時2.95美元。首都航空公司因為機械工人工會的2,500個技工和其他地勤人員罷工而停頓37天(至11月23日止)。合同規定提高工資5%，從1957年

10月1日起补发，1958年增加工資7.5%；1959年10月1日再提高3%。技工在三年中每小时工資增加0.41美元。工会并且赢得了退職金計劃和增加了假日。环球航空公司6,700个地勤人員罢工17天，到12月8日停止，結果工資增加了，并且赢得了退職金計劃。东方航空公司550个航空工程师在11月24日举行罢工，5,380个技工举行了同情罢工。东方航空公司在年終同航空工程师和航线駕駛員簽訂合同，規定每一架噴气式飞机上，除航空工程师外，还增設一个第三駕駛人員。美国航空公司約1,500个駕駛員于12月20日罢工，至1959年1月9日結束，訂立了为期三年的合同，規定駕駛員每月飞行時間最高不超过80小时。

在紐約，約2,500个送报工人工会會員在12月間举行罢工，反对报纸出版商联合会。大多数报館也停止了其他工人的工作，这些人都停薪休假了。1958年12月28日送报工人工会接受了合同，規定把每捆报纸重量从53磅減为50磅；第一年每周工資增加3.55美元；有薪假日增加一天；第二年增加1.75美元，有薪病假增加三天。关于縮短工作周的要求，他們沒有成功。

第五章 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

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宣誓书

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发表一項影响重大的裁决（以六票对一票通过），規定政府必須提出联邦調查局的报告作为证人口头证詞的根据，否則就撤銷訴訟案件。這項裁决允許对新墨西哥州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第 890 地方分会前任主席克林頓·詹克斯进行重审。詹克斯是在1954年被判根据塔夫脫—哈特萊法提出非共产党人宣誓书时提出了假宣誓书的罪名。

由于最高法院发表上述裁决，1957年12月31日得克薩斯州联邦地方法院撤銷了政府对詹克斯的控訴案。司法部要求撤銷該案，因为“根据現有的证据，对该被告进行重审，政府不能取得胜訴，因此不得不提出要求撤銷对他正在进行的控訴”。

《紐約时报》在6月4日指出，要求撤銷訴訟的真正理由，“是司法部不願意强迫联邦調查局把它的秘密档案向被告的辯护律师公开出来”。但是按盎格魯撒克遜法律悠久的基本規則，任何案件的双方都有权要求获悉对方所有的有关資料。詹克斯案的裁决的結果是推翻了許多其他有关公民自由的案件。（見顛覆活动管制局控告共产党的案件。）

特拉維斯的有罪判決 开采冶炼工人工会前任秘书兼

司庫莫里斯·E·特拉維斯在1958年2月再度被判犯有根据塔夫脫—哈特萊法提出非共产党人宣誓书时签署了假宣誓书的罪名。第二次的审讯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举行的。审讯继续了18天。1958年3月28日他被判八年徒刑，4,000美元罰金。他再一次提出了上訴。

对特拉維斯的第一次有罪判决，在1956年12月被推翻。当时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全国劳工关系局无权宣布开采冶炼工人工会违法。丹佛的联邦巡迴上訴法院在1957年7月15日准許对他进行重审，該法院裁决說，在对 他进行第一次审讯时，对他提出的关于在参議院听证会上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那些問題是不应当的。

俄亥俄州七人案 在克利夫兰，1958年1月29日有七个人被联邦陪审团判决，犯有“阴谋”违反塔夫脫—哈特萊法关于非共产党人宣誓条款的罪名。1958年2月19日，这七个人各被判18个月的徒刑和2,500美元的罰金。七个人都向上級法院提出了上訴。

七个被告的律师在1958年10月16日提出申請，要求联邦地方法院根据新证据进行重审。申請中揭露这个訴訟案的告发人和主要证人弗雷德·L·加登納起了假誓。他在审讯时否认他曾在美国陆軍中服役，但档案证明他曾两次在陆軍中服役，曾受軍事法院审讯，并被判为逃兵。但是被告要求重审的申請被拒絕了。1959年3月，該案提到了联邦巡迴上訴法院。

被控签署假宣誓书的人是：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第735地方分会前事务人員瑪丽·李德·豪格，和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第705地方分会前任主席弗雷德·豪格。被判和这两人“共謀”的有埃里克·J·萊因特勒，海曼·拉默，詹姆斯·

F·韦斯特，薩姆·李德和安德魯·雷米斯。第八个被告是爱德华·J·查卡，他于1958年1月被释放，因为对他起訴的证据不足。瑪丽·豪格是有名的女工領袖，她作证說，她在1950年第一次签署塔夫脫—哈特萊法宣誓书时退出共产党已滿一年了。

政府在这个案件中，根据一种新方針而集中攻击工会积极分子进行“阴谋”。这个方針开始于最高法院推翻司法部的决定并撤銷史密斯法案件之后。

其他工会案件 对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的14位領袖的审讯，最后决定在1959年1月19日进行，即在对他們起訴两年后进行。1956年11月，这14个人根据塔夫脫—哈特萊法被控犯有签署虛假的非共产党人宣誓书的罪名。

約翰·J·基利安，威斯康星州联合电气工人工会一个地方分会的前执行委員，两次被判五年徒刑，罪名是违反塔夫脫—哈特萊法中关于非共产党人宣誓的条款。他的第一次判决根据上述关于詹克斯案的裁决而被推翻，但是在1958年5月，他再次受审，再次被判有罪，并且他已再一次提出上訴。

梅耳文·赫普曼，俄亥俄州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前領袖，由于被控犯有提出虛假的非共产党人宣誓书的罪名而被判五年徒刑，已服刑将近四年。1958年4月18日他被假释出獄。赫普曼在1954年1月受审，当时根据政府雇用的证人的证詞而被判有罪。政府甚至无法证明他曾經签署过非共产党人的宣誓书。

阿耳·費希尔，华盛顿州西雅图美国木业工人工会以前的職員，被控在根据塔夫脫—哈特萊法所規定的非共产党人宣誓时作了虛假宣誓的罪名，在1955年1月和1957年

3月两次被判五年徒刑。他的上訴最初为联邦上訴法院所拒絕，后来又被接受了。但联邦最高法院在1958年11月和1959年1月两次拒絕接受他的上訴。1959年初，費希尔开始坐监服刑。

休·布萊逊，海上厨师工会前任主席，被判犯有违反塔夫脫—哈特萊法的罪名，現正在服五年的徒刑。最高法院拒絕受理他的案件。

蔑視罪的判決

华金斯案 联邦最高法院1957年6月17日以六对一的多數裁決，推翻了对伊利諾州汽車工人工会过去的組織人約翰·T·华金斯所判的蔑視国会罪。华金斯在1954年4月29日被传至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时，曾拒絕對他过去的某些同事作证，或指认他們是共产党人。他认为根据保障言論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他有权拒絕。最高法院发回該案，并命令联邦地方法院撤銷控訴。

最高法院院长华伦起草多数的意見书，他写道，一切調查都“必須与国会的合法任务有关系，并且是推进这一任务的。……国会沒有为揭露而揭露的权力。……在这个問題上，必須避免犯‘含糊的过失’，正像对待其他一切罪行一样。……显然，任何調查都應該服从这个原則，即国会不能制定剝夺言論、出版或集会自由的法律……宪法第一修正案可以被援引来反对法律或立法对应受保障的各种自由的侵犯”。

最高法院根据这个裁決，要求国会更确切地規定調查委员会的职权，这便实际上限制了国会調查的范围。这个

裁決限制了國會的權力，使國會不能對證人進行目的不明確的“採取口供”的行為，並且使被調查的人有了保障。但是雖然有了這個明確的裁決，到1958年年底，仍然有許多因引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則而被控蔑視國會罪的案件懸而未決。這些案件處在不服下級法院的判決而進行上訴的不同階段。這些下級法院的判決聲稱，關於華金斯案的裁決不適用於這些案件。以下是其中幾個案件的概況。

根據華金斯案的裁決，有些蔑視罪案件被撤銷了。（見下文。）如果10年之前就作出這個裁決的話，就會挽救很多有良心的好人，使他們不致坐牢服刑，其中包括好萊塢的10人、反法西斯難民委員會委員、美蘇友好協會全國委員會的領導人、民權保障大會的領導人以及其他的人。

奧勒塔·奧康諾·耶茨在1958年1月28日以蔑視法庭的罪名被判一年徒刑。她原來是在1952年加利福尼亞州史密斯法審訊中被判有罪的，但是她提出了上訴。1957年6月聯邦最高法院裁決說，她拒絕回答分開的11個問題，構成一項單一的蔑視罪，並把該案發回下級法院重新考慮。在她第二次上訴後，1958年5月5日最高法院以六票對三票裁決說，她已服刑七個月，已經夠了，並取消了一年的蔑視罪徒刑。

維持原判 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聯邦上訴法院在1958年1月19日以五票對四票的很接近的多數票，肯定了对薩爾學院前心理學講師勞埃德·巴倫布賴特所判的蔑視罪。但是1957年6月，法院“根據對華金斯案的裁決”會推翻對他的有罪判決，並把該案發回上訴法院。（見上文。）

巴倫布賴特曾被判處六個月監禁和250美元罰金。他在1954年曾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拒絕回答眾議院非美活動

調查委員會的五個問題。在維持原判時，上訴法院聲稱，委員會的目的已經具體地告知了巴倫布賴特，因此該案與華金斯案不同。

但是上訴法院法官埃杰頓不同意對該案的判決，他說，從委員會的授權決議中，對於委員會究竟要調查什麼事情，“沒有人能夠合理地得出結論”。美國公民自由同盟支持巴倫布賴特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第二次上訴，1958年11月最高法院再次受理該案。

推翻原判 普利茲獎金獲得者、劇作家阿瑟·米勒的蔑視罪，在1958年8月7日為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所推翻。判他無罪時，法院一致裁決，1956年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沒有充分警告這位劇作家犯蔑視罪的危險。1957年2月他被控犯有蔑視國會罪。

根據對華金斯案的裁決（見上文），奧托·內森博士在1957年11月22日被免除了蔑視國會罪。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愛德華·M·柯倫說，他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決”，但是必須服從它。他“不得已”批准了判以無罪的要求。內森博士是艾伯特·愛因斯坦的遺產保管人，他在1957年4月30日被判蔑視罪，因為他曾在1956年6月拒絕回答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關於他的政治見解的問題。

在1957年6月28日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聯邦上訴法院推翻對康奈爾大學動物學教授馬克斯·辛格爾犯有蔑視罪的判決時，也曾引用華金斯案的裁決。辛格爾在1954年11月2日曾因拒絕指名說前同事為共產黨人而被判有罪。1957年4月上訴法院曾經以二票對一票維持有罪判決。

1958年12月15日聯邦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見推翻了埃布

勸姆·弗拉克塞犯有蔑視国会罪的判決。1951年弗拉克塞（当时是联合公用事业工人工会的領袖，該工会已解散）曾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拒絕把工会會員名单交給參議院国内安全小組委员会。

他被判两个月监禁，1,000美元罰金。联邦上訴法院曾两次决定維持原判。

戈杰克的上訴 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第九区工会前任主席約翰·湯馬斯·戈杰克在1958年对于他受到的有罪判決提出上訴。1956年6月他曾因蔑視国会罪被判九个月监禁和200美元罰金。因为他曾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拒絕回答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关于他的政治見解問題。在1958年年底，他的案件提到联邦最高法院；当时对巴伦布賴特案尚未作出决定。

这个案件被认为是运用对华金斯案的裁决的有效考驗。政府律师在联邦地方法院审訊时承认，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傳訊戈杰克的目的是企图在他的团体中“揭露”他。該委员会当时的主席是众議員弗朗西斯·E·华尔特（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該委员会于1955年2月移至印第安納一密执安州的工业区，那时正是联合电气工人工会举行集体談判选举的前夕。

律师的案件 1958年5月19日联邦最高法院以六票对二票，推翻了对紐約律师哈里·薩克尔的蔑視国会罪的判決。他曾在1955年4月間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參議院国内安全小組委员会关于他的政治关系的問題。但是对于委员会所提的关于哈維·馬图索改变信仰的問題，他却作了充分的回答，而馬图索改变信仰問題是听证会的主题。

紐約律師、美國公民自由同盟委員會前任委員亞伯拉罕·艾塞爾曼，在1958年1月29日被取消律師資格，不准再在紐約南区聯邦法院執行律師業務。取消資格的決定是聯邦法官約翰·W·克蘭西根據紐約市律師協會和紐約縣律師聯合會的請求作出的。艾塞爾曼曾於1949年在根據史密斯法審訊11名共產黨領袖時任辯護律師。由於“干擾”法官梅迪納（他對被告的偏見是非常明顯的），艾塞爾曼被監禁四個月，他任律師的資格也被聯邦最高法院和新澤西州法院取消了。

伊斯特蘭委員會的迫害

以參議員詹姆斯·伊里特蘭（密士失必州民主黨人）為首的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在1957年舉行了一系列的聽證會，企圖“為了揭露”而揭露共產黨人和以前是共產黨員的人。該委員會和它的首席顧問羅伯特·莫里斯被認為對加拿大駐埃及大使E·赫伯特·諾曼在1957年4月自殺至少負有一部分責任。諾曼是從開羅一家旅館窗戶跳樓自殺的。在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諾曼的名字曾被提到，說他在193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當學生時曾參加馬薩諸塞州普羅文斯頓的共產主義讀書會。由於加拿大政府曾經證明諾曼連進行“顛覆”的嫌疑都沒有，因此加拿大人認為伊斯特蘭委員會犯有“冷言冷語暗中殺人”的罪行。

關於這件事，《紐約時報》（1957年4月6日）評論說，這說明“伊斯特蘭委員會是多么粗暴地蔑視文明外交的首要原則”。社論結論說，美國政府應該向加拿大表示深刻的歉意，“因為參議員伊斯特蘭、他的同事和他們的首席顧問

罗伯特·莫里斯干出了一种不合美国精神的錯誤行为”。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1957年6月对华金斯案的裁决（見上文），联邦地方法官路德·W·楊德耳于1957年7月11日免去了《紐約时报》的西摩尔·佩克的蔑視国会罪。該法官在决定其本法院过去所作的有罪判决为无效时，认为参議院委员会侵犯了佩克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規定的基本自由”。佩克于1956年5月在参議院委员会作证說，他在1949年，即他加入报館的前三年已退出了共产党。但是他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拒絕指名他以前的同事为共产党人。他于1957年3月受审，被判緩期执行的监禁30天和罰款500美元。

反对工会工作者 伊斯特兰委员会在1957年的其他听证会上，企图揭发工会积极分子从前是共产党人。告密者出来指控过去的同伴。許多工人由于伊斯特兰委员会探取口供的結果而失去了工作。

例如，1957年5月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伊斯特兰委员会传訊了美国通訊工人联合会（独立的工会）主席約瑟夫·P·塞利和其他領袖。他們都拒絕回答关于他們过去的和現在的政治关系的問題。由于听证会的結果，紐約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三个雇員立刻被公司解雇。

1957年8月，伊斯特兰委员会从新澤西州伊丽莎白招来证人誣蔑該区的工会积极分子。有一个告发者作证說，有两个被指为共产党人的人在八年以前（即1949年）曾在胜家縫紉机工厂中“酝酿长期罢工”。这两个工人为了免于自陷于罪，都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而拒絕說出他們是否参加过共产党。

有两个工会，汽車工人工会和电气工人工会（国际联合

电气工人工会)，在1957年9月把工会22个低级职员免职，因为他们拒绝回答上述参议院委员会的问题。在被免职的22人中，有9人是汽车工人工会的负责人员或雇员，其余是电气工人工会的负责人员或雇员。

1958年的活动 1958年5月，伊斯特兰委员会在它的年度报告中，要求国会加强共产党管制法，并增加该委员会的权力以对付工会的左翼领导。伊斯特兰委员会指责共产党在南方制造种族纠纷。伊斯特兰本人是种植园主和黑人劳工的剥削者。

1958年9月23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听证会上，该委员会传讯了艾伯特·康恩。他作证说，他从来没有像职业告密者所说的那样“拿俄国人的钱”。他说委员会和他为难，因为他最近写了一本书，指责了伊斯特兰抗拒最高法院关于黑人白人合校的决定而进行的“反宪法”活动。

1958年12月16日，也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该委员会传讯了最近领到护照的几个人，力图同他们为难。（见本章“旅行权”一节。）在12月17日，该委员会传讯了其他证人，企图揭发它所谓的在群众性通讯事业中的共产党活动。大多数被传讯的人，包括查尔斯·E·鲁登堡^①的传记《日子快到了》的作者奥克利·约翰逊，都拒绝谈论他们的政治见解和他们的同伴。

詹金斯案件 1956年4月参议员伊斯特兰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举行听证会——听证会的时间正是订在南方黑人白人合校的新运动的时候。由于他是著名的种族主义者和白人公民委员会的拥护者，他的目的是企图揭发合校

^① 查尔斯·鲁登堡 (Charles E. Ruthenberg)，美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译者

运动是一个“共产党的阴谋”。

所有被伊斯特兰委员会传讯出席用电视播送的听证会的人，都失去了职业，并且不得不离开路易斯安那州。被传讯的人里面有格雷迪和朱迪·詹金斯，他们是本地出生的年轻白种南方人，是工会的积极分子。1957年4月，即在出席伊斯特兰委员会听证会一年之后，当格雷迪·詹金斯患肺结核病住在医院中动手术的时候，他被捕了，并且被扣留在床上两个星期。路易斯安那州根据三项州法律控告格雷迪·詹金斯和他的妻子21条罪状，这三项法律就是：1952年通过的一项登记法，要求共产党人每年进行登记；1954年通过的一项颠覆活动法，禁止参加所谓主张以暴力推翻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或美国政府的组织；1950年修正的该州原有的刑事活动法。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对奈尔逊案件的裁决，1957年10月新奥尔良法院宣布对他们两人的控告是违反宪法的。但是，该州检察官对这一判决向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58年12月15日该州最高法院以五票对二票驳回了检察官的上诉。控诉于是被撤销。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新活动

1958年1月30日众议院批准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要求的305,000美元作为下一年调查非美活动的经费。有两名众议员投票反对，但是反对继续维持这个成立已有12年之久的委员会的人不能获得必需的44票，因而不能使众议院对这个问题举行唱名投票。1959年1月28日，该委员会又获得了327,000美元来进行下一年的政治迫害活动。

1958年1月，芝加哥地区有61个著名教育家、科学家、

宗教領袖和几个当地的工会領袖，向伊利諾州的国會議員提出呼吁书，要求取消这个委員會。他們的呼吁书中引证了最高法院关于华金斯案的裁决(見上文)，并要求国會議員承认“該委員會是以非常跋扈的无限特权而进行活动的，它从不发生有益的立法作用，它的活动危害了美国人的价值，而且它所使用的方法有損于美国議員的尊严和崇高的职位”。

有些基督教牧师、美国基督教教会全国委員會的領袖和三个犹太教教师，写了一封联名信給《紐約时报》(1958年8月12日)，抗議該委員會最近的行动。他們說：“在过去一年中，尽管最高法院在历史性的华金斯案的裁决中譴責了非美活动調查委員會，但是該会在性质、趋向和目的方面却没有显著的改变。”《華盛頓邮报》(1958年12月19日)說，非美活动調查委員會“應該取消而不是改組”。1959年1月9日，众議員詹姆斯·罗斯福(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提出一个法案，要求不把这个委員會作为国会的一个常設委員會，但是没有要求把它取消。

彻薩皮克与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长兼钢铁、煤矿和公用事业等公司董事的富有的賽勒斯·S·伊頓，在1958年5月被該委員會传訊。传票上已经签了字，但是在这件事引起全国报纸社論不利的評論以后，这个命令被撤銷了。5月4日，伊頓在WABC的一次电视談話中說，联邦調查局“仅仅是美国几十个从事調查、探听、告密和監視人民的机构之一”。保守的《紐約先驅論壇报》在評論对伊頓的传訊时說，該委員會主席华尔特“不是跟別人而只是跟自己开玩笑”。

反劳工活动 在遭到公众領袖越来越大的反对的情况

下，这个委员会在重要城市举行了大肆宣扬的听证会，继续进行反劳工活动。尽管最高法院在华金斯案的裁决中谴责了这种活动，这种反劳工的听证会还是在各地继续举行。结果，援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关于他们的政治见解的问题的工人，往往被雇用他们的公司所解雇。

例如，1957年5月，在巴尔的摩地区，该委员会举行了四天的听证会和传讯了22个工人作为证人。结果，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六个工人立刻被停职，因为他们援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委员会所提出的政治问题。同样地，在纽约州布法罗市，这个委员会于1957年10月讯问了42个不同行业的工人。由于该委员会的政治迫害活动，许多人失了业。

1958年2月，在最高法院发表华金斯案的裁决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举行第六次巡回听证会时，在印第安纳州加里城传讯了15个钢铁工人，但两天后不得不终止这个调查。大多数被传讯的钢铁工人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权利，拒绝回答关于他们的政治见解和政治关系的问题。

1958年6月18日到19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了18个纽约市从事戏剧、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工作的人。该委员会依靠一个告密者约翰·劳特纳的帮助，攻击电视导演查尔斯·杜宾，他拒绝回答关于他过去的政治见解的问题。根据国民广播公司的要求，他立刻被开除了。电视舞台经理约瑟夫·佩普，由于听证会的结果被哥伦比亚广播系统解雇。佩普也曾担任过纽约莎士比亚节的导演。《纽约时报》在1958年6月25日的社论中抨击了这些听证会，认为这些听证会“都是为了宣传而进行的调查，这是它（指该

委员会)所擅长的”。经过仲裁后，哥伦比亚广播系统恢复了佩普的职务。

在1958年夏季和秋季，该委员会继续折磨工会积极分子和其他人。7月29日到31日，它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城举行听证会，它传讯的人中，有南方会议教育基金会外勤秘书卡尔·布莱敦。根据最高法院对奈尔逊案的裁决，他在肯塔基州被解除了“扰乱治安”的有罪判决。布莱敦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拒绝回答关于他的政治信仰或政治关系的问题。为此，他在1958年12月2日被控犯有“蔑视国会”罪，联邦地方法院认为他“有罪”，并于1959年2月2日判处徒刑一年。他已经提出上诉。

在亚拉巴马州举行听证会时，约有180个黑人领袖提出抗议，反对该委员会。在抗议中，他们认识到了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任何敢于发表意见支持美国民主理想的自由主义的白种南方人加上“颠覆”罪名的企图之间的关系。

保卫美国自由公民委员会秘书弗兰克·威金逊（洛杉矶），在亚拉巴马州的听证会中拒绝回答关于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关系问题，也被判一年徒刑。他已经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1958年9月3日到5日该委员会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和新泽西州纽瓦克同时举行听证会，这是和这两个城市公立学校开学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同时举行的。在洛杉矶有著名牧师、律师、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教育家100人签署了一份抗议书，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家兼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全国主席哈维·奥康诺被传讯出席纽瓦克听证会，他拒绝到会，并且反对该委员会的活动，认为它

的活动是非法的。

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在1959年2月15日发表一份列有39名律师的黑名单，說他們是共产党的代理人。該委员会說他們“利用从事律师职业”这一点在法庭上为共产党的事业服务。据說列入名单的人是近十年来被該委员会“认定”为共产党人的一百多名律师中的一部分。《斯通周刊》(1959年2月23日)評論道：“在替共产党辯护的人都有被戴上共产党律师帽子的危險的气氛中，不管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还是被假定的共产党人，怎么能找到律师呢？”

麦卡倫法的发展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联邦巡迴上訴法院在1958年1月9日推翻了顛覆活动管制局的第二个命令，該命令規定共产党必須作为一个“受外国控制”的机构，根据麦卡倫法进行登記。該法院裁决，在口头证詞中利用联邦調查局的报告时，政府必須提出該局的报告。

上訴法院法官一致同意的裁决，具体地要求政府提出联邦調查局有关該局证人瑪丽·斯托卡普·馬克沃德太太的秘密报告，以及該局收买她作为告密者所付的款項的記錄。被告律师約翰·艾布特和約瑟夫·弗雷尔曾要求調閱这些报告和有关路易·F·布登茲的证詞的报告，但是顛覆活动管制局拒絕了。在被告律师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时，就把这种拒絕作为一个重要問題提出来。因此，上訴法院把最高法院在詹克斯案中規定的規則应用于行政訴訟，这个規則是为了要使被告律师能反問对方的证人，在审讯前被告一方必須能够看到证人对政府所作的有关报告。

八年来，顛覆活动管制局一直要求共产党根据麦卡伦法进行登記。1953年，它命令共产党登記，但是最高法院在1956年推翻这个决定，因为該局所根据的是三个有問題的告密者的“有污点的证詞”。該局当时仅仅刪去他們的证詞，以后在1956年12月又命令共产党进行登記。

1958年2月7日，司法部突然透露說，联邦調查局曾对它在1945年和布登茲的談話作了秘密录音。司法部說录音是在布登茲不知道的情况下作的，甚至該案的起訴律師也不知道有这个录音。由于这次透露，司法部^①要求华盛顿上訴法院扩大它在1958年1月9日发出的命令，并要求提出布登茲談話录音的有关部分。1958年4月，上訴法院批准共产党关于提出录音的要求。1959年2月9日顛覆活动管制局重申它的决定，即共产党应向司法部登記。

对于这个主要案件的最后判决将影响該局对其他进步組織(包括对独立的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的命令。除非最后作出不利于共产党的判决，否則就不能根据麦卡伦法强迫这些組織进行登記。1959年3月，这个主要案件又被提到联邦上訴法院。

开采冶炼工人工会案 1957年7月，顛覆活动管制局停止了有关开采冶炼工人工会案件的听证会，直到另有通知时再举行。該工会法律总顧問內森·維特，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詹克斯案的裁决，要求联邦調查局提出所有曾提出不利于工会的证詞的证人对該局所作的报告。

政府收买的告密人阿尔特·摩拉勒斯，在为顛覆活动管制局作证时說，从1949年以来，他一直是联邦調查局在工

① 原文如此，根据下文，疑为“共产党”之誤。——譯者

会中的特务。由于他作了有关工会和工会会员的报告，他得到了12,000美元的报酬。工会方面指出，他在蒙大拿州布特城进行活动，而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就以不信任和痛恨被人雇用的平克顿^①特务、劳工间谍和一般工贼而著称的”。（见《开采冶炼工人工会》1957年8月号。）

根据史密斯法提出的控诉

根据1940年外侨登记法（又称史密斯法）所提出的控诉是从1948年开始的，当时有12个共产党人被控犯有所谓“阴谋活动”罪。这个法律的名称是从该法的提案人众议员霍华德·W·史密斯（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得来的。根据我们的《劳工实况》的记载，在过去10年中，有108个人根据史密斯法被判有罪。在1951年6月4日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该法合乎宪法之后，在各州中提出了许多控诉。

但是，由于在1957年年中最高法院对加利福尼亚州案（即耶茨案，见下文）的裁决的结果，政府撤销了大部分案件。旧金山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H·钱伯斯在1958年1月20日撤销西雅图案和夏威夷案时说，耶茨案的判决使根据史密斯法“再提出控诉实际上很困难”。

1958年底，在根据史密斯法而提出的主要“阴谋”案中，只有俄亥俄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两个案件还没有判决。已经撤销的案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州、西雅图、夏威夷、纽约、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康涅狄格州、波多黎各、密执安州和密苏里州的案件。最后被撤销的是密苏里州圣路易的

① 平克顿(Pinkerton)是美国一个私人侦探组织的名称。——译者

五人案，該案是根据1957年6月17日联邦最高法院对耶茨(加利福尼亚州)案的裁决，于1958年10月10日撤销的。圣路易案的一个被告，前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组织者威廉·森特勒在1958年12月去世。

在耶茨案的裁决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认为，赞成抽象的主义不是一种罪行，而且也没有要用强力行动推翻政府的证据。它命令对14人中的9人进行重审，其余5人释放。司法部随后要求撤销整个案件，并且说：“我们不能满足最高法院在推翻本案的决定的意见中所规定的有关证据的要求。”

尽管有许多名流提出抗议，科罗拉多州史密斯法七人案还是于1959年1月28日在丹佛开始进行审讯。开庭时，政府撤销了对刘易斯·约翰逊的控诉，只剩下了六名被告。经过七个星期的审讯，这六个人在1959年3月11日被判有罪，并处以两年半到五年的徒刑。

紐約各案 1958年3月31日联邦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驳回了吉伯特·格林和亨利·温斯顿就被判有蔑视罪而提出的上诉。1958年11月1日，他们申请假释的请求又遭到拒绝。他们二人是在第一次根据史密斯法审讯11名共产党领导人时被判罪的，他们从1951年至1956年一直是政治难民。

格林和温斯顿因不服从法院命令而被控蔑视法院罪，他们受到审讯，被判有罪，并在1956年3月26日各被判在原有的五年徒刑之外加处三年徒刑。法官休果·布莱克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他认为关于蔑视罪案件的简易审讯，使法官成为“立法者、检察官、法官、陪审员和惩戒者”。他说，任何人都“不应有这样独断独行的无上权威”。他把这种权

力称为“专橫的和危险的”。

罗伯特·湯姆逊在第一次审讯11名共产党人之后，也成了政治难民。他因蔑視法院罪被判处四年徒刑，后来以交納25,000美元保释金而出獄，他在保释前已坐了17个月的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文书軍士，因功获得优异服务勳章，1953年在紐約市西街監獄中遭受一名亲法西斯犯人的袭击而受了重伤。

工会領袖伊尔文·鮑达希在第一次史密斯法的案件中服刑五年后，在1955年被驅逐到波兰，他回到美国后又在1957年1月4日被捕。由于非法回国，他被判处二年徒刑和1,000美元罰金。他在1958年9月获释。

党籍条款 北卡罗来納州格林波罗城的联邦地方法院，在1958年2月21日，根据史密斯法党籍条款，第二次判决前共产党人朱尼亚斯·欧文·斯卡尔斯有罪。他被判处六年徒刑。这个有罪判决于1958年10月被巡迴上訴法院再一次肯定。斯卡尔斯在上訴中对史密斯法党籍条款的合宪性提出了反对意見。

他以前在1955年4月以同样的“明知而参加的共产党员”的罪名被判有罪。1957年10月14日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根据党籍条款对他和克劳德·莱特富特所作的有罪判决。

但是最高法院对于党籍条款的合宪問題沒有作出裁决。它对上述案件的裁决是根据詹克斯案作出的，在該案中最高法院規定，被告有权索閱联邦調查局的报告，如果这些报告是在法庭上所作的口头証詞的根据的話。在第二次审讯斯卡尔斯时，被告律师索閱联邦調查局当时已交出的报告。

芝加哥的克勞德·萊特富特在1955年1月被判五年徒刑和5,000美元罰金。司法部也建議重審他的案件。1956年，另有二人，布法羅的約翰·弗朗西斯·諾托同紐約和費拉特爾費亞的艾伯特·布路姆伯格，根據黨籍條款被判有罪。對諾托的有罪判決在1958年12月31日被聯邦上訴法院批准。根據同一條款被判有罪的有芝加哥的伊曼紐爾·布路姆、波士頓的邁克爾·腊索和紐約的馬克斯·魏斯。1957年12月，控告伊曼紐爾·布路姆的案件在印第安納州被撤銷了。

蒙大拿州布特城的約翰·C·赫爾曼經過為時兩周的審訊後，在1958年5月27日被聯邦陪審團判定有罪，並判處五年徒刑。1958年年底，他的上訴還懸而未決。

各州的“顛覆”案件

多爾遜獲釋 根據賓夕法尼亞州危害治安法的規定，《工人日報》記者詹姆斯·H·多爾遜被判處20年徒刑和10,000美元罰金，並繳納訴訟費共計13,000美元。1956年4月，聯邦最高法院在同樣的一件賓夕法尼亞州案件中釋放了共產黨領袖史蒂夫·奈爾遜，因為在“治安法”方面聯邦法律已經替代了州的法律。

1957年6月12日，在奈爾遜案裁決後過了14個月，賓夕法尼亞州高等法院才一致決定撤銷對多爾遜的有罪判決。那時阿勒亨尼縣的區檢察官要求把多爾遜案重新提到上級州法院。但是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在1957年9月駁斥這種企圖。安德魯·翁達在原案中被判有罪，但是因為他患重病，從未被判刑。

斯維济和厄普豪斯 1957年6月17日，联邦最高法院撤銷了保罗·M·斯維济教授蔑視新罕布什尔州一个議會委员会的有罪判决。他过去是一个政府经济学家，并担任过哈佛大学和威廉学院的教授。他在1954年拒絕回答根据这个州的“顛覆活动法”而指派的調查委员会所提出的問題。斯維济說，他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拒絕回答关于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关系的問題。最高法院在决定释放他的裁决中說：“对他提出的問題和州的基本利益沒有任何关系。”

1957年10月14日，最高法院在一个类似的案件中駁回了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加于世界友好协会执行理事威拉特·厄普豪斯的蔑視法院的有罪判决。世界友好协会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互相加强爭取和平友好和共同富裕生活的努力，各种宗教，各种族、民族和各种社会信仰的人，都能参加”。这个組織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威开办了一个夏令营。在新罕布什尔州調查“顛覆”活动时，該州总检察长路易·C·魏曼曾要求厄普豪斯交出夏令营来宾的名单、他同夏令营所邀請的演讲人的通訊以及夏令营职工名单。他拒絕了，他說交出这些名单将使他成为一个“卑鄙的告密者”。但是，他否认他曾經是一个共产党员。

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維持了这个案件中关于蔑視法院的原判，它认为交出名单的命令不违反宪法权利。联邦最高法院在駁回該案时引证了以前对斯維济案的裁决。但是新罕布什尔州法院还是重申它从前的判决，厄普豪斯在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的支持下再次提出上訴。1958年11月，联邦最高法院第二次审理了这个案件。

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攻击

参議員威廉·E·真納(印第安納州共和党人)在第八十五届国会提出了(后来由馬里兰州共和党参議員約翰·M·巴特勒加以修正)限制联邦最高法院的管轄权的法案。这个法案禁止最高法院重审任何有关蔑視国会各委员会、联邦政府雇員安全計劃、各州和地方的取締“顛覆活动”的法律以及各州律师条例的案件。经过巴特勒的修正，这个反最高法院的法案在1958年5月被参議院司法委员会通过。

这种措施是30年来国会第一次削弱最高法院权力的重大努力。这是反动的参議員对最高法院最近对华金斯案、奈尔逊案和其他在公民权利方面有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的裁决(尤其是反对种族隔离的裁决)的回答。支持真納的违反宪法的举动的，有諸如詹姆斯·伊斯特兰(見上文)、南方民主党人斯特罗姆·瑟蒙德(南卡罗来納州民主党人)和理查德·B·魯塞尔(佐治亚州民主党人)等南方参議員。

真納在提出他的法案时，指責最高法院关于公民权利的裁决是“不誠实的”、“歪曲的”、“亲共的”和“最大的卖国行为”。伊斯特兰把最高法院称为“对美国国内安全和安宁的最大威胁”。

1958年8月20日参議院以49票对41票的微弱多数票否决了巴特勒—真納法案。1958年8月21日，参議院以41票对40票更少的多数否决了另一个由众議員霍华德·W·史密斯(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提出的反对最高法院的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推翻最高法院1956年4月2日对奈尔逊

案的裁决。这个在众议院已通过的反对最高法院的法案，旨在维护各州在处理危害治安和“颠覆活动”方面的权力。

律师协会的情况 1959年2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律师协会代表大会，经过一些修改后通过了它的关于共产党战术、战略和目的委员会所制订的纲领。这个委员会中，至少有半数成员是在公民自由的案件中曾受过最高法院的裁决的打击，或者是和美国军团或联邦调查局的政治迫害活动曾发生过关系。美国律师协会最后的报告赞成让各州制订它们自己取缔“危害治安”的法律，并主张采取其他措施来对抗最高法院最近的几项裁决。但是它没有企图缩小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缩小宪法权利的范围；《民族》周刊(1959年3月7日)说：其结果是一种“消灭公断人”的叫嚣，这种叫嚣来自一个律师协会是“不适合的，不调和的，而且也是和律师的职务不相称的”。

黑人白人合校问题

虽然取消公立学校黑人白人分校的工作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和弗吉尼亚州遭到挫折，但是，在过去两年中，按照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5月9日的规定取消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的工作，在南方有些州中还在继续进行。南方教育报道社在1958年10月15日发表的一份《南方和南北之间各州的隔离与取消隔离的情况》的调查报告，列举数字，指出公立学校体系中黑人白人合校的情况。

在整个地区，大约有402,400个黑人青年已在黑人白人合校的学校中读书。约有790个学校区已经取消隔离，但仍有2,100个学校区仍然实行种族隔离。在南方的13个州和

哥伦比亚特区，以稅款来維持的202个学院和大学中，有114个从前是清一色白人的学校，現在要收黑人学生了。这些院校中的大約100个，实际已经有黑人入学。

南方教育报道社发现在南方和处于南北之間的1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有41个有組織的团体主张种族隔离，38个团体主张黑人白人合校。它报道說：“自从1954年5月17日以來，有11个州的議会制定了200項目的在于防止或控制取消种族隔离的措施，其中包括12項干涉、废除和反对的決議(阿肯色通过了兩項決議)”。

在合校方面进展最大的州以及这些州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区的数目如下：特拉华州，17；肯塔基州，117；馬里兰州，21；密苏里州，21；俄克拉何馬州，238；得克薩斯州，124；西弗吉尼亚州，47。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区数目上进展最差的地区是：阿肯色州，8；哥伦比亚特区，1；北卡罗来納州，3；田納西州，3。但是，有7个州(亚拉巴馬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士失必州、南卡罗来納州、弗吉尼亚州)的学校区还没有一个实行了黑人白人合校。

弗吉尼亚州后来服从了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反对該州大規模抗拒法律的裁決，而且，如下文所指出的，該州有些学校实际上开始实行了象征性的黑人白人合校。1959年2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报道說，在南方10个州的学校区中有25.6%已经实行了黑人白人合校。

小石城的斗争 1957年9月2日，阿肯色州州长奧維尔·E·弗布斯派遣国民警卫队到小石城，阻止黑人学生进入中央中学。1957年9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統命令联邦軍隊开往小石城，对这种妨碍联邦法院規定接納黑人学生入学的命令的行为加以制止。这是美国內战后建設时期

以来，联邦政府第一次为了南方黑人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而派遣联邦军队。

在美国陆军保护下，9个黑人学生（6个女生和3个男生）进了学校。但是，军队并不能保护这些黑人学生，使之不致遭到白人公民委员会成年人所恣意的白人男女学生对他们的一年到头的侮辱和迫害。在整个1958年中，弗布斯州长一直拒绝执行所有联邦法院关于公立学校实行黑人白人合校的命令。他停办了小石城的四所公立中学，扬言要把它们变为私立的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但是，1958年11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责令小石城教育局采取积极措施贯彻黑人白人合校。到1958年年底，他们仍未采取任何措施。

停办学校 1958年12月1日，美国卫生、教育及福利部长阿瑟·S·弗来明报告说，由于“避免黑人白人合校”而停办公立学校，以致损失了一百多万个工作日。他列举停办的学校如下：在阿肯色州小石城有4所，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有6所，在弗吉尼亚州夏洛特城有2所，在弗吉尼亚州华伦县有1所。他说：“在一个首先以所有的人都能受到公共教育而自豪的国家里，这是一种新的悲惨情况。”停办学校的唯一原因是阻止白人男女学生和“为数不多，年龄、智慧、能力、举止大致相同的黑人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

弗来明报告说，大约有16,400个青年不能到他们通常去的学校去上学。有些学生转入别的公立学校，另有些学生转入私立学校，但是，在每个地方，显然都有许多学生“失学”。

在弗吉尼亚州，有一个由三位法官组成的联邦地方法院在1959年1月19日一致裁决：为了规避黑人白人合校而停办公立学校，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在同一天，弗吉尼亚州

最高上訴法院以五票对二票裁決，該州禁止黑人白人合校的法律是違反州憲法的。在上述裁決之後，1959年2月2日，諾福克縣和阿林頓縣的七個從前只接納白人學生的學校收了21個黑人男女學生，這在弗吉尼亞州的历史上還是第一次。當時沒有發生混亂。

在北方 不僅在南方，而且在北方一些城市，公立學校中也對黑人兒童實行隔離。1958年在紐約市就有許多黑人父母要他們的子女退出清一色黑人的學校，原因是黑人學校的條件很差。有兩個控訴歧視的案件已經告到法院。

1958年12月15日，家庭關係一兒童法院部法官賈斯廷·瓦依斯·波利爾發表意見說：“我們必須作出結論，紐約市初級中學事實上存在着種族隔離現象。”她說：“在向市立學校配備教員方面，在黑人學生或波多黎各學生眾多的學校里，大多數教員不是真正合格的教員。”

有一所初級中學有1,500個黑人學生和25個波多黎各學生，但是沒有一個白人學生。在另一所初級中學，有1,629個黑人學生和25個波多黎各學生，沒有一個白人學生。

旅 行 權

1958年6月16日在一個以五票对四票通過的具有深遠意義的裁決中，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國務院根據政治見解拒絕對共產黨員或其他的人發給護照的規定。法院裁決：國會沒有授予國務卿“因申請者的信仰和社團關係”而拒絕發給護照的權力。法院指出，只有下述兩種情形，國務卿根據美國現行法律有權拒絕發給護照，那就是：申請者不是美

国公民或者申請者“从事破坏美国法律的行为”。

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后，立即就对提出上訴已久而沒有解决的申請者发給了护照。在最高法院作出这个有利的裁决的时候，有两个上訴案件提交到法院。艺术家罗克韦耳·肯特和精神病学家华尔特·布里尔控告国务院，說国务院无权要求护照申請者回答政治問題。肯特的案件是在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的支持下提出的，这个案件是确定公民有旅行的权利而不問他的政治見解的一次考验。

作家和維護公民自由的領袖科里斯·拉蒙特最初在1951年被国务院拒絕发給护照，理由是他出国旅行将“违反美国的最大利益”。1957年6月18日他对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訴訟，要求确认旅行的权利。关于他拒絕回答有关他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信仰問題，拉蒙特写道：“我认为，目前使用的申請护照的表格实际上是要要求每年申請护照的六十多万美国人作非法的忠誠宣誓。”

195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护照被吊銷，八年以来，他一再申請重新发給护照。1958年1月他又申請至少发給有限期的护照，以便能应邀在英国莎士比亚紀念剧院演唱。但是，由于他拒絕回答是不是共产党员的問題，甚至这一申請也被拒絕。1958年6月26日，他終于領到护照，立即出国踐約演唱。

新聞記者和大学生前往中国的问题 1956—57年冬季有几个新聞記者对国务院禁止美国人訪問中华人民共和国报道中国发展情况的規定公然不予理睬。《展望》杂志的埃德蒙·斯蒂文斯和菲利普·哈林頓及巴尔的摩《非洲美国人报》的威廉·沃思以記者的身份訪問了中国大陆。沃思回美国以后，国务院就拒絕延长他的护照期限。在美国公民自

由同盟幫助下，他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訴。

1957年夏天，國際青年聯歡節在莫斯科舉行，參加聯歡節的42個美國學生，決定接受中國的邀請，訪問中國大陸。當這些學生由中國回到美國時，國務院宣布它已經取消了其中24個學生的護照。對於在秋季返回美國的18名學生，政府沒收了他們的護照。有兩個人拒絕交出護照，並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鬥爭。

小說家和評論家沃爾多·弗蘭克1958年11月12日對國務卿杜勒斯提出控訴，要求使他的護照有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的效力。他曾被約請前往北京大學作關於華爾特·惠特曼的講演。關於他的護照問題的決定，取決於最高法院對上述沃思案件的裁決。

但是，要求旅行權利的鬥爭距離勝利還很遠。在1958年全年，反動勢力仍然繼續拒絕發給某些公民護照，從而禁止他們到外國旅行。1958年12月16日，參議員伊斯特蘭的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召喚四個最近領到護照的人出席聽證會，這四個人是：美國共產黨負責黑人及南方事務的書記詹姆斯·E·杰克遜、《工人》周刊總經理威廉·派特遜、國際出版社總經理亞歷山大·特羅騰堡和公民自由與勞工問題律師約翰·阿伯特。杰克遜要求把伊斯特蘭開除出美國參議院，因為他不是密士失必州多數人選舉出來的。該州約有一半公民是黑人，而有選舉權的黑人不到1%。杰克遜和派特遜都譴責該委員會同已領到護照的人找麻煩。紐約市律師協會（它主要代表保守的華爾街律師事務所）的八個律師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在研究護照問題以後，於1958年11月23日提出建議說，“不應當僅僅由於參加任何一個組織……相信在美國不流行的意見或批評美國，而限制旅行或不發給

护照。”尽管有上述比較自由主义的見解，人們預料艾森豪威尔政府将继续执行它的反动措施，反对基本的旅行权利。虽然，像上文提到的，有些人領到了护照，但是其他持有进步政治見解的美国公民仍然被剝夺了出国旅行的权利。

解雇教师

1957年5月21日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唐納德·S·泰勒支持州教育厅长詹姆斯·艾伦的决定，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师不能因为拒絕告发在过去或现在是共产党员的人而被解职。艾伦曾宣称，如果因为教师拒絕成为告密人而予以解职，“害处会比好处大得多，而且这种調查是学校体系所不容許的”。当时的問題是紐約市五个教师的案件，其中有一个是校长。这个校长在1955年9月因为拒絕告密而被停职。根据得到州最高法院支持的艾伦的决定，他們應該复职。但是，直到1958年年底，他們仍然沒有复职。

紐約市教育局在1958年关于范伯格法实行情况的报告中說，从1951年到1958年10月，由于它对所謂“顛覆活动”进行的調查，有285个教員从学校中被开除、辞职或退休。根据教师联合会估計，在上述285个教师中，有75个是在初級或高級中学教科学或数学的，他們平均有20年的教齡。他們担任教員的能力和授課的情况是毫无問題的。目前，在紐約与美国其他地方这些方面的合格師資感到严重缺乏的时候，他們本来是还可以教授这些課程的，特别是从1957年10月俄国人把第一顆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之后，師資缺乏更加显著。

在被排出学校体系的教师中，大約有175人是小学教

师，而其中又大約有75人是所謂“困难”学校的教师（由于最近少年犯罪增加，这种学校尤其重要），或者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居住地区的学校的教师。

朱利叶斯·赫茨瓦蒂博士是紐約市学校体系中在根据紐約市規章第903款被解雇之后又重新复职的唯一教师。他是全国聞名的布朗克斯科学中学的数学部主任。他虽然在1956年11月复职，但却被調到了另一个学校。由于法律技术问题，其他根据第903款被解职的案件法院尚未审理，教育局和高等教育局仍然拒絕恢复他們的职务。

在高等学校中 1958年3月紐約市高等教育局报道說，自从1953年以来，在五个市立学院的6,500名教职員中，有122人受到教育局的一个特別委员会的調查。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即共計39人被解雇或辞职、退休或以其他方式結束了他們在学院中的职务。在这些被“調查”的人中約有一半即63人已经“搞清楚”或者以其他方法結束了他們的案件。另有18人受到調查，但是他們在被訊問前已经离开了他們的教學崗位。

1957年12月16日，紐約市学院英文助理教授华伦·奥斯汀被高等教育局辞退。他在1957年5月21日被停职停薪，因为他被控虛伪地否认他曾經是一个共产党员。1957年9月25日在一个特別审讯委员会所举行的听证会上，他再度宣誓否认他曾經是一个共产党员。奥斯汀教授曾在紐約市学院任教26年。他向州教育厅长提出上訴。

1957年4月10日，新澤西州新不伦瑞克的腊特格大学董事会拒絕恢复前法律教授亚伯拉罕·格拉塞博士的职务。他在1953年因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关于他的政治信仰和社团关系的問題而

被迫辞职。他要求复职和补发薪金20,000美元。但是，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在其他地区 在其他中心地区，有许多教师因为拒绝回答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问题而被解职。例如，在西部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圣拉法耳的狄克西学校区董事会辞退了七年級教員爱德华·汗切特。1957年6月他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说，1951年以后他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是，他拒绝回答别的关于他的政治活动及社团关系的问题。不到三个月，他就被草率地辞退了。

1958年3月，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有两位教师被停职，因为他们在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询问时，引用了宪法权利。“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馬薩諸塞州州长福斯特·弗科洛说，学校教师“教学并不是宪法规定的权利”。新澤西州紐瓦克的学校委员会决定拒绝在1954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询问时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两名公立学校教师的复职要求。

1958年6月30日，联邦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驳回了在費拉特尔费亚一个学校任职22年的赫尔曼·貝兰的复职要求。他也是由于1954年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询问时引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而被辞退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曾在电视中广播了这次询问的情况。

对黑名单的抗議 1958年3月20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院长路易斯·哈克宣称：“大学的行政领导人员没有勇气恢复单纯由于拒绝回答国会委员会提出的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而被解除教学职位的人的学术生活……。除非有具体证据，证明他滥用学术工作，否则一个教师的职务和职业不

应因信仰或社团关系而受到影响，不管这种信仰和关系是政治性的还是宗教性的。”

1958年3月29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报道說，从1951年到1957年的七年中，有九个学院和大学违反学术自由，它們辞退了13名教师。这些违反学术自由的学院和大学是：紐約大学、佛蒙特大学、密执安大学、李德学院、狄金逊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亚拉巴馬工艺学院、得克薩斯技术学院和利文斯通学院。在13名被解雇的教师中有8名曾拒絕回答有关他們的政治見解和社团关系問題。

外国出生者的权利

在过去两年中，由于战后歇斯底里的消除和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公民权利的重要裁决，公众气氛不断在改善。这种改善有助于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对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的歇斯底里。虽然对外国出生者的权利的长时期的进攻被击败了，虽然全国輿論不断要求根本改变华尔特—麦卡伦法，但是，修改或废除1952年制訂的这一法律的斗争仍然沒有进展。

外国出生者发现他們仍然处在这样一种境况：他們的权利和地位遭到司法部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攻击。司法部继续努力执行华尔特—麦卡伦法中迫害人民的警察国家的条款。只要这一法律在法典中继续存在，那么在一旦发生新的经济或政治危机时就实行新的进攻的威胁，也就继续存在。

驱逐出境 1958年12月，联邦最高法院命令撤销对明尼阿波利斯的查尔斯·罗沃德提出的驅逐出境案件。罗沃

德,年72岁,1918年来到美国。从1936年起就以他是共产党员为理由,开始对他提出驅逐出境的訴訟。1957年司法部将他逮捕,以便立即把他驅逐到德国,于是他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1958年12月最高法院裁决,认为他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员,因为他和共产党并没有“有实际意义的关系”。

最高法院命令撤銷根据政治原因而驅逐罗沃德出境的案件,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采取这种行动。这个裁决駁斥了司法部的主张——以前,在1952年和1954年最高法院曾经支持过这种主张——即只要加入共产党,不管其性质如何,就构成了驅逐出境的充分理由。由于罗沃德案件的裁决,大約有50件政治性驅逐出境案件因而被撤銷。其中有俄亥俄州奈尔斯的利奥·卡娄案件。卡娄是一个钢铁工人,是九个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的父亲,从1936年起就要把他驅逐到希腊去。另一个案件是旧金山的朱安·迪亚斯,他是八个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的父亲,从1934年起就要把他驅逐到西班牙去。

但是,在1958年年底,仍然有大約250件政治性驅逐出境案件还没有判决。其中大多数只有国会对法律作出根本改变才能获得胜利。

威廉·赫基拉的案件虽然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先例,但是,在过去两年中它是驅逐出境案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案件。1906年赫基拉被人带到美国时,他出世才三个月。1958年4月18日星期五,当他离开他工作所在的办公室时被逮捕并且被綁架到国外。他被美国移民官員用个假名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溫哥華監獄扣押了一天,然后被用飞机送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接着又被从那里送到芬兰。公众

对这次綁架事件的反应——这次反应本身也反映了最近几年来公众情緒的重大变化——迫使移民和归化局局长下令把赫基拉送回美国。在他被綁架和驅逐出境一周以后，他又回到旧金山和他的美国籍妻子团聚在一起。

组织关系 1958年2月移民和归化局对威廉·奥古斯特·拉蒂能提出驅逐出境訴訟。拉蒂能年57岁，自1914年起就居住在美国。他的罪名是他曾参加芬兰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在1942年就不复存在了——因而就和共产党有关系。对这一案件的审讯是从3月开始的，直到1958年年底仍然在进行中。

墨西哥裔美国人 司法部对于在墨西哥出生的非公民和入了美国籍的公民继续采取非难、威吓和虐待政策。1958年12月，美国保护外国出生者委员会宣布，它准备在1959年4月向联合国提出关于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待遇問題的呼吁书。

监督假释 华尔特—麦卡伦法通过后，司法部企图对被驅逐出境而又没有一个国家願意把他們当作被驅逐者予以接納的非公民，加以种种限制。司法部企图强迫被驅逐出境的人宣誓，提供关于他們的社团关系和活动的情况。芝加哥的乔治·威特科維奇由于拒絕回答問題而于1956年被控訴。圣路易的安托尼娅·森特納夫人在1955年向法院提出控訴，认为对她的监督假释令是不合法的。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威特科維奇和森特納两案中认为，司法部对于被驅逐出境而无法执行的人的管制，是驅逐程序的一部分。这种管制仅限于掌握被驅逐出境的人的行踪的資料，除此之外的任何管制，都是越出法律規定的。

虚构 司法部企图利用华尔特—麦卡伦法关于自动出

境的規定——要求命令被驅逐出境的非公民申請旅行證件，並且用各種辦法便利他們自己出境——來為難被驅逐出境的人。威斯康星州蘇必利的納特·赫基能在1954年被控違反這項規定，並且被判五年徒刑。1958年1月，最高法院推翻了对赫基能的有罪判決，理由是證據不充分。

取消入籍資格 司法部利用華爾特—麥卡倫法關於取消入籍資格的規定，在1952年提出了約60件政治性的取消入籍資格案件。司法部在這些案件中所持的理由是，當這些入籍公民成為美國公民時沒有聲明他們是共產黨員，因而他們是用了欺騙手段和虛偽言詞而取得公民身份的。1958年5月26日，聯邦最高法院在底特律的斯坦萊·諾瓦克和麗貝卡·梅生貝格兩案中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決，並且恢復了他們的公民身份，理由是政府必須證明這些入籍公民本人知道共產黨具有“非法”目的，然後才能取消他們的入籍資格。由於對諾瓦克和梅生貝格的裁決，司法部幾乎全部撤銷了60件已提出的取消入籍資格案件。

美國保護外國出生者委員會 1958年是美國保護外國出生者委員會開展其工作的25周年。這一年的年底，該委員會宣布，它將於1959年4月出版路易斯·佩提邦·史密斯教授所寫的《自由的火炬》一書。這本書敘述該委員會工作的歷史和從1933年到1958年外國出生者在美國所受到的待遇。

鮑威爾—舒曼“煽動”案

在朝鮮戰爭前和朝鮮戰爭期間任《密勒氏評論報》發行人和編輯的約翰·鮑威爾、西耳維亞·鮑威爾和朱利安·舒

曼曾发表文章，說美国在朝鮮战争中对中國进行了空中細菌战。1956年4月，当他們回到美国三年之后，他們被控告违反1917年間諜法——这是战时处理煽动罪的法律第一次适用于未经宣战的战争。1959年1月2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开始审訊他們的案件。

在审訊时，約翰·鮑威尔辯护說，他所发表的文章是誠实的，是根据他认为来源可靠的資料写成的。辯护律师威林最后得到允許去訪問許多在中国的证人。这是在联邦法官路易斯·古德曼威胁之后才允許的，他威胁說，除非让被告能提出必要的证据，他就要撤銷这个案件。1958年年初威林到了中国和朝鮮北部来搜集证据。他报告說，如果允許他把证人从中国帶到美国的話，有1,000个证人願意为被告作证。这时政府放弃了对被告的某些控訴，而不願意有关被断定在朝鮮准备进行細菌战的证据給揭露出来。

1959年1月30日，由于报纸和无线电广播評論了古德曼法官关于“叛国”問題的說法，这位法官于是宣布这是一种誤审。但是，司法部却立即对三个被告提出了所謂“叛国”的控告，而叛国罪是一种更加严重的罪状，严重到能处以死刑。

索貝尔上訴案

摩尔頓·索貝尔因为犯了所謂間諜罪而正在服30年的徒刑。1958年2月他被从加利福尼亚州阿耳卡特拉茲的联邦監獄轉送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反省院继续服刑。在亚特兰大，他与他的妻子、儿女和母亲相隔要近得多，而且他至少得到了一些权利，如利用監獄的圖書館，而在阿耳卡特拉

茲时他是沒有这种权利的。

这是政府第一次应国内外成千上万人要求公平处理这个案件的請求而作出的让步。1958年1月6日，联邦最高法院第九次拒絕关于重新审查对索貝尔的有罪判決的請求。1957年11月7日，最高法院沒有說明理由就駁回了被告的申請，这个申請所根据的理由是索貝尔是在墨西哥被非法綁架的，并且对他使用了伪造证件。

最高法院法官休果·L·布莱克在1953年曾就罗森堡—索貝尔案件声明說，最高法院从来沒有重新审查这个案件，也沒有确认这个审判的公正性。这个声明現在还有效。在法院拒絕重新审理他們的案件之后，朱利叶斯和爱塞尔·罗森堡于1953年被处死刑。

1959年2月21日有七个神学家和法律教授以私人名义請求減輕索貝尔的判刑。以雷恩霍尔德·尼布尔为首的这七个人声称，就一个引起人民激烈情緒的案件而言，減刑是“既有惩戒意义又符合人道精神的执法措施”的实际表现。

反黑人和反犹太人的轰炸事件

从1955年1月1日到1958年11月10日，在南方四个州发生了72起轰炸和企图轰炸黑人住宅、教堂、学校和犹太人礼拜堂或犹太人中心的事件。美国犹太人大会报道說，这些轰炸事件中有25起是在亚拉巴馬州伯明翰发生的，17起是在田納西州发生的。

有34起即将近一半的轰炸事件是对黑人住宅的攻击，6起是对黑人教堂，6起是对黑人或黑人白人合校的学校，7起是对犹太人礼拜堂和犹太人中心的攻击。其余9起是

对商业机构或“其他地方”的攻击。

被轰炸的学校名称和日期如下：1957年9月10日田纳西州东纳希维尔公立学校，这所学校收了一个黑人学生；1958年1月19日察坦努加的霍华德黑人学校；1958年3月16日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一所和犹太教会有关的学校；1958年3月20日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一所黑人学校；1958年4月28日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所黑人初级中学；1958年10月5日田纳西州克林顿的一所新近成立的黑人白人合校的中学。这些都是实际已经发生的轰炸事件，不包括企图进行轰炸、阴谋和恫吓活动或同取消种族隔离学校有关的事件。

对于这些轰炸事件，很少采取行动来追究和控诉应负责的人。1958年10月12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犹太人礼拜堂被炸以后，乔治·布莱特被控犯有轰炸行为，并且在1958年12月受到审讯，第一次审讯被宣布为误审，1959年1月他再一次受审并判无罪。另有四个人和布莱特一起被控诉，但是没有提出审讯。

由于争取和平的行动而被逮捕的人

在过去两年中，争取和平和反对试验核弹的活动增加了，结果是，有些进行游行示威、反对战争准备的人遭到逮捕和监禁。下面是这种迫害的事例：

自从1955年以来，若干参加《天主教工人报》工作的人公开拒绝参加“空袭”演习。他们通知当局说，他们不愿参加这种所谓“防卫”措施。例如，在1957年纽约市有12个人因为在演习时不按照命令进入掩蔽所而被判拘留30天。其

中有四人，陶乐賽·戴伊、阿蒙·亨納西、克伦·杜根和迪恩·毛勒是《天主教工人报》的人，而其他几个是同他們一道的人，他們都服了“罪”。

1958年在紐約市哥伦布大街的原子能委员会办公处前，有一群人举行示威，反对演习，九人被捕，他們服了“罪”并被給予緩刑。

1958年12月26日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圣巴尔納巴斯教堂的和平主义牧师莫里斯·麦克腊金由于拒絕交納供战争用的所得稅而被監禁。他被联邦法官判处六个月的監禁和250美元的罰金。

爱勒·L·雷諾茲在《民族》周刊(1958年11月15日)上叙述了“凤凰号”游艇的违禁航行。它于1958年年中駛入太平洋恩尼維托克附近的核武器試驗区。有四个人（包括前海軍軍官艾伯特·比吉洛和“金律号”游艇其他船員）不久前在火奴魯魯被捕，那时他們正計劃駛往禁区，表示反对战争和核武器試驗。原子能委员会曾經禁止一切未經許可的美国人进入該区。

乘坐“凤凰号”游艇的雷諾茲、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和一个来自广島的日本人，决定前往代替“金律号”游艇駛入禁区，反对核武器試驗。6月30日，武装的海岸警备队人員登上这艘游艇，逮捕了雷諾茲。檀香山联邦地方法院对他草率地进行了审讯，而且沒有让他充分进行辯护。1958年9月25日他被判处6个月的監禁，另加18个月的監視。这件案子已上訴到上級法院。

在契英尼城导弹基地 1958年8月在怀俄明州契英尼城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基地上，有几个和平主义者举行示威，反对这种导弹基地。8月19日，宾夕法尼亚州法尔兴

頓的肯尼思·卡耳金斯和西奧多·奧耳遜牧師坐在基地門口拒絕離開。一個建築工頭指揮一輛載運12噸石頭的卡車直衝卡耳金斯，有一名空軍憲兵站在旁邊不加制止。卡耳金斯受了重傷，在當地醫院住了十天。卡耳金斯、他的妻子埃蓮娜、奧耳遜和阿瑟·斯普林格被逮捕並被處罰金。奧耳遜和卡耳金斯夫人每人服100天的監禁以代替各自的100美元的罰金。斯普林格在9月9日被審訊並被處75美元的罰金和訟費。他坐了監以代替罰金。

另有兩個人，即芝加哥的埃里加·恩格和賓夕法尼亞州蘭斯當納的約翰·懷特，於8月27日在該基地進行糾察時被捕，並被處罰金，他們坐了監以代替罰金。

第六章 政治事务

美国第八十五届国会

从1957年1月3日到8月30日的第八十五届国会第一期会议，将主要由于它通过了82年来的第一个公民权利法而为人所记忆。这个法律所规定的办法比原来提出的软弱得多。它的最后结果，和其他立法建议一样，不能令人满意。这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摇摆不定。

在社会和劳工立法方面，国会通过了法案，规定提高联邦政府编制以内的工人和邮政工人的工资，但是这一法案为总统所否决。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住宅建筑的法案，规定拨出为数不多的城市改建补助费和降低对政府担保的贷款的现金付款条件。

由于艾森豪威尔没有对包括他所提出的学校建设计划的法案给予充分支持，众议院以微弱多数否决了授权在五年期间补助各州学校建设款项15亿美元的法案。

从1958年1月7日到8月24日的第八十五届国会第二期会议，主要通过了一些“折衷”性质的立法。最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是接纳阿拉斯加作为联邦的第四十九州。国会并以微弱多数击败了一切限制联邦最高法院权力的动议，包括主张限制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的真纳—巴特勒法案，和另外一项限制最高法院解释国会法律的权力的

法案。

劳联—产联主席米尼代表劳联—产联贊揚了这届国会两期會議所取得的成績。它的成績包括通过了規定公布卫生和福利基金的全部賬目的法案，制訂了关于蕭条地区的立法，改进了社会保障法，以及通过了政府雇員“急需”的增薪。劳联—产联认为这届国会的主要缺点是在“应付经济衰退的影响方面”，举例來說，国会沒有能够削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的賦稅。（見劳联—产联立法报告，《劳工对第八十五届国会的看法》，1958年10月。）

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这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組織——选择了12次唱名表決的情况，來說明民主党参議員支持自由主义立場的次数平均是64%；而共和党参議員支持这种立場的次数平均只有29%。

无党派劳工联盟是联合矿工工会的政治工作部門。这个联盟說，第八十五届国会整个說来，“不是一个进步的国会。它所通过的立法大部分是对普通公民的福利不利的……大多数議員为美国的大企业所控制，并且决心支持对大企业有利的立法”。

共和党議員和南方反动民主党議員联合起来阻止了比較进步的立法的通过。在許多問題上，贊成票和反对票的数目很接近，如果南方民主党議員不同共和党議員站在一边的話，就会通过更多的进步法律。例如，正如1958年9月22日的《新共和》周刊在討論第二期會議时所指出的，“在参議院中只要再多1票就会增加政府对老人和盲人的公共救济经费，和降低貸給地方进行公共工程的款項的利息。在众議院，只要再多8票就可以为地方提供20亿美元的貸款以供公共工程之用。……再多30票就可以通过粮食券計劃，把

10亿美元的剩余商品分配给贫困的家庭。只要在众议院多30票，在参议院多6票，就可以通过一项合理的失业津贴制度，而不是已经通过的那个象征性的保险计划。”

第二期会议对于和劳工有重大关系的各项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依英语字母顺序列举如下。（关于有些问题的情况在本书其他各节的有关题目下有更详细的说明。）

萧条地区的重新发展问题 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1958年萧条地区重振法。这个法律的目的，是要“制订一项有效的计划来缓和某些经济萧条地区严重的和持久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并拨款28,000万美元以供这一目的之用。在通过这项法案的时候，约有46个美国城市列入长期失业一类中。这些城市是在诸如康涅狄格、伊利诺、密执安、明尼苏达、纽约、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等工业发达各州中。这个法案被总统所否决，总统说这种发展应由地方政府提供经费，并且说该法案适用范围超出了长期失业的地区。

教育 尽管再次提出由联邦补助各级教育的要求，但是所提出的法案主要限于对高等教育以及科学和数学的补助。1958年国防教育法主要是为了应付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功所引起的竞争而通过的。该法并没有关于奖学金的规定，只规定向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低息贷款。

尽管在校舍建筑方面非常需要联邦的补助，但是争取补助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正如劳联—产联所说的，“总统没有提出有关建筑校舍的立法，这证明他对这个问题是不关心的。”

对外政策 除了少数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国会议员在参众两院提出一些批评外，国会对于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

夏季派遣海軍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的行动，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沒有展开辯論。国会仍然执行把对外政策全盘交給杜勒斯处理的“不分党派”的政策，并准备对冷战投入比国务院所要求的更多的錢。

但是，33亿美元的“援外”（“共同安全”）数字却比白宫原来所要求的少6亿美元。虽然两党中主张实行高关税的“保护主义者”力图击败互惠貿易計劃，但是这个計劃仍然延长了四年。

国会一方面对于供人民福利之用的款項很吝嗇，另一方面，单是这届国会的第二期會議就为国防部拨出396亿美元的经费，比政府所要求的还多81,600万美元。

住宅問題 国会扼杀了一項拨款24亿美元清除貧民窟和改建城市的法案，尽管好几十个城市的市长以及劳工和进步力量都极力要求至少要继续实行前几年已经开始实行的計劃。虽然这个法案很容易地在参議院获得通过，但是众議院規程委员会主席霍华德·W·史密斯（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拒絕把这个法案提交众議院討論。关于停止实行众議院規程的动議的表决，是251票贊成，134票反对，仅以6票之差不足三分之二的必要多数，因而未能推翻規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这是在住宅問題上得到贊成票最多的一次，但由于众議院規程的存在，沒有能够通过任何关于住宅問題的法案。全国住宅會議《通信》（1958年8月）評論說：“一个剛愎自用的暴君居然能篡夺总统的否决权，民主制度的这种墮落情况，已达到臭气冲天的地步。”

劳資关系改革問題 为了消除麦克累伦委员会所揭露的恶习，一項由两党議員提出的法案，即肯尼迪—艾夫斯反敲詐法案，在劳联—产联領袖的支持下提到了国会。参議

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但众议院拒绝采取行动。右翼共和党人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是反工会的而不是反腐化的。联合矿工工会和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及其他独立工会反对这项立法，理由是这项立法会进一步限制工会的合法活动。

最低工资问题 国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把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的联邦最低工资保护措施扩大适用于约1,000万工人，尤其是零售业、服务业、农业及建筑业的工人。国会也没有提高适用这项保护措施的工人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仍旧是每小时1美元，而标准工作周仍保持每周40小时。

公营动力、公共工程和原子能问题 关于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爱达荷—俄勒冈边境上的斯内克河的黑耳斯峡谷由联邦政府修筑一座高水坝的法案，在委员会中没有通过，其他几个动力发展计划也没有通过，其中包括准许田纳西工程管理局发售债券筹集资金以便扩充的计划。

国会没有制定任何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一项对各城市提供偿还期为50年的公共工程贷款的地方设施法案，得到了民主党多数的支持。但是在表决增加对城市贷款的款项时，众议院否决了这项措施。

政府同私人企业在原子能方面的争夺仍在继续。原子能委员会同私营公司站在一边，阻碍在原子能方面公共所有制的发展。但是国会在第二期会议批准建设一座天然钍反应堆，这座反应堆在以后可以用来生产动力。因此，劳联—产联立法报告说：“第八十五届国会能够迫使原子能委员会接受一项原子动力计划，这在发展和平时期的原子动力方面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小企业问题 像某方面所指出的，这届国会所通过的

立法，虽然“看来不可能制止工业集中的趋势，但是却为改善许多小企业的机会使它们在经济上能够存在下去提供了一些希望”。国会通过小企业投资法，提供了一些款项，并设立管理机构，以便通过私人投资公司给小企业提供贷款。对小企业的减税，估计每年约达26,000万美元。

关于最高法院的法案 联邦最高法院几年来在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问题上的裁决，受到南方民主党人和右翼共和党人的激烈攻击。但是，企图剥夺最高法院的许多权力的真纳—巴特勒法案终于被搁置了。另外一项废除联邦对各州权力的先占权原则的法案，以一票的多数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赋税问题 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及劳工和许多雇主的组织赞成减税，认为这是应付经济衰退的最迅速和最可靠的办法，但是国会在这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国会只是主张继续征收现有的赋税，而且参议院否决了参议员道格拉斯(伊利诺州民主党人)提出的关于减少约60亿美元的所得税和消费税的建议。要把免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限额提高到800美元的企图也没有成功。

参议院也拒绝堵塞赋税制度的一个大漏洞——对石油和煤气公司的27.5%的资源耗竭津贴。要把这种优待限于每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下的公司的建议也被否决了。

失业津贴问题 本书其他地方已经指出，南方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的联盟，击败了劳工方面支持的增加现行的、为数不足的失业津贴的法案。国会通过了一项政府法案来代替这个法案，政府法案规定贷款给请求贷款的各州，用以延长失业津贴的期限，延长的期限最多不得超过13个星期。劳联—产联主席米尼把众议院通过这项措施说成

是“对美国失业工人空前的、最大的欺騙”。

联邦雇员的工资问题 尽管总统在第一期会议时期行使了否决权，参众两院仍通过了一项对增加邮资法案的修正案，规定大多数邮政雇员平均增薪10%。总统在这项法案上签字之后，参众两院又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联邦政府编制以内的雇员增薪10%，艾森豪威尔也签了字。

1957年的选举

1957年的几次州选举、市选举和特别选举表现出一种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有利的趋势。在春季密执安州全州选举中，应当选出的10个州政府职位全部为劳工支持的候选人所得。在得克萨斯州的特别选举中，劳工支持的一个候选人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在新墨西哥州的国会议员竞选中，劳工支持的候选人也取得了胜利。

在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中，劳工对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威廉·普罗克斯米尔的当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1月的选举中，劳工帮助新泽西州长民主党人罗伯特·麦纳重新当选为州长。在该州的议会竞选中，四个劳联—产联会员当选，有两个议员重新当选。这是20年来第一次选出了民主党占多数的州议会。

在许多市议员的选举中，劳工和自由主义人士支持的候选人取得了胜利，如在底特律、克利夫兰、阿克伦、匹兹堡和费拉特尔费亚。这些候选人中有几个是美国人民行动协会的积极分子，有若干人是著名的黑人社会领袖。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季波特市，自1933年来一直任该市市长的社会党人贾斯帕·麦克利维以相差有限的票数败于一个民主

党人。

在紐約市，罗伯特·华格納連任市长。在25个市議員席位中，共和党人只取得了一席。这个当选的共和党人斯坦萊·艾薩克斯是一个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和反对偏見立法的战士。他也得到自由党的支持。民主党除了在紐約市取得了压倒优势外，在紐約州的50个市的市长选举中赢得了28个市长职位，并在共和党力量很强大的紐約市郊区取得了进展。

在紐約市，社会主义工人党市长候选人乔埃斯·考萊得到了13,900票；社会劳工党候选人埃里克·哈斯获得4,600票。在旧金山，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支持的两个市監察員候选人，弗兰克·巴巴里亚和乔安·乔登分別得到17,082票和15,636票，亦即占市監察員选举的全部票数的8%强。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伊丽莎白·葛萊·弗林在人民权利党的旗帜下在曼哈頓下东部第二十四区竞选紐約市議員。有4,000个登記的选民在申請书上签名，要求把她列入候选人名单。在选举中她在所投70,000张总票数中得到了710票。民主党人D·S·魏斯以41,902票当选。

1958年的选举

在1958年11月4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大大加强了他們对国会的控制。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指出，共和党“不仅被击败了，而且被埋沒在雪崩之中”。

美国参議院有33个席位进行改选，民主党参議員在选举后从49人增加到64人，而共和党参議員則从47人减少到34人。共和党人丧失了13个席位，民主党人增加了15个席

位，包括两个来自阿拉斯加州的新参議員。

在这次选举中，众議院的全部議員都要改选（连同阿拉斯加州的席位共436席），民主党人所占席位从235增加到283。共和党的席位从200减少到153。这是10年来民主党人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并使民主党在国会中取得了自1936年以来最大的多数。在31个州中（包括“巩固的南方”和南北之間的5个州），民主党取得了众議院的多数席位，在8个州中共和党取得了多数席位，在9个州中两党席位相同。

民主党在伊利諾州、宾夕法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印第安納州取得了多数的国会席位，而以前在这几个州的議員中共和党曾占多数。

在康涅狄格州和馬里兰州，民主党人取得了全部众議院席位。在佛蒙特州，威廉·H·麦耶取得了該州的唯一联邦議員席位，这是100年来民主党人第一次当选这一职位。他的竞选口号是停止原子武器試驗、停止制造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采取步驟接納中国进入联合国、同苏联举行更广泛的談判、废除和平时期征兵制、彻底改变对外政策。

在9月8日举行的緬因州选举中，該州州长埃德蒙德·S·馬斯基（民主党人）击败了他的共和党对手F·G·潘恩。在緬因州的历史中，馬斯基是第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民主党参議員。在州长竞选中，克林頓·A·克劳森（民主党人）击败了前任州长H·A·希耳德雷斯（共和党人）。緬因州的众議院三个席位中有两个也为民主党人获得。他們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在某些工业城市中发生了经济衰退，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援助蕭条地区的法案。

选举后，民主党人在40个州中控制了州的参众两院，共

和党只控制了7个州，而在1956年共和党人控制着17个州。（明尼苏达和内布拉斯加两州无党派議員占多数。）在各州参議院中，民主党参議員共有1,166人，而共和党参議員只有591人；在各州众議院中，民主党众議員共有3,721人，而共和党众議院只有1,939人。美国最大的50个城市的市长，有36人是民主党人，10人是共和党人，4人是所謂无党派人士。

若干反动分子的失敗 在美国参議員竞选中，落选的共和党反动分子和麦卡錫分子，有約翰·W·布里克（俄亥俄州）、弗兰克·A·巴雷特（怀俄明州）、爱德华·泰伊（明尼苏达州）、乔治·W·馬隆（内华达州）、阿瑟·V·华金斯（犹他州）、查尔斯·E·波特（密执安州）、威廉·A·波特（康涅狄格州）、查普曼·雷佛康和約翰·D·霍布利澤耳（西弗吉尼亚州）。另一方面，有組織的工人的主要敌人巴里·戈德华特则在亚利桑納州重新当选。

威廉·諾兰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作为出任美国总统的一个步驟——的失敗意义特別重大。他强迫当时任州长的共和党人G·J·奈特竞选参議員，而他們两人都失敗了；諾兰被埃德蒙德·G·布朗所击败，奈特被众議員克莱尔·恩格尔所击败。劳工和进步势力的力量，諾兰对“工作权利”法的支持，以及民主党人的团結，是民主党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取得重大胜利的主要因素。这次胜利使民主党控制了州立法机构参众两院，并使民主党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州在联邦众議院的30个席位中的16席。

各州州长 在1958年有34个州改选州长，26个州的州长职位为民主党所得，共和党只有8人当选州长。結果在各州州长中民主党人占35人，这是自1936年以来民主党州长最多的一次；此外14个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民主党州

长人数淨增 6 人，民主党从共和党手里夺取了 10 个州长职位(包括阿拉斯加州)，但丧失了 4 个，包括紐約州在內。

民主党在紐約州州长竞选中遭到了很大失敗。在紐約州，石油大王約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納尔逊·洛克菲勒当选州长。他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阿弗里尔·哈里曼。哈里曼是在財產方面略逊一筹的百万富翁，他原来是在 1954 年当选为州长的。洛克菲勒所得票数为 320 万票，哈里曼得到 250 万票。

洛克菲勒是財產可能达 5 亿美元的鼎鼎大名的豪富，他有雄厚的竞选經費，并有“愉快的性格”。在他的竞选宣传品中很多不带共和党的标签，而且他不卷入对民主党人的攻击，只是猛烈地攻击哈里曼和他的政治后台老板卡迈恩·德薩比奧。德薩比奧是民主党塔曼尼派領袖。洛克菲勒实际上是以自由主义者面貌出現的，他主张继续对房租实行管制，增加由政府資助建筑的住宅，并拥护公民权利。他反对其他共和党人所拥护的“工作权利”法和减少救济金，并且采取强烈的支持以色列的立場。他又把自己同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分开，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攻击民主党人是“激进主义者”和“敗家子”以后，尤其如此。洛克菲勒避免談論国际問題，也不提及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年初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超級扩軍計劃。

阿拉斯加州的选举 美国的第四十九州阿拉斯加在 11 月 20 日举行了选举，民主党人取得了全面胜利，两个联邦参議員席位，一个联邦众議員席位，以及州长和州务部长全为民主党所获得。他們全部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类型的民主党人。民主党也控制了由 22 个議員組成的州参議院和 40 个議員組成的州众議院。11 月 30 日《紐約先驅論壇报》的一篇报

道，把阿拉斯加州新政府称为“在民主党旗帜下的劳工政府”。当选为参議員的欧內斯特·格伦宁，曾任阿拉斯加属地总督13年之久，他拥护新政立法，并同鮭魚商及其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剝削的大公司进行斗争。

农民的选票 由于反对农业部长本逊的政策，民主党在农民选票比重較大的各州中取得了胜利。在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各州中，民主党席位淨增21席。共和党人只从民主党人手里夺得1个席位，但在該地区的11个州中的9个州里都受到損失。

农业研究会在它的《农民实况》（1958年12月）中报道說，在共和党所丧失的全部众議院席位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可能主要是由于农民的选票的作用，对于其他席位的选举，农民的选票也起了作用。保守的《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11月21日）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选民强烈地倾向于民主党，……大部分农民对共和党表示不滿。他們通过选举要求改变情况，他們这种态度使有些共和党候选人遭到失敗，而对其他的共和党人的失敗，也起了很大作用。”

民主党取得巨大胜利的因素 在选举問題上，所有的評論家都同意：经济衰退和失业是有利于民主党的主要因素。从各个地区发出的报道，在解释民主党取得胜利的原因时，一再使用的字眼是：“经济衰退”、“失业”、“工厂迁移”（如迁出新英格兰各州）、“对工作的忧虑”、反对“工作权利”法，“蕭条”（如在矿区）以及“生活費用高昂”等等。除了某些例外，共和党的損失都很大，并且多数是在产业工人占选民50%以上的地区。

碼頭与倉庫工人工会駐华盛顿代表把民主党所取得的普遍胜利归之如下几个原因：劳工在反对“工作权利”法方

面團結一致，黑人不滿共和黨政府在取消隔離方面缺乏行動，對杜勒斯的對外政策感到不安，以及希望國會議員“更年青一些、更有智慧一些和更主動一些”。因此，在國內問題上雖然並沒有提出截然不同的路線，“但人民所表示的是他們反對最反動的措施。這次選舉是對政府的倒退政策、對破壞工會的措施、對麥卡錫時期的政治迫害的一種抗議”。

無黨派勞工聯盟（屬礦工工會）負責人羅伯特·E·霍威說：“蕭條是使共和黨遭受慘敗的主要因素……再加上‘工作權利’運動，就使得工人成群結隊地出來表示反對。”投票反對共和黨的，不僅是“起來對付有失去工會保護的危險的有組織的工人”，而且還有“以百萬計的失業者，這些失業者沒有被共和黨信徒關於蕭條已經過去的說法所‘欺騙’。”

在礦工工會的刊物同一期上有一篇社論又說：“很多人投票反對共和黨人，因為人們不願為了中國沿海的幾個小島而卷入一場大戰。”

在選舉以後，勞聯—產聯的執行委員會說，選民“譴責了無恥政客和大企業的反動分子，這些人原來想利用工人隊伍中一些個別的腐化現象來撈取政治資本”。

美國人民主行動協會——一個全國性的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組織——把選舉的結果解釋為實行一種“新政”的要求。這個協會對“新政”的概念包括以下的幾個目標：在30年之內“消除美國國內的貧困現象；消除貧民窟并使每一個美國家庭有適當的住宅；使每一個美國兒童得到第一流的教育；使每一個美國人在需要時享受現代醫學所創造的奇蹟；使每一個美國人得到平等的權利、機會和公民自由……”。

投票人數 在1958年的選舉中，在有資格進行選民登

記的10,400万人中,約有7,600万人进行了登記。投票总数超过4,780万,这是中期选举最高的纪录,但比1956年总统选举时6,200万票的最高纪录还相差很远。

在众議員选举中,投票的总数为4,570万票,民主党获得投票总数的56%以上。同1956年相比,共和党众議員候选人所得票数这次少了約860万票。但是如果不算南方的11个州的話,民主党所得到的多数不过是360万票左右。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外的众議員候选人所得票数不到181,000票,即总数的0.04%^①左右。

在竞选运动中的劳工

在1958年竞选运动中,有組織的工人是通过以下一些組織来进行活动的:政治教育委员会(属劳联—产联);无党派劳工联盟(属联合矿工工会);铁路工人政治联盟,以及由各个工会分別领导的其他政治行动組織,如机械工人工会、铁路乘务員工会、服装工人工会、汽車工人工会及钢铁工人工会等。

《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作者总结了大企业所过份夸大的恐惧,他說:“几乎可以說,11月4日的选举的真正胜利者是劳联—产联的政治机构——政治教育委员会。”

毫無疑問,在选民反对“工作权利”法的各州中劳工投票是团結一致的。劳工的这种团結一致,帮助了民主党人取得胜利。特別是在諸如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重要工业州,以及在科罗拉多州(虽然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个州也

^① 原文如此,疑为0.4%之誤。——譯者

取得了胜利)和华盛顿州(这个州的选民击败了这种限制性的立法),情况更是这样。在爱达荷州,选民击败了“工作权利”法,但是还是重选了一个共和党的州长。在堪萨斯州——这是六个州中工业最不发达的州,选民批准了这种禁止闭厂制度的法律,但是选出了一个民主党人连任州长。

选票计算完毕后,可以看出在新的众议院中至少有237个议员是劳联—产联所支持的,当对新议员——根据他们在有关问题上的投票情况加以分类以后,这个数目还会增加。在参议院中,当时至少有64个参议员被认为是支持劳工的。

得到劳联—产联各州政治教育委员会支持的或在劳联—产联的合并尚未实现的各州中得到各该州团体支持的30个参议员候选人中,有23人(即77%)当选。州和地区政治教育委员会所支持的293个众议员候选人中,有182个(即62%)当选。在州长候选人中,政治教育委员会支持的有23人,其中有17人当选。在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和俄亥俄州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公司的政治活动

1958年竞选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大公司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政治活动。1958年各公司除了由个人对政党的经费和委员会捐助大量款项外,还鼓励它们的经理人员和领取薪金的职员拿着大批款项去参加基层以上的政治活动。

公司扩大的政治活动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在诸如在六个州中就“工作权利”法进行公民投票之类的立法问题上,进行积极的活动;编纂和散发关于候选人的情况介绍,这

样作如果不是公开声明表示支持的话，至少也是暗中支持。

积极进行这种活动的公司有通用电气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波音飞机公司（这几家公司的军事订货合同比任何其他公司都多）、海湾石油公司、通用喷气式飞机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约翰逊—约翰逊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和提姆肯滚珠轴承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首先展开政治攻势。1958年4月，该公司设立了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政府关系部”），以期求得所谓“更好的企业气候”。这种运动是由通用电气公司副总经理博耳韦尔领导的。他长期以来就主张各公司采取进攻性的政治行动。以纽约州的西腊丘斯市为例，通用电气公司同当地的制造商协会共同设立了“西腊丘斯实际政治小组委员会”，训练商人和他们的助手从事政治活动。它把它的计划分发出去，作为给各城市的榜样。在1958年的竞选运动中，博耳韦尔是企业界为“工作权利”法辩护的发言人之一，通用电气公司和其他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都极力推动这项立法。

海湾石油公司在1958年9月宣布它的政治纲领时说道：海湾石油公司“和所有其他美国公司都全力参加政治”。它表示了它对劳工政治力量的恐惧，并且说，“除了构成美国企业界的公司外，……在美国没有其他地方能够产生”同劳工相抗衡的力量。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商业和金融编辑唐纳德·罗杰斯，在1958年10月12日该报试图解释公司对实际政治新发生的兴趣时说道：“公司的目标不是工会运动中容易代人受过的人，而是美国缓慢地、稳步地——并且危险地——向着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做法发展的那种趋势。”

仇恨集团的帮助 这种对神話般的社会主义危险的攻击，也表现在大公司的经理人员对“宪法教育联盟”这类进行积极活动的“仇恨集团”的捐助上。这个组织是约瑟夫·坎普领导的。坎普长期以来就是写反对犹太人、反对工会的小册子的人，并且是罢工破坏者。

共和党参议员诺兰的支持者在诺兰进行没有成功的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活动期间，散发了坎普攻击劳联—产联副主席路德的小册子。诺兰的妻子购买了大批这类小册子。捐款资助散发坎普这种卑鄙无耻小册子的有下列大资本家：通用汽车公司董事唐纳德·布朗、通用汽车公司的最大股东莫特、共和钢铁公司董事长查尔斯·怀特等。坎普在1950年曾因蔑视国会被判四个月的监禁，他当时拒绝透露在经济上支持他的那个组织的人是谁。

“立宪政府委员会”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反劳工组织，并且是联邦最富有的院外活动集团之一。这个组织也积极参加了竞选活动，把主要火力对准劳工，刊发通篇广告，企图诬蔑劳联—产联副主席路德和其他工会领袖。这个组织要求富翁捐款给“宪法与自由企业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一个作为“教育”机构而要求免税的附属机构。对该组织捐款的报酬是赠送捐款人若干本唐纳德·里奇伯格所写的小册子《工会的垄断是当前明显的危险》。该组织的广告还告诉准备捐款的人说，如果捐款直接赠给“立宪政府委员会”本身的话，捐款人可以把这笔款项作为一项“合法企业开支”，不必纳税。

选举以后，国内税务局根据民主党参议员的要求，采取步骤取消了“宪法与自由企业基金会”的免税地位。参议员格林（罗得岛州民主党人）告诉税务局说，这个基金会从事

“恶毒的政治宣传”。

铁路工会的《劳工》周刊在评论这种免税骗局时说：“工会会员捐款给劳工政治团体还必须缴纳这笔款项的所得税。但富有的公司和个人出钱资助‘立宪政府委员会’的‘诬蔑劳工’的政治攻势，却不为这笔钱纳税。什么时候美国财政部才来干预这种丑事呢？”

美国商会也在全国展开积极活动，拉拢“能帮助造成对企业更有利的气氛”的议员和其他当选的人。

1958年8月新成立的、表现出公司在政治战线上的政策的另一个组织，是“美国人宪法行动协会”，它的宗旨是保持“我们的自由企业和私有财产制度”。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包括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阿姆斯特朗软木公司、麦格劳—爱迪生公司的董事长和西南贝耳电话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在1959年初，这个组织着手筹集5亿美元以便进行反对自由主义者、反对劳工和反对进步立法的运动。

当选担任公职的黑人

1958年当选为国会議員和州議員的黑人人数没有很大的增加。四个民主党黑人国会議員——紐約市的亚当·鲍威尔、芝加哥的威廉·道逊、底特律的小查尔斯·迪格斯和費拉特尔費亚的罗伯特·尼克斯——都重新当选。道逊已是第十次連任，鲍威尔是第九次連任。按照人口的比例，黑人在国会中的代表至少应该十倍于此数。在美国参議院中没有黑人参議員。

在伊利諾州，理查特·哈伍德是当选州一級职位的第一个黑人。他当选为伊利諾大学董事。弗洛伊·克萊門特

夫人是伊利諾州議会的第一个黑人女議員，馬德琳·威廉斯夫人是新澤西州議会的第一个黑人女議員。她們两人都是作为民主党人竞选的。在伊利諾州，有三个黑人共和党人重新当选众議員，一人重新当选州參議員。包括民主党人在內，共有十个黑人当选为伊利諾州議員。

在印第安納波利斯，默塞尔·曼斯是当选为州高等法院法官的第一个黑人。詹姆斯·亨特尔成为印第安納州議会的議長。他在該州議會任职已有20年之久。作为民主党在康涅狄格州大获全胜的一部分，黑人候选人韦尔弗雷德·約翰逊获得了州議会的席位，这在該州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馬里兰州，有两名黑人妇女当选为州众議員，一个黑人当选为州參議員。有九个黑人重新当选为密执安州众議員，一人当选为該州參議員。在底特律市，埃尔文·达文波特是当选为市法院法官的第一个黑人。有七个黑人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議會議員。

四个黑人重新当选为密苏里州众議員。紐約州仍然有四个黑人众議員，一个黑人參議員。在馬薩諸塞州，黑人在州議会的席位从一席增加到两席。有一人在加利福尼亚州重新当选；一人在堪薩斯州重新当选；两人在印第安納州重新当选。

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尔市，伍德福德·波特被选入市教育局。在得克薩斯州豪斯敦市，查尔斯·怀特夫人(42岁，曾任教員)当选为学校委员会委員，她是最近时期在該市取得选举职位的第一个黑人。

《华尔街日报》(1958年8月22日)在談到黑人在南方竞选公职的活动情况时报道說，1958年有一个黑人在新奥尔

良市民主党预选中竞选国会議員，这是本世紀在路易斯安那州竞选国会議員的第一个黑人。在南卡罗来納州有四个黑人竞选州众議院議員，另一个黑人竞选桑特尔市議會議員；有一个黑人牧师竞选佐治亚州薩凡那市參議員；另一个黑人在新奥尔良市竞选市議員；在北卡罗来納州的两个县中有黑人竞选学校委員會的职位；“在最近几个月中，在佛罗里达州、田納西州、阿肯色州和得克薩斯州等南方各州中都有黑人竞选公职”。在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也有黑人候选人。

如以前各卷《劳工实况》所指出的，在有些南方城市中，黑人在以前就已经当选公职。例如在納希維耳市議会有两个黑人检查官；北卡罗来納州恰佩耳希耳市和溫斯頓—塞勒姆市有黑人市參議員；北卡罗来納州的加斯托尼亚市議会有一个黑人議員，在杜尔汉市有一个黑人在当地学校委員會任职，該市并且还有第二个黑人市議員。

鮑威尔的胜利 1958年5月，塔曼尼派地区領袖指定紐約市議員厄尔·布朗在哈莱姆的国会第十六选区同亚当·鮑威尔竞争民主党国会議員提名。这引起了激烈的斗争，結果在8月12日的预选中鮑威尔取得了胜利，得票的数目是14,837票对4,935票。布朗只是在州議會第七选区白人选民占绝对多数的十个地区中得票比鮑威尔多。后来鮑威尔結束了同塔曼尼派領袖卡迈恩·德薩比奥的爭执，并支持哈里曼竞选州长。鮑威尔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提名，在11月的选举中，以55,335票对5,619票的压倒优势，战胜了厄尔·布朗(布朗得到自由党提名)。

南方黑人的选举权

1958年南方11个州中约有1,238,000个黑人列入选民名单。这个数目只占该地区约500万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的25%左右,而南方合格的白人进行选民登记的有60%。

在瑪格丽特·普賴斯所著《南方黑人选民》特别研究报告中,南方地区委员会报道说,最近几年来黑人选民登记的数目增加最多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在路易斯安那州已登记的选民总数中黑人占18%——在南方各州中这是最高的比例。但在密士失必州黑人选民登记的数目近年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下降。

在密士失必州(参議員伊斯特兰的州),在达到选举年龄的人口总数中,黑人将近占一半(41%),但只有3%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进行了选民登记。南方地区委员会根据逐县的调查,发现在密士失必州中,“合格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的中位数还不到1%”。有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黑人登记。有三分之二的县登记的人数不到1%。

在南方其他九个州中,按县统计的黑人登记百分比的中位数如下:亚拉巴马州10.9%;南卡罗来纳州17.4%;弗吉尼亚州20%;北卡罗来纳州21.4%;佐治亚州25%;得克萨斯州26.7%;阿肯色州30.1%;路易斯安那州40.1%;佛罗里达州44.1%。以上逐县统计的中位数代表在这些州各县中已登记的合格黑人选民的百分比的中位数。

歧视和恐吓 现在只有南方五个州还有人头税,这五个州是亚拉巴马、阿肯色、密士失必、得克萨斯和弗吉尼亚。人头税是用来剥夺黑人和许多低收入的白人公民的选举权

的最早使用的方法之一，現在還能用來限制登記。但是，最近用來剝奪黑人選舉權的更重要的方法是“識字”測驗和憲法解釋測驗。

根據1957年聯邦民權法而設立的民權委員會，於1958年12月就拒絕給予亞拉巴馬州黑人選舉權問題在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舉行了聽證會。這些聽證會遭到六縣的選舉登記官的抗拒，他們拒絕交出記錄。證詞表明，在過去五年中僅在達拉斯一縣黑人前往要求登記的就超過800人，而被批准登記的只有兩人。

在這些聽證會上作證的黑人有大學教授、大學牧師(college chaplain)、牧師、大學生各一人，家庭婦女三人，護士四人，農民八人，秘書二人，教員二人，營養護士助手、退休教員、裁縫和建築師各一人。其中三人曾獲博士學位，只有八人沒有受過中等以上教育，他們都有財產，但除一人外都沒有獲得選舉權。

由於委員會本身沒有執行權，委員會將選舉登記官的抗拒情況轉告司法部。根據1957年聯邦民權法，司法部設有民權司。1959年2月司法部要求法院發出命令，禁止“多年以來”有計劃地拒絕給予梅康縣黑人選舉權的行為。同時，亞拉巴馬州州議員敦促通過法律准許亞拉巴馬州的67個縣的選舉登記官銷毀舊存的未被批准登記的申請人所填的問題單。司法部當時正在提出訴訟，控訴亞拉巴馬州選民登記官一貫拒絕給予黑人選舉權，該部需要這些問題單以供訴訟之用。

敢於以美國公民的身份要求選舉權的黑人，在南方各州經常遭到暴力襲擊，特別是在密士失必州。南方地區委員會報告說：“其他地方通常使用一種或兩種手段來限制黑

人選民登記，而白人公民委員會發源地密士失必州則顯然使用一切手段來限制黑人登記。”在本會的《勞工實況》第十三卷中記載了密士失必州要求選舉權的黑人遭到屠殺的事件。

在亞拉巴馬州貝斯默爾市，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副主席阿斯伯里·霍華德（黑人），由於領導幫助黑人公民登記和投票的運動，在1959年1月24日遭到凶毆。當他本人、他的妻子和兒子在市政廳時，他遭到了四、五十個白人種族主義暴徒一再用刀棍毆打。警察袖手旁觀，不加保護。他的頭部受重傷，縫了十針才把傷口縫合。

作為貝斯默爾市選民聯盟主席，霍華德曾吩咐在一塊牌子上畫一幅漫畫，題為《為了美好的明天，讓我們今天投一票》。由於這項“罪行”，霍華德和畫漫畫的一個白人被逮捕，罪名是“破壞治安”。他被判六個月監禁和100美元罰金。

國會委員會的權力

在第八十六屆國會各委員會的人選指定以後，《華爾街雜誌》駐華盛頓記者在1959年1月17日寫道：“差不多在新國會的每一重要工作中，南方議員將能夠在委員會中對立法進行控制。委員會的主席實際上幾乎全部為來自梅森—迪克遜線以南的參議員和眾議員所把持。委員會主席只有一票表決權，但是在安排關於法案的聽證日程、指派參加小組委員會會議的人選和起草并向兩院提出報告方面，主席的權力幾乎是絕對的。主席所能採取的拖延手段對於任何立法的進展或最後表決都能發生決定性的不利作用。在每屆國會中都發生過這種情況。”

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立法和政治行动公报》(1959年1月26日)对于这种制度的实际运用情况作了进一步说明：“资历是在每个委员会中晋升到具有很大权力的主席职位的绝对准则。在分配委员会的美缺时，资历虽然不起最后的和绝对的影响，但是影响也很大。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参众两院的首脑，众议院议长萨姆·雷明(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逊(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在指派委员会的人选上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也利用这种权力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上述工会刊物在谈到众议院的委员会时指出，众议院规程委员会是“权力最大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就像独裁的交通警一样影响着法案，它决定法案是否以及如何……提交众议院……以便讨论和表决，而且滥用这种权力强迫修改法案。”“该委员会被南方顽固的民主党议员和反动的共和党议员的反动联盟所控制。”众议院规程委员会主席是霍华德·史密斯(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58年12月5日)承认，史密斯毫不犹豫地拖延或搁置“触犯他的‘保守情绪’的法案”。

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是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委员会，它管辖所有关于劳工关系的立法，管辖教育、工资、劳动时间和公平就业的法案。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格雷姆·巴登(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上述反动周刊把他描写为阻碍改变劳工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国会堡垒”。“在过去他曾拒绝召开委员会会议来讨论有利于劳工的立法，而干脆把这类法案搁置起来。”

南方议员——多数是反动的——控制了国会的委员会。在第八十六届国会众议院的20个常设委员会中，有13

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由南方各州(包括肯塔基州和阿肯色州)的議員担任的。在参議院中,16个常設委员会主席中,有10人是南方議員。事实上,在参議院中,密士失必河以东和波托馬克河以北的各州(这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没有一个州有議員任委员会主席。

議員中的律师、企业家和妇女

国会議員中有一半以上曾当过律师,当然其中有很多人在当律师时是为企业服务的。第八十六届国会参众两院議員的成份統計表明,62%的参議員和42%的众議員过去是律师,此外在参众两院中还有29%的議員来自企业界和銀行界。

工会的报纸报道說,在第八十六届国会的新議員中至少有4人是工会的积极會員,另外还有14个重新当选的議員也是工会的积极會員。(在州議會中也仅有少数的工会工作者。)

在过去42年中,总共只有58个妇女当选为国会議員或被指派为国会議員。虽然妇女至少占选民的半数,但在第八十六届国会中妇女只有17人,比第八十五届国会多一人,仅仅同第八十四届国会第一期會議的記錄相同。1958年曾有5个妇女竞选参議員,但都沒有成功;瑪格丽特·史密斯(緬因州共和党人)仍然是参議院的唯一女参議員。有40个妇女竞选众議員,其中16人当选。在这16个人中有8个人是竞选連任的民主党人,其余8人是共和党人,其中有3个人是新議員。

选举之后,在49个州的州議會和夏威夷、波多黎各及維

尔京群島的議會中共有女議員341人。在州參議院中，共和党女議員比民主党女議員多，前者为19人，后者为15人；在州众議院中，共和党女議員为157人，民主党女議員为145人。

統一独立社会党在紐約州所得选票

統一独立社会党竞选委员会是在1958年6月举行的有将近500人参加的會議上产生的。这次會議选出科利斯·拉蒙特竞选联邦參議員，在候选人名单上还包括竞选州长的約翰·麦克馬納斯，竞选副州长的安尼特·魯宾斯坦，竞选州总檢察长的斯科特·格雷和竞选主計长的休·莫尔扎克。

独立社会党在提出26,481个人的签名以后，得到了竞选权。紐約州州务部长民主党人卡迈恩·德薩比奧和共和党律師們，认为所提出的签名中有些是无效的，但他們的主张被法院所否定。

独立社会党的竞选綱領要求“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平关系……采取现实的措施来制止经济蕭条……立即停止对黑人的歧視和一切形式的歧視……恢复我国的宪法自由……不妨碍劳工运动……爭取民主、計劃经济和社会主义”。关于最后一点，該綱領說，“社会主义者知道，美国人民所面临的严重問題的解决办法，不会作为好心腸的自由主义者送来的礼品而得到；只有通过包括劳工、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集团的巨大斗争才能获得。通过在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所进行的这种斗争，美国人民将以一个有計劃的社会来代替利潤制度。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才能結束目前时常发生的危机、战争活动、种族偏見和貧困，并利用我国的

丰富的资源和我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来满足我国在原子时代的复杂需要。”

拉蒙特在竞选演说中主张大大削减联邦军事预算，把这些数以亿计的美元用于住宅建筑、健康保险、教育、医院以及增加失业津贴和养老金。他指出，联合国每年为和平事业只支出几千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用于战争目的的费用每年达几百亿美元。事实上，美国每天用于军事目的的16,400万美元约等于联合国全年预算的三倍。

选举结果，拉蒙特获49,087票，麦克马纳斯获得31,658票。如果麦克马纳斯获得5万票的话，该党在下次州选举时无需提交新的申请书就可以有竞选权。

紐約市的人民权利党

曾任市議員的紐約州共产党主席本杰明·戴維斯是1958年紐約市哈萊姆第二十一选区人民权利党竞选州参議員的候选人。他的支持者提交了6,000个人的签名(3,000个人的签名就够了)为他申请竞选权。但是民主党律师和受民主党控制的选举委员会认为有几千个签名无效。因而在选票上没有戴維斯的名字，而在选票上临时写入他的名字的，则由于两个老政党的选举人员的阻挠，没有予以计算。但是他两个多月的积极竞选和热情的街头集会，在哈萊姆区人民的脑海中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

共产党在紐約市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生气蓬勃的戴維斯的竞选运动上。共产党在10月初也发表了一项竞选纲领，该纲领强调扩大失业救济和房租管制，强调选举时需要实行比例代表制和结束在住房方面对黑人的歧视以及一切形

式的歧視。共产党的和平政策要求結束冷战，扩大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实行和平共处和結束“可怕的軍备浪费”。

罗伯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

1958年6月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时，竞选該州公共教育厅长的独立候选人霍兰德·罗伯茨在竞争剧烈的选举中获得了397,429票。在四个候选人中，他所得到的票数占第三位。罗伯茨曾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和中学校长，在过去14年中任加利福尼亚劳工学校校长，他得到劳工以及黑人和少数民族团体的重要部分的有力支持。

他得到国际碼頭与仓库工人工会北加利福尼亚地区委员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一个地方分会、洛杉矶牧师同盟和主要黑人报纸的贊助和支持。

罗伯茨极力要求联邦拨款100亿美元，在1959年修建300所新学校，在1960年再修建150所。他主张把每班人数减少到20人，消除拥挤现象并完全取消二部制；給予教师以竞争性的薪金以提高教学质量，規定年薪从5,000美元开始，在10年内提高到1万美元，所有学校都应实行黑人白人合校，結束在学生和教員中的种族隔离和歧視。

阻碍小政党参加竞选

在美国严格执行的歧視性法律，被用来阻碍小政党参加竞选。这种法律各州不同，但是它們的共同目的是使少数人难于通过别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意見。在两个老政党过去有时曾受到为数很多的选民脱党的威胁的各州尤其

如此。

大政党通过预选或党代表大会提名候选人，但是小政党除非在上次州长选举中获得大量选票（如在纽约州必须获得5万票），就必须提出申请书然后才能提出候选人。提出申请书所需要的签名数目、这些签名按县的地理分布以及其他许多技术上的困难，都妨碍它们获得竞选权。

纽约州的条件是要有12,000个选民的签名，并且在该州的62个县中至少每县有50人签名。在密苏里州，签名的数目必须等于上次州长选举全部选票的2%，或至少有36,000个人的签名。而且每个签名都必须由亲自认识签名者的公证人加以证明，或由两个能够证明签名者的身份的证人加以证明。在伊利诺州，法律规定在该州的102个县的50个县中必须每县有200个人签名。

小政党还遭到其他障碍。例如，许多州把提交签名的日期规定在选举前四个月到六个月，即远在竞选运动引起任何兴趣以前。别的州则严格限制征集签名的期限。例如宾夕法尼亚州规定在20天内征集签名。在许多地方，在上次预选中投其他党的票的人或在一定期限内曾参加其他党的人都不能在申请书上签名。

许多法律的措辞很含糊，因而总能找到技术性的理由来认为签名无效。此外还时常有法律以外的压力，例如报纸有时公布签名者的姓名，以期把他们列入黑名单。

腊耳夫·纳德尔和西奥多·雅各布斯在《哈佛法律记录》(1959年10月9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总结了小政党获得竞选权和独立候选人获选时所遭到的种种困难。他们的结论是：用严格的法律来操纵这种制度，以维持“民主党和共和党对选举的实际垄断”。

第七章 加拿大劳工运动的发展

在1957年和1958年加拿大发生了新的经济衰退，它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两年中仍然和1956年大致相同，不过，由于物价上涨，1957年以加元计算的生产总值增加了约4%，而1958年又增加了2%。从1957年初，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继续下降到1957年年底。1958年大部分时期也是如此。但是，在1958年年底似乎又趋上升。

这种下降趋势由于1957年迅速和相当大规模地扩大社会保障和政府对于住宅建筑的支持而减轻。此外，大规模建筑工程，如圣劳伦斯通海航道、电力工程和横贯加拿大的油管工程等也继续发生影响。

和1953—54年衰退时的情况一样，就业人数的回升和失业人数的减少落后于生产的回升。直到1959年1月底，实际失业人数，将季节性因素计算在内（因为加拿大冬季的气候这个因素一向是很严重的），比一年前更多，而一年前失业人数又比3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多。就业趋势在1957年秋天恶化，1958年全年继续恶化，但由于劳动力增加减慢，失业人数增加比较少。

加拿大这次衰退同上一次衰退重要不同之处，是世界上矿产品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停止扩大，受到影响的不仅有铜和加拿大的其他传统出口矿产，而且也包括从前没有受到影响的矿产，如铝和镍，甚至还有新矿产如铁矿砂和石油。同样，加拿大也由于纸浆和纸的市场缩小而遭受打

击，第一次卷入了影响到森林工业的普遍衰退。

1958年年底，劳工担心失业和物价上涨，资方则担心生产成本上涨和国外市场受到影响。同时，人们也普遍担心美国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并且认为美国的许多行动侵犯了加拿大的主权。

工会会员 尽管发生了经济衰退，1958年5月加拿大所有工会的会员总数为1,454,000人，比1957年5月多5%，比1956年5月多7.5%。其中将近总数的79%是加拿大工人大会的会员，这个百分比略高于1956年的百分比，这表明加拿大工人大会作为加拿大劳工团结中心的重要地位日益增长。加拿大工人大会会有会员1,144,000人，比1956年增加将近12%，其中包括同时属于美国劳联—产联的“国际性”工会的907,000人，另外，有55,000人属于其他“国际性”工会（主要是货车司机兄弟会），有181,500人属于其他全国性的和区域性的工会。

加拿大工人大会以外的工会会员31万人中，有104,000人是魁北克（加拿大的第二个劳工中心）的加拿大天主教劳工联合会的会员，将近1万人是不属于任何工会的铁路兄弟会（机车司机和列车员）的会员，另有8万人是独立的“国际性”工会（开采冶炼工人工会、联合电气与无线电工人工会、联合矿工工会）的会员；18,000人是几个未参加加拿大工人大会的劳联—产联附属工会的会员；其余98,000人是各种独立的全国性的、区域性的及地方性的工会的会员。

加拿大最大的十个工会中，有六个是同时属于加拿大工人大会和劳联—产联的“国际性”工会（钢铁工人工会、木匠工会、汽车工人工会、机械工人工会、木材工人工会和纸浆工人工会），有一个是只属于加拿大工人大会的“国际性

工会”（貨車司机兄弟会），有一个是独立的“国际性”工会（开采冶炼工人工会），有两个是属于加拿大工人大会的全国性工会——即成立已久的加拿大铁路、运输及一般工人兄弟会以及新近成立的全国政府雇员工会，该工会是联合许多先前已有的市政工人的直接地方工会而成立的。

1958年年中，加拿大工会会员包括了全国非农业的工薪工人的34.5%左右，同1957年和1950年以来各年的百分比大致相同。根据政府所发表的另外一套数字，工会所订的合同适用范围较广。1956年年底总计有1,638,000人（约占非农业工人总数的38.7%）包括在工会合同之内。按行业来说，加入工会的人数是不一样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行业不到1%，贸易业约为9%，各种服务业为13%，公用事业为50%，制造业为55%，采矿业为59%，林业为62%，建筑业为64%，运输、贮藏和交通业为80%。

从1956年5月到1958年5月，木匠工会、貨車司机兄弟会和政府雇员（城市的）工会的会员增加最多，许多拥有5,000到15,000会员的小工会的会员人数也增加了。主要的产业工会没有什么变化。自1958年初以来，新的组织工作的特别目标是大湖—圣劳伦斯地区的运输业（貨車司机兄弟会）和紐芬兰的林业。在1958年年中，木材工人工会战胜许多独立的地区组织而取得了谈判权。但是，在1959年年初，木材工人进行了长期罢工，这一次罢工变成了争取生存、反对各公司和省政府的联合势力的斗争。

在1959年年初有了一些特别的组织计划和机会，包括把圣劳伦斯—大湖盆地为开放圣劳伦斯通海航道进行准备工作的所有的陆地运输、商品处理和航运工人组织起来；连带把重要连锁百货公司工人组织起来；利用新的政府津贴

的医院保险计划的有利条件，组织医院职工的工会；以及努力加强政府文职人员和公用事业中的工会组织。

工会统一问题 加拿大工人大会继续巩固它作为加拿大空前的、范围最大的劳工中心的地位。加拿大工人大会会员在加拿大工会会员总数中的百分比已大大增加。加拿大的铁路机务工人的绝大多数现在加入了该会，他们第一次在一个工会中心同铁路非机务工人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联合在一起。

和加拿大第二个劳工中心（魁北克加拿大天主教劳工联合会）进行统一的工作还未完成，不过，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同时，双方在魁北克都遵守一种非正式的劳工休战协定，进行相当的合作，而且在实际上也没有进行对抗性的组织活动或侵犯活动。有一个有利因素是魁北克劳工越来越希望采取政治行动来驱逐长期仇恨劳工的该省总理莫里斯·杜普累西斯。另一个有利因素是魁北克省同加拿大英语地区互相脱离的程度减少。1958年的联邦选举表明了政治上互相脱离的程度减少：魁北克省没有选出一个由自由党议员组成的“巩固集团”去参加议会，这是五十多年来第一次。该省的选票和加拿大其他地方差不多一样为各政党所分得。加拿大天主教劳工联合会在1958年9月最近一次大会消除了一种阻碍统一谈判的重大障碍，它允许它的职员可以和加拿大工人大会自由进行谈判。

加拿大工人大会在1958年代表大会上所重申的正式立场，是愿意接受任何一个遵守它的章程的独立工会加入加拿大工人大会。代表大会号召重新进行努力，以求实现统一，但是，拒绝接受公开的或暗示的为诸如被1956年合并以前的两个主要工会^① 中央组织所开除的采矿冶炼工人工会

那样的进步工会打开大門的建議。

在加拿大工人大会內部，合并运动进一步加强了，省和地方兩級的重叠現象都已消灭，因此只留下 9 个省劳工联合会和 96 个地方劳工委员会。目前加拿大工人大会，無論在結構上或态度方面，都已经沒有表明它是由两个組織合并而成的痕迹。現在已经开始整頓組織机构，成立有談判資格的全国性的工会来代替許多小的直接取得特許的地方工会。已经开始重新調整管轄范围的工作，以便为进行組織和談判准备更好的基础，并且也正在考虑把一些加拿大工会和某些属于美国工会的工会进一步合并起来。

在属于加拿大工人大会的各工会之間，公开爆发了一些关于管轄范围的爭执和相互侵犯的事件。有两个事件提交到 1958 年的大会。有关的工会是机务工程师工会和技术工程师工会，它們由于沒有接受加拿大工人大会关于管轄权的决定和沒有提出遵守不互相侵犯的規則的保证而被立即开除出会。最近发生的另一件爭执是两个运输工会对海員工会提出的申訴。

除了木材工人工会要求把地方組織从紐芬兰木材业中驅逐出去，以及钢铁工人工会同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的长期对立以外，属于加拿大工人大会的工会和不属于加拿大工人大会的工会之間的互相侵犯管轄权的問題，也比較平靜。（实际上魁北克省处于劳工休战状态中。）钢铁工人工会同开采冶炼工人工会一直是在进行互相对抗的組織活动，并且在最近互相爭夺在安大略省的鈾矿工业中組織工会的权利；在阿尔伯达省，钢铁工人工会进行侵犯，把大多

① 加拿大工人大会是在 1956 年 4 月由加拿大职工大会和加拿大劳工大会合并而成的。这里所指的就是合并前的这两个工会。——譯者

数原来由开采冶炼工人工会訂立的合同夺取过去。

劳工的主要政策 在1958年4月21日到25日召开的加拿大工人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1,539个代表出席，几乎和两年前出席合并大会的代表人数相同。會議大部分時間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两个問題上：大会的内部組織和政治行动。经济政策的決議注重消除衰退的影响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联邦政府实行大規模的公共工程計劃，实行全国性的社会救济計劃(以及大大改进社会保障制度)，采取鼓励建造住宅的措施，提高工資，縮短工时(具体要求实行30小时工作周)，以防止由于自动化而增加失业。決議并且要求停止驅逐房客，降低工人的賦稅和大力增加輸出。

关于国际問題的綱領則要求恢复裁軍談判(包括有效地禁止試驗和生产热核武器，并最后銷毀儲存的热核武器，实行有效的国际管制和視察，达成管理和管制星际旅行的协定)，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問題(包括重新統一德国問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間的和平，和在外交上承认共产党中国)，以及加拿大每年对联合国经济发展計劃捐獻两亿加元。

自治問題——即和美国中央机构(劳联—产联)的关系問題，以及和美国个别工会的关系問題——沒有直接提出来。但是，約多因主席在他的演說中指出：加拿大工人大会是一个“自治的全国性劳工中心”，而“加拿大工人是自由国家的自由公民”。

政治行动 过去两年中，在加拿大劳工的一切特殊問題中最重要問題，是政治行动的問題。1958年举行的加拿大工人大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完全新的行动方針。會議通过了決議，号召在加拿大成立一个新政党，“一个有广

泛基础的人民运动，其中包括平民合作联盟、劳工运动、农民组织及其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会议要求加拿大工人大会的职员同上述所有团体讨论成立新政党的建议，并且向下届代表大会提出决议草案和纲领草案。

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比1956年的折衷协议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后者规定成立一个政治委员会同其他劳工组织、农业组织和合作组织以及平民合作联盟进行讨论。而1956年的协议则又大大修改了合并成为目前加拿大工人大会的过去两个劳工中心组织的政策。

使1958年大会通过上述决议的政治思想上的跃进，是由于有必要对政府关于衰退和失业问题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有必要抵制反劳工的立法，而最重要的也许是由于在1957年和1958年加拿大联邦选举中所受到的严重震动。1957年的选举结束了执政22年的自由党政府而使保守党^①自三十年代之初以来第一次在渥太华上台。1958年的选举使保守党获得了全国各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扫除了自由党的魁北克“巩固集团”（相当于美国清除民主党的“巩固的南方”集团），同时实际上也消灭了在三十年代动荡时期成立的小党派，只留下平民合作联盟的八个议员，而社会信用党^②则全军覆没。事实上，1958年的选举标志着在加拿大又恢复了两党制，魁北克及西部各省又同全国一样。保守党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以致政府在议会中占压倒多数，弱小的反对党完全被淹没了。

集体谈判的进展 由于合同有效期限是两年或两年以

① 即进步保守党。——译者

② 这是旧的称呼，该党已于1944年改名为加拿大社会信用协会。

——译者

上,在加拿大集体合同談判方面,1957年是一个“淡年”。这一年中,只有在最大的合同(适用于1,000以上工人的合同)之下的30%的工人在进行着談判。訂立較长期合同的趋势继续发展,合同大部分是为期两年的,有些是为期三年的。第一年工資增加数目从每小时0.05加元到0.15加元。在长期合同中,以后几年增加得多一些。由于衰退日益严重,談判更加困难,经常必須用严重的罢工威胁才能得到解决。

虽然罢工人数稍微少了一些,但1957年实际罢工次数增加了,損失工作時間比1956年多25%。該年最大的一次罢工,是加拿大天主教劳工联合会所领导的鋁公司魁北克省阿尔維达工厂的罢工。这次罢工经过四个月才結束,工会获得了胜利,訂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合同,包括40小时工作周,每小时工資增加0.45加元,并且获得了促进訂立适用于該公司設在魁北克全省的工厂的总合同的机会。

1957年罢工的特点是斗争更加激烈,常常发生破坏罢工和暴力行为。在許多次罢工中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加拿大的两个最大工会,钢铁工人工会和汽車工人工会,进行了要求公司予以承认的罢工,经过尖銳斗争以后都遭到失敗。这些罢工中最大的和最具有全国重要性的一次,是钢铁工人工会所领导的、历时七个月的反对属于諾兰达矿业垄断集团的加斯普銅公司的罢工。这一次有450个工人参加的罢工,得到了当地的响应和全国的支持。但是,这是一个处在魁北克省遙远的地方而且从前沒有工业化的地区的新企业。由于在这个公司統治的城鎮中的经济压力、从外边运来罢工破坏者、沒有其他的工作可以选择、魁北克省声名狼藉的反劳工法以及冬季的来临,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迫使工会不得不命令停止罢工,既沒有訂立合同,也沒有得到不

歧視罷工工人的保證。

甚至有些純粹經濟性的罷工也沒有取得勝利。例如，在多倫多反對利華兄弟肥皂工廠的為期六個月的化學工人工會的罷工，也由於公司利用了罷工破壞者以及有效地進行了復工運動，工會不得不同意簽訂為期三年的合同，增加一些工資，但是，罷工破壞者却繼續保留工作，而把罷工工人恢復工作的期限延長到好幾個月之久。

1958年的罷工和合同 與1957年不同，1958年是一個重要的集體合同談判年。根據大合同工作的工人，有90%進行談判。失業人數仍舊很多，而僱主則堅持反對改善工人情況。政府關於限制物價上漲的號召加強了僱主反對提高工資的立場。較大的樹立先例的合同，經過直接談判、調停、和解委員會，進展很慢，而且往往發生罷工，到了秋季，工人的陣線開始崩潰，問題仍沒有解決。較小的合同則等待大合同創造先例或規定一些暫時性的解決辦法。大部分合同只是為期一年，工資增加很少，有時一點也沒有增加。這一年由於勞資糾紛而損失的工作時間將近300萬天，比1957年多75%，幾乎和1952年相同，而1952年是僅次於1946年而為加拿大損失工作時間最多的一年。

在整個加拿大勞工史上十次損失工作時間最多的勞資糾紛中，有兩次是發生在1958年。一次是開采冶煉工人工會反對薩得伯里和科耳本港國際鎳公司的罷工。這次罷工在9月中旬開始，繼續了87天，參加罷工的有14,000人，時間損失總計幾乎達100萬個工作日。另一次是鋼鐵工人工會反對加拿大鋼鐵公司的罷工。這次罷工發生在該公司設在漢密爾頓的主要工廠，8月初開始，繼續了84天，參加罷工的有8,000人，損失工作時間大約為50萬個工作日。

这两次罢工是在和解委员会提出报告后发生的。委员会多数委员建议不改变工资。这些报告成为雇主冻结工资的主张的主要依据。加拿大钢铁公司的罢工是这一年最典型的一次罢工，无形中是对力量的一次长期考验。它的时间和1946年钢铁大罢工差不多。最后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考虑和解委员会的建议而增加了工资，这是由于同年10月第二个主要钢铁公司使阵线发生破裂，而市场上对钢铁的需要也有所增加。加拿大钢铁公司的解决办法是订立为期三年的合同，规定每小时增加工资0.28加元，并增加福利津贴。

开采冶炼工人工会在国际镍公司发动的罢工，在报纸上和其他地方，遭到了近年来加拿大公众对罢工工会的最广泛的攻击。加拿大工人大会袖手旁观，既不支持它，也不得罪它，但是，加拿大工人大会的许多个别工会却表示同情和给予支持。这样规模和这样持久的罢工所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独立的工会；不过，其结果是在为期三年的合同中规定每小时工资平均增加0.16加元，并保证在几个月工作時間之后，恢复正常工作周。加拿大钢铁公司和国际镍公司的解决办法的不平常的特点是：在合同有效的三年期间，每年工资增加数目逐步提高。

其他工业部门的解决办法，不管是否发生过罢工或是否有罢工的威胁，工资增加的幅度都和加拿大钢铁公司及国际镍公司的解决办法差不多，并且表现出订立期间较长的合同的趋势，大多数都是三年或至少两年。加拿大最大的合同，即适用于13万铁路非机务工人的各工会的合同，最后在1958年12月订立。这是拖延一年，在全国大罢工最后期限的前夕才解决的，它规定每小时增加工资0.14加元，在

两年内分三个阶段实现。以后，铁路乘务员工会——交通运输业中最大的谈判组织——和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达成协议，规定在三年内增加工资10%。

1958年末和1959年初，汽车工人工会在对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发出严重罢工威胁和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举行为期七天的罢工之后，所有三大汽车公司的工人获得了为期三年的合同，每小时增加工资0.18加元，并且改善福利待遇。谈判委员会同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谈判的主要代表说，如果不是由于工会的美国总部进行干涉、拒绝允许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罢工的话，工资可能增加更多。

1958年后期的其他罢工和罢工威胁，其中有些到1959年才解决，涉及农具工业的工人、北安大略的金矿工人、威斯汀豪斯工厂的工人、公共服务业的工人、市政府公务员、若干城市建筑业的工人以及纸浆、造纸和木材工人。甚至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广播公司法语部分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演员，也在罢工70天（《多伦多星报》说这是“中等阶级的反叛”）之后，被承认为一个集体谈判的团体。木材工人在纽芬兰森林中进行反对英国—纽芬兰开发公司和布瓦特尔纸浆与造纸公司的尖锐斗争，直到1959年3月仍在进行。省总理约翰·斯莫耳伍德所领导的省政府正在极力帮助公司破坏罢工。

反工会运动 加拿大工人大会指责，有人用大批款项在全国组织宣传运动，破坏工会的力量。这一运动是由加拿大制造商协会和一个名为“职工权利与自由独立委员会”的新机构领导的。这一运动企图把工作权利法输入加拿大，企图加强有关纠察、支援性抵制和管辖权争议的法律，

并企图推行强制仲裁。

类似的反劳工运动也在反动势力要求对工会规定新限制的各省进行。紐芬兰省和不列顛哥伦比亚省已经通过了反劳工法。許多反对工会的立法草案，表示贊成反劳工的宣传指責，特别是反对貨車司机兄弟会的宣传。虽然在加拿大該工会被指責为犯有官僚主义而沒有被指責犯有敲詐行为。

和美国的关系 牵涉到劳工的其他問題，和反对美国控制加拿大经济和軍事的斗争有关。工会特別反对加拿大輸入美国制造的軍事装备。这使加拿大人得不到工作机会，而美国院外活动集团却反对同加拿大公司分享訂貨。美国所操纵的停止制造加拿大設計的截击机（箭型噴气式截击机）的决定，使得1959年2月在多伦多将近有14,000个工人被解雇。

另一个加拿大劳工运动普遍关心的重要問題，是美国的势力阻止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貿易。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加拿大汽車工人工会反对美国福特汽車公司阻止加拿大福特汽車公司向中国出售汽車的命令。钢铁工人工会对美国的影响也提出抗議，美国阻止鋁公司把不列顛哥伦比亚工厂生产的鋁出售給中国。橡胶工人也提出了同样的正式抗議，反对美国干涉加拿大向中国輸出橡胶带。